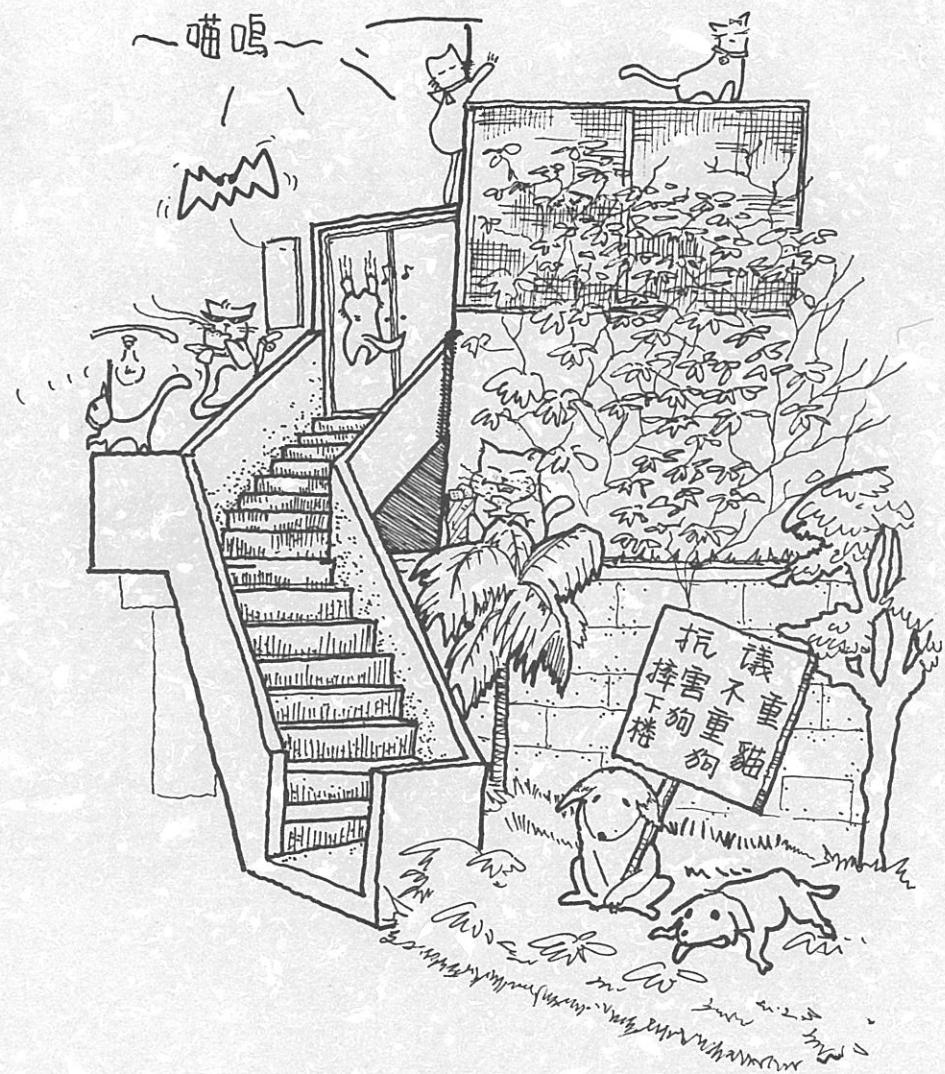


畢業遠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T.U.

建築城鄉通訊

崔誠烈紀念專刊



第八期
一九九五年秋季號

建築城鄉通訊 目錄

《教師動向》

王鴻楷老師-	1
華昌宜老師-	1
夏鑄九老師-	2
陳亮全老師-	8
林峰田老師-	11

《性別與空間小組》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開鑼了！	14
性別意識的覺醒歷程	19
親愛的鹹蛋媽媽	22
我叫林怡瑞	24
我贊成，可是...	26

《崔誠烈紀念專輯》

送別崔誠烈同學	2
給逝去的同志	4
懷念崔誠烈	6
回憶崔誠烈	8
也許，只是暑假的一趟旅行	9
別了，崔哥哥	10
韓中行程紀要	14
記一段失去地圖的旅程	17
兩個殖民總督府	21
探討九十年代南韓民族主義的種族中心主義	25
漢城的韓屋保存與環境運動	34
民族主義現形記	39
我看歷史保存——一個另類觀點	46
漢城的都市發展過程	52

♥教師動向♥

王鴻楷

- 一、十月十一日下午在台中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與土地管理所合辦之演講系列講述“社區建築”。
- 二、將於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與博士班學生洪啓東在上海（會同現在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所就讀的本所前研究助理黃智齡）為國科會研究案“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都市商業空間結構變遷之分析”之調查工作作準備，希望對上海市區及其近郊各縣之商業空間之進來的變化及相關制度作初步瞭解。
- 三、與屏東技術學院農村規劃系副教授陳坤宏合寫之〈都市消費空間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台北市六個商業區的經驗研究〉將發表於《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報》第八期。

華昌宜

學術會議

- ◎五月十三日台北市平均地權土地稅制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論最適房地產稅率增長之當然性」。
- ◎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台北市第十四屆太平洋區域科學雙年會引言：「知識經濟學之進展」。

服務

- ◎協助籌辦第十四屆太平洋區域科學雙年會
- ◎任台北市政府「住宅政策體檢小組」召集人，集合其他學者八人，於八至十月

訪察

-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四日參與佑生基金會的四川都市發展及民居訪察
- ◎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參與都市計畫學會與中國都市科學學會主辦之研討會及南京-蘇州-上海都市發展訪察

報章

- ◎四月二十日 新生報：「農地釋出是促進區域及城鄉均衡的天賜良機」
- ◎九月十六日 聯合報十一版：「市場機制終將使泡沫經濟破滅」

夏鑄九—夏日二、三會摘要

今年暑假出國參加了兩個不同的學術會議，一個是8月7-10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舉辦的“中國建築史”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中文大學主要的籌備者是何培彬，以及，郭偉傑（Jeff Cody），加上孫繼先、李以康等積極投入，把這個中國建築史的歷史上大約是第一次的國際會議辦得很生動。與會者人數最多的是大陸學者，像梁、劉兩位之後所謂第三代的清華郭黛姮、徐伯安之外，東南大學的朱光亞、中國建築科學院建築物理所的王岫嵐等，還有年輕一代的王其鈞、王其亨、張衛、梅青，以及在海外的許亦農（英國愛丁堡）、何曉昕（英國曼徹斯特）、國慶華（瑞典）等，可惜楊鴻勛先生未能趕到。香港與大陸之外，除了台灣（我以及成大的徐明福、傅與會者人數最多的是大陸學者，像梁、劉兩位之後所謂第三代的清華郭黛姮、徐伯安之外，東南大學的朱光亞、中國建築科學院建築物理所的王岫嵐等，還有年輕一代的王其鈞、王其亨、張衛、梅青，以及在海外的許亦農（英國愛丁堡）、何曉昕（英國曼徹斯特）、國慶華（瑞典）等，可惜楊鴻勛先生未能趕到。朝卿）、新加坡（新大王才強），就是剛在本所客座的京都大學田中淡，以及美國的賓大夏南希（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那仲良（Rohald Knapp）、與杜克大學的Stanley K. Abe、澳洲的馮仕達、Mark Jackson和朱健飛，年青的法國學者娜塔麗（Natalie Delande）…。為何不厭其繁一一列舉？因為這是第一次，十分不容易。會中，已有初步共識，兩年後將由北京的學者接手第二屆會議事務性工作。

有些論文蠻有意思，值得有興趣的同學借來讀讀，像馮仕達與Mark Jackson論中國園林，因為理論與哲學的訓練所以行文十分嚴謹，是討論中國園林部份難見的作品。S. Abe對塔的分析，徹底挑戰了過去梁思成以降由傳統藝術史形態學直觀類比的結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印度佛塔東傳中土的複雜變化。像夏南希（元北嶽廟）、田中淡（大屋頂的象徵意義）、郭偉傑（墨菲在上海的銀行建築）、娜塔麗（民初上海建築相關的專業分工）、何培斌（院畫中的建築）與許亦農（吳越都城的象徵意義）都是有一定水準的標準學術論文，對提昇這次會議與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學術水平有積極的作用。論文中，朱光亞的徽州呈坎、何曉昕的徽州風水與那仲良的浙江南溪江聚落布局的論述分析可能有許多在關心“社區營造”與聚落保存的研究生感興趣的題材，值得讀一讀。我自己寫的是“都市史之理論反思——從戴奧斯、考斯多夫到柯斯特”（*Making a Better-told Tale of Cities: From Dyos, Kostof to Castells*）。中英文摘要於後，供參攷。

都市史之理論反思—從戴奧斯、考斯多夫到柯斯特

Making a Better-told Tale of Cities: From Dyos, Kostof to Castells

摘要

本文由建築史學界對都市史討論的知識脈絡來重新思考所謂

首先，本文就1980年代都市史之活力對建築史論述所形成之緊張關係交待傳統常規式建築史論述之危機與史畢羅·考斯多夫的回應。

然後，作者分別就都市過程與主體性建構兩方面，在理論層次討論空間之特殊性。作者將都市史之發展接合上政治經濟學空間論戰的成果。

最後，理論對話進一步扣合全球經濟形構所推動的，東亞地區正經歷的空間重構。作者就多重學科間的理論發問、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個案研究的基礎工作、流動空間與都市主體性建構等，提出都市史研究的知識準備工作的方向。

ABSTRACT

Going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the urban history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 paper rethinks how does the so called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deal with the studies of urban history? How c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oretically articulate the problematic of urban history? And to request to fac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reality, what are the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of the urban history?

First, based o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vitality of urban history in the 1980 and the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the paper shows the crisis of the conventional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 response from Spiro Kostof.

The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pace theoretically in the two aspects of urban process and subjectivity constituti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history is articulated with the result of the debate on spac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dialogue relates to the Asian Pacific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y. Upon the theoretical problematic in the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basic research of case studies, the space of flow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urban subjectivity etc.,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of the research in urban history.

亞洲規劃學院之學會第三屆國際會議由新加坡大學主辦，主題：“快速成長經濟中的規劃”（Planning in A Fast-Growing Economy），在9月22日-24日召開。這個學會本所是發起的團體會員之一（個人會員無投票權），兩年一次。新加坡大學的辦事效率乾淨俐落又得到一次說明。這次會議也有幾位本所博士班學生與會，對他們言，應有很好的體驗，加強對國際學術界的瞭解，磨練一點勇氣，也增長些見識，值得鼓勵。亞洲規劃學院學會之組成與會議內容與美國十分不同，主要在於內容較多元，分工設計那麼細，這也是開發中國家的特色，這對我們所的同學，或許較容易找到自己的興趣與題材。我發表的論文是“Urban Conservation in Taiwan: Problems and Prospects”，英文摘要如下，供參攷。

URBAN CONSERVATION IN TAIWA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urban conservation experience
in Taiwan.

First,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experience is considered.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the empty social memory in a peculiar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 conservation movements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n, the state's cultural property conservation policies in the 1980s is reviewed. The Japanese influe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in implementation will be discussed. This section also deals with the power relationship underly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esignation of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sites.

The following section analys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urban conservation and the designation of private historic sites. There are three issues: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society's need for diversity in conservation, and the shift in the state's cultural policies.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integrat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ith urban conservation. Other problems include the dynamism of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merging cultural landscape, the ignorance and absenc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and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state bureaucracy. Urban conservation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actually a historical project and a challenge to Taiwan'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Finally, considering urban conservation as a project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ituted heterotopias,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conclusion.

10月15日，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舉辦了“文明史上之台灣”國際研討會，我摘要發表了“台灣的都市變遷：一個都市考古學的提綱”，供參攷：

台灣的都市變遷：一個都市考古學的提綱

摘要

作者由全球視野與台灣社會變遷的角度思考台灣城市之歷史變遷。為了避免把台灣城市簡單對應於單一線性敘事的國家政權轉換史，本文嘗試由不同的都市意義（以底線標明）間的抗拮來交代一種台灣都市與社會變遷的初步參攷點，做為進一步研究的思考假說架構。

首先，作者指出在近代世界市場牽動下，歐洲重商主義帝國經營的重商主義殖民港市、對渡貿易河港城市、原住民部落、漢族農業移墾聚落與地域性政治中心間的緊張關係所孕育的有活力的台灣城市，以及片斷不連續而異質的空間特色；以及，隨之交待殖民依賴下的都市化過程與日治殖民城市與反殖民城市的對抗關係中所建構的所謂“殖民現代性”特徵，及殖民城市之都市功能與都市形式。作者強調，反殖民城市是社會與文化活力的展現。

然後，作者由戰後之威權官僚城市、被壓抑的台灣地方城鎮，以及世界經濟與國際冷戰下形成的第三世界依賴城市，做為鋪陳1960年代之後城鄉移民所形成的非市民城市之歷史土壤，就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空間結構上的後殖民模式、依賴都市化的特徵，以及城鄉移民取得都市服務時所交換的國家與社會間之父權關係。然而，作者所再三致意之處在於開展1960年代之後台灣的

社會—空間動態。它由新國際分工中國家外銷導向政策下的台灣城鄉俱為加工廠、組織生產與再生產的非正式城市，以及，將外銷剩餘再集中，城市做為成長機器之投機城市之構成。這些是台灣城市在所謂台灣奇蹟中成為表現活力之地，但是卻混亂又光怪陸離之所的主要機制所繫。台灣城市成為空間商品化，追求其交換價值之冒險家樂園，它不但被國外媒體類比為“豬舍”，更是“中華民國”被當做“賭博共和國”（R.O.C.）之化身。

最後，作者由民粹主義之鄉愁城市建構，對比全球經濟中前進唐山的中間導體基地——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這是全球城市的傳輸節點。這裡，我們看到強大的，掌握了權力的全球城市之流動空間所聲稱的歷史終結之支配性意識形態，以及，對廢撤地域、地方、與社區的巨大力量之政策與文化的補償作用。因為，當前的歷史時勢正在於國家政治權力結構的重構，由於民族國家重構的企圖，社區遂成為取得國家正當性的重要手段。可是在另一方面，作者亦指出，這些在草根動員中被認同的社區，正是經歷了三十年經濟發展之後，浮現中的市民社會力量中現身的市民城市的指標，它是脫離第三世界依賴城市悲觀宿命的歷史與社會的機會，也是組織市民社會以去異化的空間追求城市之使用價值的最主要力量。或許，都市運動所擠開的公共空間中蘊含了新的可能性，具體的都市訴求不但是改善生活空間品質之基石，也是國家與社會間新歷史關係建構的機會。市民城市的活力（假如解除了歷史性的神話之後），加上我們歷史上一向就未受鼓勵的社會團體集體之自主與自律性，它不但是抵制全球城市與投機城市的流動空間之社會支點，而且是讓台灣的城市不但可具備競爭的活力與技術的優勢，而且可重新根植於文化與人民的角力場。這是我們追求女性主義城市、生態城市、文化多元的明日之城的起點。容許我們進一步想像，有活力的台灣地域與城市正是“地域國家”與“城市國家”的物質支持，它可以落實當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亟需的“地方自治”，也有機會突破當前台灣面對的國際政治的僵局。當然，它必需先解決西方十八世紀時開始建構，而今天已經過時，卻不幸正成為開發中國家後殖民階段最大的障礙——民族國家的沈迷，方可能徹底釋放出台灣社會的無盡潛力。

最近，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寫了一篇談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的小文，引起了一些討論，尤其，明年三月總統大選前，以台灣過去的政治習慣言，必定有些政黨的候選人會要求學者表態支持，為此，“澄社”於10月22日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就“知識分子之政治角色”提出看法，由於這種討論，再進一步發展，也關係著規劃與設計專業者的角色定位。我將自己的發言大綱附於下，供參攷：

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建構批判性公共空間

明年總統選舉前的台灣局勢十分詭譎，有若暴風雨前的低氣壓，遠方的雷聲提醒我們形勢可能的變化。潛藏的戲劇性的社會變遷過程使人們困惑，未來的走向與結果顯得混沌不明。在政治上，總統大選做為“象徵政治”的展現，它的場景發生在全球經濟中台灣加速做為全球傳輸節點所造成的資本前進大陸幅度之升級，而台灣本身內部區域的落差也將更顯著，區域發展成為中央與地方政治的重要戲碼。其次，總統大選也為民族國家的重構劃下政治權力結構重組後的暫時句點。可是，後殖民社會認同政治的錯亂與民族國家的沈迷，使得統獨問題仍然糾纏著社會力量的全面釋放。文化上的“死人糾纏活人”，過了時的意識形態仍然懾人精魄，亟需建構新的論述，重新定義過時的範疇，以進步的語言廓清形勢，動員人民。台灣的特殊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已經造成了盤根錯節的都市問題與社區的動員。經歷了三十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浮現的市民社會，不同的組織群體需要辨認自己真實的身形，以建構自己的主體性。

我們其實已經在全球經濟的趨迫下進入了一個資訊年代的新社會，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已經轉變了。我們看到規範常任文官，要求其行政中立的法案將要誕生，我們也看到了李遠哲對中研院知識分子自律性的要求。過去，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經在民主政治的理想與傳統士大夫的清流結合之下發揮了台灣社會早期公共論壇之清議作用。今天，政治民主化的腳步迫使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面臨新的局面。知識分子在政治角色上的混淆，不在於其政治立場之選擇，而在於當前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相當程度地忽視了我們創造歷史的特殊過程之連結所在。知識分子假如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分析，那麼他無異是意識形態者而已，不宜假中立與客觀之名而以特殊之道德光環干預政治。知識分子做為一個普通公民的參與政治權利固然需要受到尊重，但是，此外，做為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與政治投身的關係，針對我們傳統文化中對“學”與“仕”間的緊密連結，知識分子的政治角色值得在法律的形式性規範之外建立一個市民社會所必需的自主與自律性。這就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批判性公共空間的建構。

在年底總統大選前，對於批判性公共空間的建構需要有自覺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換句話說，對當前的形勢與變局，做為批判性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投身應在於“發言”，而不宜於對不同政黨與候選人之間，就政治立場直接表態。個人基本的公民參政權之表現固然必需，也值得尊重，但是做為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更能發揮其特性的工作，毋寧是以其專業訓練，為伸手不見五指的台灣變局與形勢提供批判性分析，廓清視野。提供整體而又能展望長遠的視野當然有其不可逃避的政治立場，這個政治立場應是替無聲者與弱勢者發言，譬如說，關乎階級的、性別的、環境的、地方發展的、社區的、族群的、青少年…的課題，要求候選人提出台灣現行體制中的有政策涵意的政見，以關乎台灣社會方向與一系列具體政策之大辯論來討論台灣變局的輪廓、特質、走向與可能結果，簡言之，以公共論壇表現台灣社會中久受忽視的問題，不然，總統大選的象徵政治難道只是制度性鞏固特定政經利益的階級行為嗎？公共論壇的論辯可以有具體的內容與民主的過程，我們需要容忍“異己”與“異見”。

第一次總統大選確有歷史的意義，民族國家的重構所需的政治正當性與合法性亟需來自草根的支持，問題是這張選票僅僅是以小利益複製了威權國家神聖的父權關係所交換的政治忠誠呢？還是台灣的社會的不同團體以它們所關心的現實生活問題，得以在公共空間意見討論的政治過程中建構其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呢？今天，做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動員了的台灣社會各自主性團體終於能在經濟與政治的夾縫中開始離開被國家鎮壓的宿命，政策形成的系統已經有可能向草根基層開放，這是建立國家與社會間新的歷史關係之機會。台灣的社會正因為對結構性問題解決的中長程期待與現實，反而弔詭地造就了台灣社會成熟與多元所需的歷史時間。我們何需執迷於第一次總統大選象徵政治的氣泡，但是，我們卻關心它所可能擠開的政策辯論的公共空間。知識分子本身的自主與自律，其政治投身，以及，批判性發言的干預距離，將顯示出其共同推動歷史的一分子之任務。在批判性公共空間的基礎上，我們才有機會期待下一步：能與市民社會的動員相結合的組織型知識分子與進步的政治力量之浮現。

十月廿七日一些環保團體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了一場聯合記者會，針對最近行政院送立法院的都市計畫法四條修正案要求另外附帶通過三條修正案，分別針對“都市計畫委員會組成”、“市民參與”、“回饋”等原則，提出修正條文。我與楊重信、曾旭正老師均參加了，我提出“市民參與條款”，發言如下，請參攷：

都市計畫法修正案聯合記者會之發言

一、由最近高層停車塔在住宅區中受到“法令鼓勵”而紛紛浮現，引起了居民的恐慌，紛紛組成自救會，暴露了新通過的停車場法實為一部惡法；以及，正在醞釀中的“都市更新法”修法，打算以樓地板面積轉移，鼓勵更新；還有，今天的都市計劃法四條修正條文優先審議通過的動作等等來看，這並不是偶發的事件，而是說明了一個權威國家正在，或是已經轉型為一個為金權所直接左右的“財團共和國”了。這也是在全球性“去管制”浪潮下的台灣版本。目前“地方自治、權力下放”條款精神甚佳，希望能配合增加“市民參與條款”，以落實地方自治，避免成為“地方勢力解套”之條款。

二、建議增修第十三之一條，條文如下：

都市計畫法應鼓勵市民參與並舉辦公聽會至少三次，向社區及市民團體開放，提供交換意見與討論機會，以做為都市計畫之擬定與審議通過之依據。

陳亮全

有關「住宅區容許設置大型商場、大型餐廳、保齡球館及旅館」之意見

台灣省政府在四月中通過修訂台灣省都市計畫實施細則，擬大幅放寬住宅區的土地使用規定，讓大型商場、餐廳、保齡球館及旅館等可以在住宅區內營業，此項修法目前已送省議會審議，且除了有關放寬大型商場、餐飲店、保齡球館設置規定之實施細則第十六條之一尚有爭議外，其餘修正條文皆已通過三讀的程序。由於本次省政府在修正此一嚴重影響全體省民的居住權與環境品質的條文時，未曾有公開討論、廣徵各方面意見的過程，因此本人願意提出以下三點意見，供大家對此黑箱、粗糙、且可能造成居住環境品質惡化、生命財產危險的修法進行討論時的參考。

一、本次省府修法，考其原因大概是因為有許多住宅區存有前述的各項行業，或是相關業者大吐苦水，認為若不能開放住宅的使用規定，他們就無處可去（例如因商業區土地太昂貴）影響他們的生存；若由此觀點看來，此次修法似有其必要性。然而是否無處可去確實是因為住宅區目前有如此規定才造成之說法卻未經較週詳的檢證，且獲得證實，因此讓人不得不懷疑此舉只是因相關單位過去未能有效執行規定，現在只好讓業者就地合法，以減輕被批評的壓力，或是產生省政府受到太多的壓力而無力招架，只好放寬了事等各種想像。

二、針對此次修法之過程與內容，以及基於過去的經驗，吾人至少可以提出如下四項不表贊成的理由：

1.針對此次修法，許多人馬上會產生公共安全的顧慮，然而談及生命財產安全之前，卻要事先言明此一放寬規定很容易，也最可能導致的影響恐怕是廣大民眾居家生活的環境品質將更形惡化。眾所皆知，在目前台灣省的土地使用或現行建築法規的規定之下，台灣的住宅區早已是混合使用，而且是部份的混合強度很高的狀況。而本次擬予放寬的幾類行業可能帶來的環境衝擊，勢必更多樣且強大；相關可能的影響只要到目前這些行業的營業場所稍加觀察即可清楚，例如大規模商業設施引來大量人潮、車潮（雙排、甚至三排停車，交通嚴重阻塞），部份保齡球館營業時間延至深夜，而且聚集許多騎機車、開車的年輕朋友，極容易產生喧嚷、噪音，餐廳廚房的抽風機聲、油煙、油水或氣味等各類污染因子襲擊周遭住戶，這些在在都是居住環境品質雪上加霜的原因。雖然有人認為這些可以用相關規定予以管制；但就目前商業區的各種規定都無充份因應上述諸多污染問題，那麼住宅區放寬後的規定就可以防止類似問題發生嗎？而假使果真能做嚴格把關，不讓現有品質受到破壞，那麼其規定不就與現有商業區相同，或甚至超出現有規定，那麼業者仍會前來開設嗎？如此放寬會有實質意義嗎？值得懷疑。

2.除了生活環境品質的惡化之外，令人擔心的當然是災害或安全的顧慮。由過去的經驗可知此次予以放寬的諸業種中，不乏多次引發重大傷亡火災的行業。或許會有人指出就是因為目前的規定，使這些行業多屬違規場所，以致無法依相關規定就其安全防災加以規範。但若詳加討論，如此說法卻毫無說服力，因為過去的重傷亡火災並非全在違規場所發生，有些合乎土地使用的營業場所亦有案例可查。而分析這些容易造成重大傷亡火災的原因不少，其中目前的建築法規並未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中容許混合使用的建築加以特別規範，例如不同使用的樓層仍然共同使用一處進口或同一座樓梯，其管道系統或管道間也未加以分開設置。如此鬆懈的規定很容易導致建築物的管理無法有效落實，即使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已公佈實施，但在目前既有建築的狀況下，這些管理上的盲點仍然無法解決。而且過去不少其低層為非住宅（如餐廳）的混合使用建築，在發生火災時，起火樓層的火災、濃煙很快地延及其他樓層，讓居住其內的居民或使用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得以逃生避難，以致造成多數人不幸罹難等諸多問題。況且依目前的修法，讓住宅區放寬使用，則是容許既存依住宅使用規定完成設計之建物得以改變，而導致使用者增加、使用強度集中或是單位面積荷重加重等課題。而使用強度如此改變的建物，其建築結構、電力或管道系統、避難逃生系統如何補強或修正，在本次放寬規定中都未曾提及。而且既有研究已清楚指出，許多火災是發生在改變使

用（尤其是增強使用）後的建物；另外，放寬規定可能導致結構負荷改變，甚至超重之情形，將對臺南等地震易發生地區造成甚大威脅。總之，目前如此粗糙的修法放寬，確實無法保證目前已十分嚴重的公共安全問題不會更為加劇。

3. 許多行業願意選擇住宅區開設乃由於住宅區之地價較為便宜，但若將住宅區使用開放，且對地價毫無管制措施，則住宅區地價的上昇是無可避免。如此結果不但不利獲利較低的業務行業或一般零售業尚可保住棲身之處，而且更嚴重的將可能引發住宅價格更形上揚，讓無屋居民的住屋問題更趨無望。

4. 極有可能導致上述諸多問題的使用內容的放寬，對於台省千萬餘省民的影響不謂不大，但從其決策過程觀之，不但未事先告知一般民眾（居民），甚至就理論與實務或是其優、缺點等，都未曾經過學者、專家、行政官員的公開討論。影響層面如此廣大的重大決策過程竟然如此不公開，完全令人難以理解與信服。

三、基於上面所述不表贊同的數項理由，以及為促使居住環境品質的確保與違規行業就地合法化（亦即放寬使用規定）能得到平衡，擬建議以下數點提供討論之參考。

1. 由於現行都市計畫法及其實施細則，尤其是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與現實都市狀況或土地混合使用的習慣有相當差距，以致相關機構的執法未能落實，民眾（含業者）亦深感不滿與無奈。因此應藉此時徹底檢討，例如目前只在地形圖上塗顏色的平面式土地使用管制是否合適國人的生活、生計形態；或是現有劃定為商業使用之地區的容積率是否已全部用完，還是有相當部分仍沒有使用或只做為住宅使用；有關土地使用類別的訂定要採正面表列或採負面表列或甚至可採其他形式等等。總之實應利用此一契機，就施行多年的都市計畫法做一全面檢討。而且不只是都市計畫，其他相對應之建築法規、消防法等，亦必須加以修正或補充。例如前述之允許混合使用之建築規定，是否與全為住宅使用之建築規定相同或要有差異？亦是重要課題。

2. 對於既有住宅建築但擬變更使用之建築應有一套周詳的許可與執行辦法，而且該辦法至少應包含兩個層面的審查：其一針對因其使用變更可能引起外部環境的衝擊，例如可能引發的交通量（含停車）或是各種環境污染問題。其二則是使用改變可能造成建築物本身的衝擊；此一方面，例如因使用強度增強，使用者數量增加即必須強化的避難設施，或因使用電力增加，其電力系統的重新配置。而且如此的改變因其既有建物的條件，以及擬變新的新使用內容各有不同，因此不宜以條文式的標準規定全面適用，而應是針對個案加以審查之許可制。另外，

放寬規定是准許建築物整棟變更或部分變更、全街廓變更或獨棟建築變更，都應詳加討論，如此才能真正達到確保環境品質（尤其是安全）的目標。

3. 上述建物使用得以變更之許可過程必須納入居民的參與。由於土地使用變更如前所述會引起諸多問題，對於該建物內部以及周邊居民的權益影響甚重，因此是否可以變更應事先告知居民，徵詢居民意見，甚至取得居民的同意，台北市有關商業區變更的辦法草案就有考慮類似之規定。而且對於因變更可能造成居民或社區的不便、損失，或是因此必須增加的費用等，應該如何補償、回饋等的辦法，亦應事先加以討論，並有效的執行。

以上三項建議，並未能對是否可以允許住宅區變更使用，或因其變更可能引發的諸多問題，提出周詳的檢討與對策，但如此的建議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有關當局與民眾的重視與關心；針對如此重大決策應該更公開、更多元的討論、研擬，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如此過程才不會在實施之後，引起嚴重的反彈，也才能保住台灣都市之環境品質與民眾的生活也不會再遭受更大的衝擊或破壞。

林峰田—二次大陸之行

我在八月初和九月初，分別去了二趟大陸，參加「空間科技研討會」和「城市科會研討會」。

空間科技研討會係探討如何應用遙感探測和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以解決防災、資源調查、都市發展等問題。是次會議在福建省福清市(福州市南方)舉行，會後參觀了福清市的工業區開發，大會更安排了沿著莆田、湄州、泉州、廈門一線的參觀行程。

1995年9月5日，在南京紫金山麓東郊賓館舉行海峽兩岸都市規劃研討會，雙方發表了11篇論文，進行學術性的交流與討論。這次的研討會在大陸方面的精心安排下，收穫甚豐。辛晚教教授在閉幕詞的結論，更是精闢扼要，精確的點出了兩岸城市規劃工作的異同之處。茲不惴淺陋，將辛教授宏論，就記憶及理解所及，整理如次：

1. 兩岸的土地制度有根本性的差異。大陸的土地乃是公有，住房則是可以私人擁有。城市建設的房屋拆遷並不發給補償費，而是先建後拆，並易以新屋，並對原居住面積過小者，給予符合最起碼居住面積之住房。縱使區位條件較差，但由於明顯的改善了居住條件，市民大多仍能接受。台灣則為了拆遷補償費的計算問題，造成土地取得的困難。

2. 都市規模之概念不同。大陸所談的「都市」，相當於台灣的「都會區」；大陸所謂的「市中心」才是台灣所通稱的「都市」。所以，大陸的都市計畫是兼含都市及非都市地區的。

3. 規劃重心不同。從大陸代表所提的論文可見，大陸的都市計畫工作是側重實質面、工程面的。其論文內容對規劃成果做了很多的介紹，可以說是屬於「藍圖式規劃」的典型。台灣則是強調規劃過程的合理性及公平性，較注重社會、經濟、民眾參與、體制、法規的問題。

4. 土地使用型態的差異。大陸大量的採用「環」的觀念，台灣則有「點、線(軸)、面、環」等不同的空間組構。

5. 大陸強調「計畫」及「管制」。台灣則注重如何達成目標的「發展步驟」，以及之後的「經營」、「管理」。

6. 兩岸對於「自由」涵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這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釐清的，有待於爾後的繼續交流，相互了解。

從福建看台灣

八月初的閩東南之行，一路下來，令我感覺到，如欲對台灣的都市發展史有進一步的瞭解，福建的風土民情和開發過程是一組不可或缺的對照知識。舉三個例子來說。

(一) 在台灣的閩南建築多是一層平房，但是在閩東南卻普遍存在著二層的閩式建築。在二層的陽台也特別的廣大，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二) 廈門的中山路是最早的街道，有近百年的歷史，時至今日，亦仍是最熱鬧的地段之一。這條街的建築立面，相當有風格，在整體調和的立面之中，個別建築充滿了變化，頗有日治時代台北重慶南路的味道。此一街道不知是經過都市設計或自然長成？塑造此一街道風貌的歷史力量究竟是什麼？

(三) 泉州自唐代即是世界大港。從泉州市的海上絲綢博物館的展示品裡，吾人可以看到世界各大宗教的融合過程。此一歷史因素，對台灣宗教佛道不分的現象，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解釋。如果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它在建築層面上，是否也有著相同的影響？

古蹟修復

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多災多難，對於古蹟文物而言，更是浩劫不斷。自從八〇年代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也開始了古蹟修復、止痛療傷的工作。由於歷經了歲月的摧殘以及多次的人為浩劫，許多的建築已經不復存在，文物也已喪失。如何回復昔日景觀，遂成極大的挑戰。吾人發現，大陸的歷史建築與文物修復者，除了多方考證資料，以為依據之外，亦並非一成不變的。在修復的過程之中，可能在掌握其神髓之餘，加入自己的創意，將空間做新的詮釋。例如，揚州大明寺棲靈塔並非原址，瘦西湖二十四橋更是創作。杭州靈隱寺大佛雖是新作，因加大其佛身，而更見其雄偉。紹興蘭亭之曲水流觴，雖非原處，而意境猶存。西湖累有歷代盛名，然觀其舊照，經戰火之摧殘，不免心驚於當時之殘花敗柳；於今則已復其歷史風貌，岸邊再度遊人如織，引人一探白蛇、梁祝之芳蹤。

相對於名勝古蹟之修復，歷史古街區之保存與更新是一個更大的難題。江南水鄉，自古聞名於世。但是，走近一訪，公廁臭味難聞，故當地居民亟盼當地政府能早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然而，有許多人更深怕江南美景從此一去不返。這種存在於古街區保存和生活環境改善之間的衝突，恐怕是中外皆然；只是兩岸制度及條件不同，其處理方式也將各有所異吧！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名勝古蹟及古街區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死物，而應是仍在活生生的走在演進的道路上。如何將好的基因保存下來，賦予新生命，甚至在其它地方予以重生、繁衍，這是大家的共同課題。



這是說一個“異類”入侵的故事，借秀一下。

「停建中央黨部 還歸全體市民」行動漫畫

性別與空間小組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開鑼了！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一、緣起和宣言

女人在城市中生活，但是她們卻隱而不見；女人是社區的組織者，但是她們卻極少被賦予決定空間的權力；女人是家的養育者，但是她們充其量只是維持者，而不是真正擁有家的主人。她們總是被認為「應該」待在屬於「女人的地方」。例如，好女人絕不會在「夜晚的街道上」獨自行走，而選擇「獨居」與「在酒吧中享樂」的女人則被聯想成壞女人。性別歧視空間化的結果是導致女人在城市中隱身，在公共領域中被消音的重要原因。

有權決定實質空間的大多是男人，因而奠基在男性經驗之上的「人」造環境，其實是「男」造環境。有能力決定城市空間的人，無非是建築師、工程師、地產開發商、政府官僚與金融單位等，但大部分的女人仍被阻絕在這些行業之外。尤其是決定空間生產者的空間專業教育，也是男多女少；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女人得以擁有專業訓練與能力，讓更多的社區婦女得以參與決策，以改變男性壟斷決策的局面，因為改變空間的編派使用，就是改變社會。

在這個時刻「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終於在各方殷切的期盼中成立了。研究室的成立，可視為一個新階段的性別改革運動的基地，不僅僅是近幾年來台灣女性主義自覺與改革在空間研究上累積的成果，同時也表示空間專業中女性主義者持續對抗「專業父權」與「性別歧視」的目標不變。

我們堅持看見女人、研究女人以及重視女性使用者的聲音，並且宣示打造無性別歧視的城市，就此開始。

二、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當天活動分為動態活動與靜態展示兩大部分。動態活動包括：發表成立宣言、「性別歧視的都市空間」專題、午茶時間暨「空間體驗之旅」、「婦女與社區」座談會；另外與午茶時間同時進行的還有兩個攤位：女性空間專業者與你對話、具有性別意識的錄影帶播放、以及大會的臨時托兒所等。靜態展示則包括女性空間專業者的設計作品展，關於家、住宅、市

場、公園等的論文簡介，具女性意識的黃色笑話、漫畫、小故事等的海報展，空間專業教育中的性別比例統計圖表。

由孫瑞穗所製作的「性別歧視的都市空間」專題，主要是以幻燈片簡介及口頭說明出現在台灣社會隨手可得的一些性別歧視即景。內容分為四大類：性別的社會/空間化過程、家的建構、性別歧視的城市及反抗性別歧視的十種策略。本專題並得到王志弘、李宛澍、畢恆達、殷寶寧、楊清芬的熱心提供資料。

專題之後即是午茶時間。在午茶時間隆重登場的是「空間體驗之旅」，各站佈景就設在國際會議廳一出來的轉角。第一站所參觀的是廁所，我們把平時女賓止步的男廁連同女廁通通霸佔下來，開放供大家參觀、欣賞，這一站其實應該命名為「超級比一比」，比比看男廁和女廁誰大誰小。第二站則是廚房，站主是淑靜、彩燕和大娟。你曾經在狹隘、油煙瀰漫、滿頭大汗的廚房中工作過嗎？沒有？沒關係，假裝你就是在廚房裡工作的媽媽，不過在廚房中工作還只是小case，還有電話響、門鈴響、寶寶在哭、突然下雨得趕緊把曬在外面的衣服收進來等狀況同時發生，讓媽媽手忙腳亂、焦頭爛額；第三站是魔鬼階梯，魔王是惠雯和珍珊，以抽籤來決定要如何下這個樓梯，譬如像是身懷六甲而且背著寶寶、提著菜藍；第四站則是黑暗陰森的轉角，黑色的布幕上恐怖猙獰的人皮面具、各式各樣挑釁的言語，像是「小姐，妳好漂亮！」，「小女孩長『大』了唷！」；出了轉角，則有一位大帥哥林正雄扮成大野狼，分送空間體驗小選集，提供參與體驗的人重新思考我們身旁的空間。

至於與午茶時間同時進行的兩個攤位，一個是女性空間專業者與你對話，當天來的女性專業者有寶蕙芸、何碧娟、彭憶祖、曾蘭婷、顏毓芬、小毛、穗穗等等。一個是錄影帶播放，主持人是親切可愛的鯉妃。臨時托兒所則是考慮與會者多為女性，而成立大會又在星期六下午舉行，為了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無後顧之憂的參與大會，所以成立一個臨時托兒所。當天一共來了”兩”位小朋友：小姐姐晴晴和一個還不會說話的好奇寶寶，是當天最悠閒的一個小站。

「婦女與社區」的座談會則邀請主婦聯盟、社區婦協、袋鼠媽媽讀書會、社區總體營造規劃師和政府代表，各自對：社區婦女創造資源的主動性、婦女主動參與社區（角色、時間等）的衝突、社區運動和性別自覺、挑戰社區的家庭意識型態等等四項議題提出看法，並且和與會大眾做討論。

三、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創刊號

假使您錯過了熱鬧滾滾的成立大會，沒關係！”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創刊號”以文字記錄了當天的精彩活動內容。創刊號的內容包括了：

◇何謂性別歧視的空間？（穗穗的「性別歧視的都市空間」專題）

◇婦女與社區專題

◇台灣個案經驗研究小輯：

 婦女與都市公共空間安全：文獻回顧

 婦女住宅空間體驗之初步分析

 交通行為的性別差異：萬芳社區個案的初步分析

 淺談性別與空間消費研究

 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政策與婦女：謙和市場個案

◇「性別與空間」研究之相關參考文獻三百餘筆。

◇書評與翻譯

全書厚達兩百餘頁，定價每本only200元，保證物超所值.....。（來喔，緊來買喔！...）意者請洽：

1. 劃撥帳號：18727192 畢恆達先生；或

2. 唐山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02)363-3072

四、本研究室目前的活動：

1. 午餐的約會

現在研究室每週有一個聚餐的活動，雖然大家平日都非常忙碌，不過經調查發現星期三大家比較有空，所以我們現在都約定在星期三工綜館午餐的約會啦。可是要自備午餐喔！

2.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圖書室

早在研究室的圖書室尚未開張之前，就已經有許多對性別及空間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前來詢問及借閱圖書。為此圖書室訂定了一套遊戲規則，

並且已經正式開張。圖書室就設在工綜館的318室的最最裡面，有興趣的人可以前來尋寶。

開放時間是：週一到週五：9:00~17:00 (12:00~13:30為午休時間)

3. 協辦“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

此研討會為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所主辦。欲發表論文者請於年底交摘要，明年三月發表。

4. 電台節目“兩性問題面面觀”

研究室在漢聲廣播電台上開辦一個節目“兩性問題面面觀”，本節目的時間為：每週六早上8:00-9:00。主題包括：

- 1) 教育媒體的性別歧視
- 2) 性別意識的喚醒過程
- 3) 家
- 4) 住宅問題
- 5) 社區問題
- 6) 市場與公共空間
- 7) 交通：女人做為乘客的觀點
- 8) 交通：女人作為運輸工具的駕駛者，學開車的經驗..
- 10) 性騷擾
- 11) 教育與中小學生的性別觀念
- 12) 專業教育裡的性別關係

5.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bbs站

本研究室即將在新成立的性別bbs站上設立一個據點，日後對於研究室現有資料的查詢與取得將更加方便迅速，討論與交流也將更多元與便捷。不過，目前本bbs站尚在test階段，敬請各位密切期待！

6. 最新消息！

王志弘將在本研究室開辦第一個讀書會與工作小組：「男性研究與女性主義」(Men's Study and Feminism)

時間/星期三的中午，but是隔週一次；地點/工綜館311室

第一次的讀書會/11月22日

適用對象/男女皆可，只要有興趣

簡介/

男性研究在台灣還是草創期，沒有傳統或流派可言。由於性別的議題是由女性與女權運動而浮上檯面的，所以通常集中在女性的討論上，而男性經常作為一個負面的對立面而出現，不是父權結構的承攜者，就是要被排除在女性團體或國度之外的干擾者。不過，近年來由於女性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質疑了性別建構的本質論述以後，男女的截然二分已經鬆動，加以關於性慾特質之探討和同志論述的蓬勃發展，性/性別/性別外貌/性傾向的多重組合也開啟了兩性對立之外的新空間。在這個特殊的時勢裡對於傳統男性角色與男性氣概的批判更顯得迫切，必須開始深思和探討。

讀書會與工作小組的構想，除了閱讀一些有關男性研究的書之外，重點是思考在女性主義批判父權體制的潮流下，大多數佔社會優勢的「男性」應該有什麼對應與自處之道。此外，希望研討的成果或是收集整理的資料可以發表在《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這也是名為工作小組的用意）。



性別意識的覺醒歷程

怡瑞

於1995,10,23

我進城鄉所已經快滿一年了。

在尚未進城鄉所的前四年裡，我離開了家，住在新竹念書。而大學中後面的兩年，我和一個男孩正式交往，並且因此認識了一群男孩子。生活在他們的中間，很多時候會自然覺得自己被同化成了一個男孩子，但內心及外表又是一個十足的女孩子。

後來想想會覺得，和那個男孩以及那些男孩相處的點點滴滴，都是我後來可以經常不斷的思考性別議題的豐富材料。

去年十月底，我結束了第一份工作來城鄉所應徵助理的時候，我告訴畢老師說：我對性別的議題很有興趣，但是當時我說不出來性別的差異，我只恍惚覺得男生和女生是不同的，但無法具體的說出來。

後來畢老師建議我去修當時他開的一門課：性別與環境，而且還參加了女性讀書小組。那時候只覺得因為我對性別的議題什麼都不懂，所以出席和聽課就特別的努力，想把所有的落差補起來，我像一塊海綿一樣的吸收而且成長，學會怎麼樣從性別的角度去思考。

受了這些性別意識的概念薰陶以後，我會和我的死黨們打電話時訴說新學到的東西，聚會時後也嘰嘰刮刮說個不停，就像在傳教一樣，要她們信我者得永生。一個女生聽了我說的一些自以為前進的行徑以後，她發出一種懷疑而且害怕的聲音（像是ㄎㄉ唷～）；一個女生在看了我介紹給她的書以後說：「這是你們這些自詡為女性主義者在讀的書嘛！」另外一個女生用悲憐的眼神和口氣說：「怡瑞，妳真的中毒太深了！」

而對於男生，我比較不會跟他們細訴我的新知新見解。當男生努力的以高談闊論來表現自己的深知卓見時，我有時候是冷眼旁觀的，只有當他或他們露出一點點性別歧見的馬腳時，我就會好像賓果似的反射一句：「你性別歧視！」有個男生本來約我出去，想在咖啡屋和我共享一個浪漫的午後。結果，因為他不小心洩露了他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於是，浪漫的午後馬上變成一個爭執的午後。經過一場冗長的辯論以後，離去前他說：「要是我以後結婚，我才不想每天跟老婆吵架，吵什麼地是我掃的、飯是你煮的；我希望家是一個很舒服、可以休息的地方。」

和我住在一起的樓友也被我發現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主義者，當我說了：「你性別歧視」的話以後，他索性很坦然的承認：「我本來就是大男人主義的沙文豬，可是女生不做家事的話，難道要男生來伺奉妳嗎？」「男生本來就是天生的決策者嘛，你只要看看社會上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可以明白：站在決策者的位子上的，大多都是男人。男人冷靜、理智，有做決策的特質。」「雖然也有母系社會，可是社會進步以後，就會自然的演進成為父系社會，所以父系社會才是進步的社會。」我弟弟則用諷刺和嘲笑的口吻說：「你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研究了嗎？連廁所也可以拿出來研究？」

媽媽則是憂心忡忡的說了好幾次：「怡瑞，妳以後肯定不是什麼顧家的好女人，一定是個在外面野來野去的野女人」我本來很想頂嘴的，但還是吞下去了：我是不顧家，也肯定不會是個所謂的好女人；但我卻是個會讓自己快樂的女人。我有點沾沾自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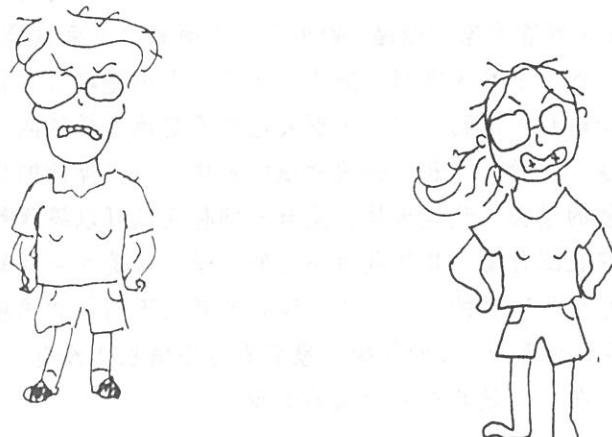
看報紙、書籍還有電視也會帶著一副全新的眼鏡去看。有時候以前覺得沒什麼的一些報導，現在一邊用嘲笑和鄙夷的眼光悲嘆它思想觀念的落後，一邊憂心忡忡的煩惱它一再的灌輸和加強父權的機制

連去上室內設計課也不例外，補習班的老師忙著在課堂上講如何才能把廚房的面積縮到最小、最經濟，規劃豪華氣派的客廳，主臥室和老人房；我心裡正在規劃的則是一個很大很舒適的廚房，一個像和室一樣的客廳。「老人房？」我在心裡竊笑：「你說的老人房應該是公婆房吧？」

對於過去我也有所解釋，我終於可以很明白的對我自己說相愛為什麼會那麼痛苦，雖然我至今仍然相信兩情相悅是很美好的事；但是在一個父權的社會之下，女人就需要犧牲和奉獻以成就一個男人（男孩？）。我經常很生氣的問他說：為什麼你可以丟下我，然後去跟你那些難兄難弟們去玩樂？那個男孩也非常的不能瞭解我的寂寞和憤怒，他只是和他的朋友去玩玩罷了，我也可以去找我的朋友玩啊，可是我當時無法解釋為什麼交了男朋友以後，我的朋友就少了，生活圈也窄了，整天和他以及他的同學朋友在一起，我什麼都沒有了，我跟我的過去幾乎斷裂。他拒絕走進我的社會網絡之中，而我卻很自然的走進了他的網絡，然後發現自己很孤獨、無助，沒有安全感。越到後來，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泡泡般的消失了，我已經沒有我，都變成了他，我已經走進了他的生活，我因為他的種種需要而活著。那種感覺一直到今天還很鮮明。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後來也才知道：不是我一個人這麼孤單而已，全天下結了婚的女人都會有類似的感覺，告別過去，重新進入一個社會網絡，然後自己就逐漸消失了；而男生不必，他們也不會消失，他們只需要永續經營就可以了。

後來還把很多和他相處的過去拿出來反省，為什麼有很多事我都不能採取主動呢？他說：如果我主動的話，會戕害他的男性自尊。還有裙子、褲子不能穿太短「因為男生都蠻自私的」他含糊的說。如果發脾氣，也不能一個人很性格的（像莉香一樣的）掉頭離去，一定要讓他送，因為晚上一個人回去是很危險的，能夠拿出來反省的太多了，族繁不及備載。

然而我現在更憂慮的是：我是不是有可能藉著女性主義的旗幟，自以為前衛先進，自以為了不起呢？因為我其實還是活在父權的社會裡，活得很好啊。我的死黨說：「理想歸理想，生活歸生活，這（父權的社會）是現實，要活得快樂一點，就不要對抗現實。」我在想：其實我並沒有在努力的對抗現實，我還是在父權的社會裡，很怡然自得的活著，骨子裡還是離女性主義很遠的；然後以高唱著女性主義的歌聲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以為自己是前衛先進的，不隨俗於一般社會大眾。其實不過是個夾在女性主義與傳統女性中間的邊緣人而已。



親愛的鹹蛋媽媽

親愛的鹹蛋媽媽：

我想現在我可以了解一些些你的感受。這是一個多月前發生的事，那種被孤立、頹喪的感覺，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

九月底，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立了，成立大會當天，我們為與會者提供了托兒的服務。其用意當然不是再一次肯定「照顧孩子是媽媽的天職」這回事，而是在現有的社會情境下，讓許多要帶小孩的媽媽以及爸爸有更多參與性別議題的機會。這是件好事，我們樂觀其成。不過，幸或不幸，活動中途我進入了照顧托兒的行列。

小朋友人數不多，但就因為是臨時服務，想要讓孩子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渡過父母不在身旁的三四個小時，其實並不容易。我的主要工作是看著一個「一歲多剛學會走路因而非常喜歡走來走去的好奇寶寶」，不玩得太過火，更不能受傷。也就是成為他的貼身保鑣。原來負責照顧的學妹見到有幫手來了，很高興的說，「我們去聽聽演講（當時的活動）囉」。剛開始，我想也是短時間的看看小朋友，不會有什麼負擔。過了半小時，心情越來越糟。疲於奔命是小事，我發覺這個托兒站就像浮在會場外的星球一般，與整個活動搭不上什麼關係，我們已經不屬於活動內參與討論的一份子了。

我極想知道會場內大家在說什麼，於是抱著小朋友溜下二樓，或許可以從會場開門的一瞬間聽到一兩句話。我知道抱著小孩進入大人討論的地方是很不道德的，因為小朋友會影響大家的情緒，帶小孩的人絕對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晃了一圈，再晃一圈，怎麼大家都這麼用心，沒有人中途離席！在場外碰到朋友，從小朋友開始聊起，談到別的，小朋友已經不耐地想掙脫開了。於是只好踩回托兒站，那個「屬於女人和小孩沒知識的星球」，我悻悻的想著。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越來越巴望有一個替死鬼可以讓我暫時喘息一下，聽聽會場到底在講什麼，其實我也不怎麼好學，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那種感覺很難受的，你知道。現在連聽到不相干的隔壁傳來的一陣笑聲，都會讓我忌妒得要命。我們幹嘛這麼負責這麼犧牲？沒有人會感激我們，倒楣的在這邊帶小孩，成就其他人知識的進步。

五點了，該結束了吧，沒有，好像再一下下。五點半，小朋友開始不耐煩了，餓了，也累了。我幫小朋友清清洗洗，漚漚玩得髒髒的證據，不時引領翹望，看到媽媽來了嗎？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小朋友終於還是髒兮兮的還給媽媽，老實說，到後來我簡直不想再理他了。只把自己當作「研究兒童心理的旁觀者」。

開會為什麼開得那麼久？！oops，好像你那時候抱怨先生的口氣，我也染上了。當時只覺得你未免太小題大作了，很少有準時結束的會啊，不過晚個半小時多，有什麼好氣的，我才氣你為什麼一點也不長進我們討論的時候你總是心不在焉一副無法進入狀況的樣子。現在我大概稍稍了解一些，也能體會你說的「帶小baby的那一段時間，原有的知識呈現真空狀態」，以及「你們這些自稱女性主義的知識份子根本不了解真實生活」。

好吧，想像我是一個必須帶小孩的媽媽。當我參加朋友的聚會或討論時，好像除了必須與小朋友奮戰，還要認份的把自己安排在邊陲的地位。在帶小孩的當兒，生活除了小朋友還是小朋友，因此在與朋友的聚會中，一旦小朋友不成為話題中心，媽媽就必須與小朋友消失在圈圈外，履行帶小朋友的天職，讓其他更內圍的人進行「高深知識」研究，同時，也由於長期缺席孩子以外的世界，帶小孩的媽媽無法再加入一些超出孩子範圍的話題了。

是這樣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以前真是大錯特錯，責怪你滿腦子為何除了孩子經就是不長進。這樣的問題有辦法解決嗎？我想，各項會議提供「托兒服務」其實是很實際的構想。不過，我們可以讓資訊更透明，更易取。托兒由與會者輪流照顧、會議資料留存或立即放送都是可能的方式。另一方面，我認為自稱女性主義者必備的能力就是時時反省，反省是否因為比別人早得道而忘了自己辛苦的過程，或無視於他人汲汲進步卻也無法掙脫許多枷鎖的問題。我們比較有機會接觸新思想的人，實在應該多為想參加又不便參加的潛在觀眾，讓他們更有能力，也更有意願一起參與。

真是「幸與不幸」，短短兩個多小時就讓我嚐到卑微孤立與被拋棄的感覺。我有一個小小的陽謀，嘿嘿嘿！下一次我就安排個情境讓大家也體驗看看，你說如何呢。

敬祝 好

清芬

我叫林怡瑞

於城鄉所1995/10/26

唉！我是最不會寫稿的人了，沒想到還是被抓到。尤其是看到清芬快快就寫好的”鹹蛋媽媽”，更是覺得：人家想說的清芬都已經說了嘛。可是看到溫炳原一副無辜可憐的樣子，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意的在這裡那裡晃來晃去，彷彿在說：喂！妳還沒交稿喔！只好努力的把腦袋像在擠那種已經用完的牙膏一樣，死命的擠一些東西出來囉！

回想起來，最初和清芬一起接下開幕活動的工作，是在六月底一場場兵荒馬亂中的籌備會中，大家紛紛各自認領自己的工作。我跟清芬總是在冗長的會議下面偷傳紙條，在會議資料的角落畫娃娃，畫ㄅㄨㄚ、冰...覺得性別的議題其實不應該這麼嚴肅，應該也有一些輕鬆而有趣的表現方法吧？

而遠在進城鄉所工作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想要在過完暑假的九月，存夠了錢，就要飛到法國去打著唸書的幌子流浪的。然而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的出現就好像是半路殺出的程咬金一樣，讓我左右為難。慌亂之中接下的開幕活動，彷彿是一張可以照自己意思亂圖亂畫的白紙一樣，令人興奮又不知如何下筆。和清芬一次次天馬行空的的亂說，開幕可以怎樣怎樣的玩，使得我越來越上癮，放不下要成立的研究室，捨不得丟下她自己一個人去法國，甚至一想到研究室即將成立，就會有熱血澎湃的激動咧...就這樣，我自己偷偷的決定要留下來。美麗的法國，就只好再請妳等一下吧。

然後就在我和惠貞，清芬的胡言亂語中，一個”性別與空間的體驗之旅”就跑出來了，可是，可以體驗些什麼呢？我們在那幾個地方探頭探腦、鬼鬼祟祟的走來走去，想像，...

鬼點子雖然是想出來了，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實在不曉得能找誰來幫忙，尤其是大家都分頭行事，說好了沒有人可以支援的，我樂觀的跟清芬說：沒關係！沒關係！我有好多高中、大學的同學，去找她們來幫忙。可是，後來才發現，那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時間越來越迫近，就覺得好像什麼都還沒著落，更別提我那些只會吃喝打混的死黨了。畢老師和宛澍都皺著眉頭說：怎麼覺得好像怪怪的？對啊！好怕當天開天窗，怕沒有觀眾來看我們在搞什麼，怕空間體驗之旅玩不起來，怕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倒店了，...不過，幸好有好多好多的人到前一天都來幫忙了，該謝的人太多了（雖然我沒有得獎）尤其是前一天下午，看見廚房”蓋”好時那種感動，簡直是筆墨難以形容。

惠貞也是因為交友不慎，被我們不幸拉下水的可憐人，現在想起來，很多事情都是前一晚才搞定的。晚上等所有幫忙的人都已經離去以後，我和惠貞回到工

綜館的三樓，惠貞一直不知道在問自己還是在問我的自言自語：要不要留下來把它弄好呢？我們兩個猶豫了很久，最後決定留下來，不管弄到幾點。慢慢的刻字，影印，畫海報，..夜晚的工綜館顯得特別的悠閒而安靜。

托兒所也是之前在不知哪一次的討論中出現，被否決掉以後，因為惠貞的堅持而再度敗部復活。我心裡想著：我曾經去帶過小孩，應該難不倒我。不過，後來證明我不只樂觀，而且是天真，因為在那樣的環境之下，小孩的爸爸和媽媽都不在小孩身邊，我們又是小孩不熟悉的大人，好在天公可憐我們已經鞠躬盡瘁、精疲力盡，當天只來了兩個小孩而已，卻還是讓我們手忙腳亂，整個下午特別地漫長，我一邊呆滯的看著小孩，一邊想：唉！不知道來了多少人？會不會有好多好多人？還是很冷清？現在大會的流程應該開始了吧？那個空間體驗之旅不知道怎樣了？反應好不好？等一會兒一定要下去問問他們...

等到我們關了托兒所的時候，整個大會都已經結束了。大家臉上還留有興奮的笑容，我只能夠從那種模糊的興奮的氛圍中猜想，可能一切都還蠻順利的吧？有出ㄎㄟˋ的地方嗎？看來應該是圓滿結束了。稍微收拾一下，趁著還是兵荒馬亂，我和清芬兩個就騎著腳踏車回去了。路上聊起那種被隔絕在外的孤立感，真覺得一下子很能體會好多的媽媽們，被孤立在一個個的家庭之中，犧牲掉自己成長的機會，默默的付出，只為照顧下一代健康完整的成長，然而等到小孩大了以後，飛走了，留下她，她們，...當時我想到我的媽媽，我只想趕快回去休息，因為好想睡個大頭覺。另外還想看看媽媽，但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如果我說我好愛她，她一定會叫我滾一邊去。



我贊成，可是...

畢恆達

當我們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與企業主管絕大多數仍然是男性；當我們的民法、工作法仍然漠視女性的權益；當家事育兒、照顧老人病人的責任仍然落在女人的身上；當女人仍然要在公共廁所前大排長龍；當性騷擾與性暴力仍然不時發生的時候，爭取女人的發言權與成長空間為甚麼始終得不到合法的地位？女人一站出來，似乎就會遭受許多反擊。這些反擊出自男人，也來自於女人。

您是否經常聽到或者也發表過如下的看法：

「我贊成女人參政，可是女人為甚麼要玩零和遊戲。」「我同意女人應該要為自己爭取權益，可是女人為甚麼要挑起兩性戰爭，製造社會動盪不安。」這種明裡表示支持婦女運動的說法，其實骨子裡仍然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女人參政只不過是爭取女人本來就應該享有的權利，為甚麼硬將它解釋成為女人要取代男人成為新的霸權！

「我同意我們的社會是個歧視女性的社會，不過我正好沒有。」大家都沒有，那是誰在歧視女性呢？

當女人開始談論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分擔家事等問題的時候，男人總是說：「妳為甚麼一定要談這些，我們的生活本來很快樂的。」既得利益者當然過得很快樂。如果女人和男人有同等成長的機會，女人也會很快樂的。

「你為甚麼老是談女人。」社會上習慣於發聲的是男人，既然大家都是男人，男人與男人之間的競爭當然不用強調性別。不過男人倒是經常將族群與黨派放在嘴裡。當報紙、電視、廣告，仍然從男人的眼睛觀看世界的時候，難道不應該盡力爭取表達女性經驗的機會？

「你難道沒有事做了，連廁所都可以研究。」一個社會如果公共女廁的設計都漠視女性的需求，再多的政治宣言其實只是空談。

「這不是婦女問題，是人性問題。」沒錯，我們應該談人性，但是只談論人性，社會裡婦女受到歧視的現實問題通常就被稀釋、犧牲掉了。

當女人不甘於社會中從屬的地位，因而大聲要求爭取女性權益時，男人馬上又說：「女人也談情慾、上街頭、玩政治，那不是和男人一樣壞嗎？」難道，女人就只能順從與認命？

城鄉所發展史徵稿啟示

「城鄉所已經二十歲了！」

●1975年台大土木研究所聘請王鴻楷教授成立都市計畫研究室

●1982年台大土木系茅聲熹教授為都市計畫室側門題對聯：

「綠圃庭前無名山，紅樓院後有奇人」橫批：「山中傳奇」

●1988年夏都市計畫研究室突破萬難，終於正式成立「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城鄉所二十歲了，我們希望能在二十週年所慶時，將這披荊斬棘的悲歡歲月，提供所有師生、校友暨同仁們回味共享。

然而由於事隔多年，許多原始資料早已亡失。但是這彌足珍貴的情感與回憶，相信仍然深深地存在於大家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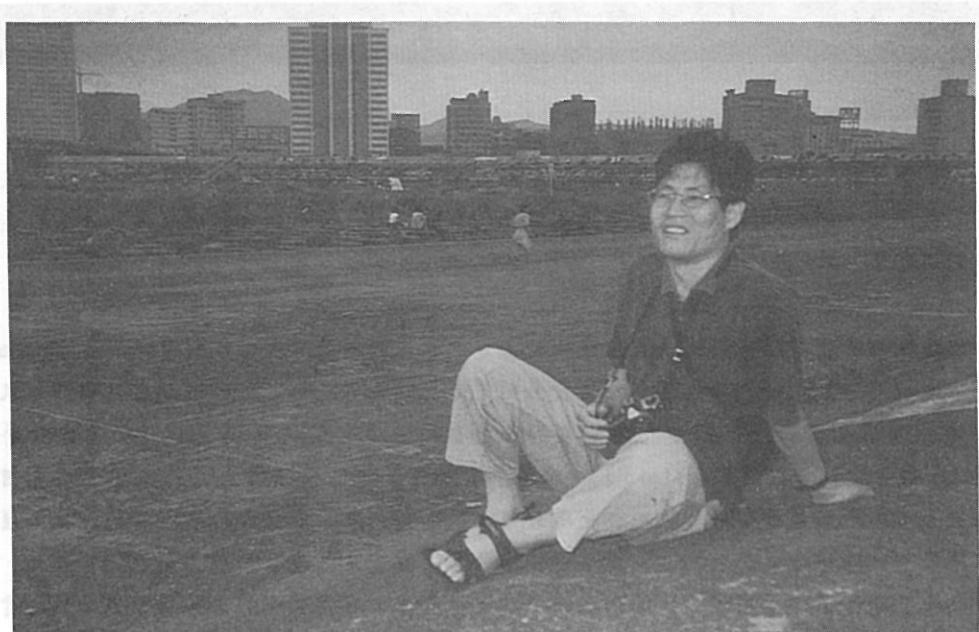
我們殷切地期盼大家賜稿，希望透過本次徵稿能獲得本所歷屆校友及歷任教授、助理的鼎力支持，無論生活照片、雜感隨筆或是專業領域之沿革，都是我們所盼望的。

來函請寄：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工綜館）
葉乃齊 收，即可。

崔誠烈紀念專輯

目錄

送別崔誠烈同學-----	2
給逝去的同志-----	4
懷念崔誠烈-----	6
回憶崔誠烈-----	8
也許，只是暑假的一趟旅行-----	9
別了，崔哥哥-----	10
韓中行程紀要-----	14
記一段失去地圖的旅程-----	17
兩個殖民總督府-----	21
探討九十年代南韓民族主義的種族中心主義-----	25
漢城的韓屋保存與環境運動-----	34
民族主義現形記-----	39
我看歷史保存——一個另類觀點-----	46
漢城的都市發展過程-----	52



崔誠烈 紀念專輯

1962-1995

韓國仁川人，畢業於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之後赴笈台灣，展開了另一階段的學術生涯。1993年順利取得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其碩士論文《國家，大資本與霸權計畫：台灣與韓國發展經驗的比較》同時榮獲優秀論文獎；是年9月進入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主修〈空間的政治經濟學〉，輔修〈文化研究〉與〈東亞區域發展〉。1995年9月2日，在中國東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田野旅途中，一場意外的車禍奪走了他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送別崔誠烈同學

夏鑄九

中秋節前一天，當林淑瑩轉告崔誠烈在大陸車禍去逝的消息，我簡直不能相信，這麼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結束了。這些天想起來還很不平靜，開車的時候竟然恍恍然連路都開錯了。

才剛剛由崔誠烈從漢城傳真來的資料寫完比較台灣與韓國兩個總督府的小文章，他卻永遠離開了。這件意外怎麼會這樣發生的呢？認識他好幾年，那時他還在社會所，來聽課，後來也幫忙一起做台北縣綜合發展計劃的產業部份。由於受到鮑伯·吉索普（Bob Jessop）分析國家（state）的理論架構影響，他的碩士論文寫韓國與台灣之國家，大資本與霸權計劃的比較，但大都是理論概念的處理，我鼓勵他進一步比較地方權力集團與地域發展方面的研究。進了我們所的博士班，他算是理論思考能力比較強的，也比大多數台灣同學用功，上課的閱讀報告也很賣力，有種令人熟悉的北方漢子的踏實與渾厚。上次約翰·厄雷（John Ury）演講前，就是崔誠烈事前做準備，我們討論了《符號與空間的經濟學》（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結果，換來了第二天厄雷對研究生發問水平的驚喜。他本來的長處是政治經濟學，這兩年覺察到文化研究的活力，把它做為輔修，有意結合兩者之長，以避免韓國左翼學生運動中的某些簡化傾向。由於參加產科系，我提醒他多接觸邢幼田，加強經驗研究的訓練，這是避免教條主義，以及以後寫博士論文之必需，後來，他也以東亞區域發展做為他的第二輔修。

他實在比我們本地的學生嚴肅而認真，我要求博士班學生約我討論學習計劃之設計與進度，總是做得很徹底。這次回漢城前我們還談到江士林老師的翻譯計劃，把他和陳允中的文章分別譯為英文登在《Position》上，經由對馬來西亞、南韓、台灣的民（國）族主義建構的分析，我們可以對近年全球性的民（國）族主義崛起、神話與後遺症有進一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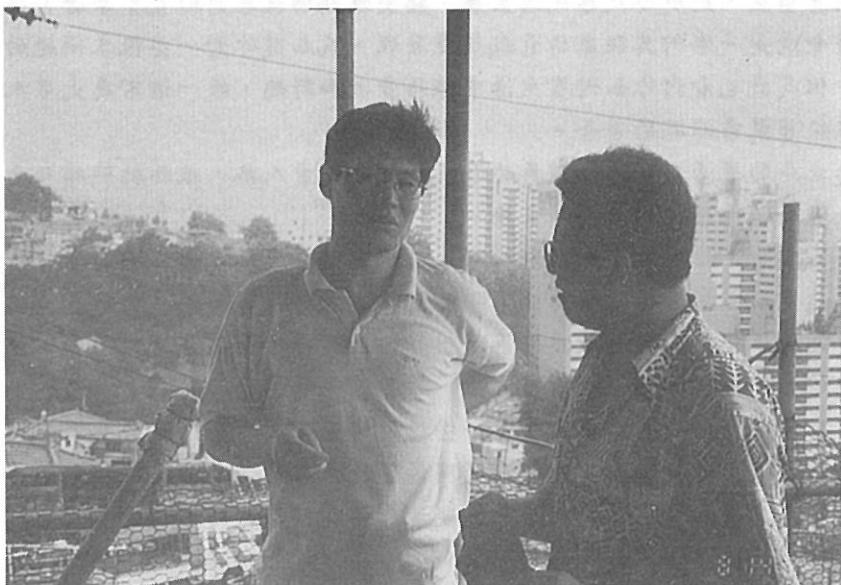
崔誠烈不只是讀書用功的學生。我清楚記得我看到崔誠烈在最近台灣的社區／市民運動的一些現場。我看到他臉上的感動情緒，社會運動集體意志動員的力量所造就的一種去異化的氛圍感染了他，他臉孔的表情，曾給我深刻



的印象。我們也討論韓國都市運動的特質。經由崔誠烈，我接觸到一些南韓的批判性學者，他們的經驗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與交換心得地方。上學期，他有次若有所感地對我說，過去他在韓國唸華語是個冷門，沒有想到因為中國的開放使他在南韓變成了搶手貨。我們還決定要他在博士論文開始動手前（是南韓與台灣的地方政府與區域發展的比較研究），先寫寫韓資在東北投資模式及其對地域的影響，這樣，與陳允中與邢幼田的研究比較，就可以與新國際分工的理論進一步對話，也對全球經濟中的東亞特殊性有更深入的理解。那裡曉得，這麼突然，所有的計劃都只剩下回憶。

像崔誠烈這樣的學生怎麼這樣不小心呢，林正修告訴我在韓國所見到的他的父母、妻子與幼兒，是多少人的期望與心血栽培啊，一個博士生背負的期待豈止是“未來的將星提早墮地”的惋惜啊。年輕的生命總會急切她在還不明白，不能全盤掌握的地方探索，這是學習的可貴狀態，但是，實在必需小心些，至少是其他碰撞的城鄉所學生。我特別想向崔誠烈一提的，這一次的追悼會，假如你看到了，你那天應該已經看到了，可以說是城鄉所學生所設計的儀式形式與過程中唯一一次較令人滿意的。或許因為同學們的真實情感，這次的追悼會至少可以讓我們能寄託一些情緒，表達同學對你遠離的哀傷，我們終於能夠設計一些比較令人舒服的“形式”了。

他曾經向我提過中國東北延邊朝鮮族的微妙處境，沒想到，就是這個致命的吸引力，使得他這次上了長白山天池的神聖之地，卻下山碰上了意外。這些年我自己摸索著將師生關係脫離父子關係的複製，今天，城鄉所正決定“台灣過唐山”，竟然陣前折翼，讓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難捨之情，我們會在日後的研究與實踐中來記得他。



給逝去的同志

林正修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心相知

崔，在你走後近一個月，我提筆寫就這篇送別你的文字，既是紀念我們的情誼，也是我在精神上受重創擊後的自我慰療。

你的亡令我感到窒息與憤怒，幫忙辦理後事的幾天裡，我看著你年輕的妻子獨自面對命運的磨難，我心中一次次無聲的嘶喊著，如果命運如此無常，可以任意踐踏善良的人們，我們如何能安心地夸夸而談所謂“理想”！如果命運注定要生死別離，為什麼我連對你最後珍重道別的機會都沒有？你的死亡不僅帶給我感情上的痛苦，還有對生命的深深質疑。

我回想在初幾次見面後，我們相談甚為投機，你送我你的碩士論文，待我回頭一看，你在贈題上稱我為“同志”，同志，一個如今令人感到溫暖與傷感的稱謂。在你身後的日子，我腦中常浮起我們一起上課討論，旅行與參加活動的片段。當我想到你在台灣求學的朋輩中，我或可稱上少數與你相知相惜的一人，所以即使面對橫暴的死亡，我心中浮起一絲平靜與安慰。的確，我是瞭解你的。

我知道你在謙和開朗的性情下，有一顆激越熾熱的心。從一個漢城街頭鬥爭的左翼學生，到現今反思民族主義、接受性別解放思想的青年學者，很少有人能體會這是一條何其艱難的自我顛覆歷程。我知道你對一些根本問題的嚴肅態度，但是我也看到你如何在生活中保持童心和野趣，做一個不是大男人的丈夫和不板著嚴肅面孔的爸爸。

你生命的質素中，有一種勇於自我更新的誠實人格，敢於挑戰昨日之我而不使教條沈澱為思考與行動的負擔。

我常常想，你為何在知識與人格上可以把開放性與批判力兼容並蓄？也許是因為你自幼雙語的背景和異地求學的經驗，也許得歸因於我們所身處的這個錯置迷亂的年代，當各種教義不再提供任何思考與行動的庇護所，誠實地思考與強健的心智是我們唯一的憑恃。

我努力想從死亡的虛無中找出一些積極的東西。我想你給我及其他朋友留下一個勇於思考的典範，一種嚴肅提問的開放性態度，一份跨越民族藩籬的真誠友誼。尤其是你特別致力的台韓交流，希望我們兩邊的朋友能珍惜它。

就在你走的半個月前，我們在Seoul的地下街，你為我挑了幾捲Tape，你說是代表韓國學運世代的反省性作品，其中一卷叫做“給逝去的同志”，當時我絕沒有想到竟然會在你的追悼會上放著首歌，現在想起來，我寧願不把這首

你不是我，我永遠不會知道你對我不外乎一派天國色彩，至多只有你
才懂得你所說的那句話是何等的深奧與神秘。而我這一枚棋子連一句話都
說不出來。原因必在你口吃或舌瘡或有病，可一派天國色彩。

我們的相知相遇不只是因為性情投合。在許多次只有我和你的旅程中，我們無話不談，從社會主義的前途、民族主義的糾結到個人的感情世界。在談話中，我總是急躁迫人，而你總是渾厚體諒。但只要我們與第三者對話，卻成為默契極佳的搭檔，不管是在台灣、中國、還是韓國，只要我倆聯袂出手，各種沙文主義者，原教旨派論調無不瞠然無能以對，乖乖束手就擒。猶今思之，讓我想起莊周遇惠子之墓時的無言感慨。

歌當作一個臨頭的惡兆，而看成是你冥冥之中對我的告別與紀念。

“崔哥！崔哥！”學弟們都喜歡這樣叫你，更喜歡你幾杯落肚酒後吐真言。崔，我真的懷念你！即使無情的時間摧折一切，多年之後，在創口結痂之餘我猶會想起我們同志般交遊的點點滴滴，它是我青年歲月中不可抹滅的記憶。

追悼會後，你外大的同學說你對台灣太有感情。但願在韓國之外，台灣也能成為你魂歸來兮的安所。

願死者正直善良的生命長存人心，無懼時間的磨蝕，

願生者能互相扶持鼓起勇氣，走過死亡的蔭谷。

1995. 10.

懷念崔誠烈

潘翰聲

現在是11月了，涼涼的天氣，令我不由得想起九月初的東北亞，那是和崔誠烈在一起的最後一段日子。那張追悼會的佈告到現在還沒有人把它拿下來，每次經過都要讓心底跳一下。而我每每看見夏老師門口的導生名單，遲遲不願將崔誠烈學長的名字除去，我都會覺得，崔好像是還在韓國，陪他活蹦亂跳的孩子玩要著，什麼時候還要再來台灣，把他的論文完成呢！

崔誠烈進來城鄉所博士那年，我剛好就讀碩士班一年級。那時我和崔誠烈並不算熟，印象中在研一旁邊的博一研究室晚上常常只有崔誠烈一個人在唸書，下學期我開始玩BBS，知道崔誠烈經常透過國際網路與韓國連線，他也很想學會中文打字，可惜並沒有一套適合外國人的中文輸入系統。其實在今年去韓之前，我並不怎麼瞭解崔誠烈，只知道他是個讀書認真、待人和善的韓國學生，說話時還會吸一大口氣，讓大家覺得很有趣。他常常將讀書上的心得與我們分享，有機會也和我們一起喝酒，六月間陳允中生日的時候，他一下子就喝醉了，喝醉前還開玩笑的硬是脫去曹羅羿的上衣。

在東北亞的最後這段日子，我才開始比較認識崔誠烈。出發前他對這個旅程就十分重視，他也在台灣特別對我們做一個韓國的介紹。整個旅程中，他天天都和我們在一起，特別照顧我們，也特地為我們安排一次中國菜的早餐。8月15日上午，我和福昌跟大家走散了，其他人都認為我們會自己到延世大學參加研討會，他卻堅持要在原地等我們，這讓我覺得他是一個過度負責任的人。8月16日我和正修、福昌到他家過夜，他拿一些介紹中國東北境內的朝鮮族遺跡的書籍給我們看，也把韓國民間「大朝鮮帝國史」畫冊的內容解說給我們看，大家興致勃勃的說一定要去東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看看他們在搞什麼民族主義，任誰也沒想到這會是個死亡之旅。

在延邊我們體驗了非常不一樣的「另一個中國」，我們也被慫恿似乎非去長白山不可，但是向旅行社探聽之後，決定放棄這個行程。但崔誠烈最後還是決定要自己留在延吉；後來我和福昌、揚凱要離開長春的時候，電話中他興奮的說要到長白山一趟，並在大連與我們會合。在大連我們沒有接到崔誠烈，雖然有點擔心，但我們寧可相信他自己決定直飛漢城了。我不可原諒的一個大錯誤，就是抄錯了他太太的電話號碼，以致鄭銀容小姐沒能早一點知道崔誠烈的噩耗，讓崔誠烈的屍骨在延邊孤獨了好幾天。

我決定在漢城多留幾天的時候，剛好遇上中秋節假期，在韓國是僅次於春節的大節日，之後我無法再聯絡上鄭銀容，便假設他們夫婦倆回家去了。直到九月九日中秋節晚上，我才從台灣知道崔誠烈的噩耗，當下我希望那只是誤傳，我在漢城一家便宜小旅館，變得不太跟人講話，認識沒多久的其他外國旅客也沒多說些什麼，在客廳裡大聲的玩樂。那幾天有時候我一個人在房間裡發呆，有時候漫無目的的重複逛著漢城，我還到崔誠烈介紹的韓國民俗村去，他

說「那裡做的很像」，我想藉最後的機會多看一看崔誠烈這個才剛深交的朋友的國家，卻在每一個我發現韓民族的地方，感覺到崔留下的身影。

週一開始上班上課後，我再次拜訪檀國大學的裴元、崔乘詰等朋友們，請他們幫忙通知崔誠烈這次為我們安排的幾個學術團體，他的老師趙明來則不能置信的一再搖頭。下午，在崔乘詰的協助下，我再到杏堂洞拜訪都市更新區的市民團體，他們的臨時房舍也已經快要蓋好了；我在想，因為崔誠烈的關係，我們和這些韓國的朋友建立了一些關係，現在我們卻共同失去了這個為我們牽線的好朋友。在這一兩天，我用腳的英文，將崔誠烈過世的消息轉達給他們，遺憾的不只是好朋友的過世，甚至這種悲傷複雜的感情，在我們之間卻都無法以我們能夠完全體會的中文或是韓文來表達，而我只能重複淺薄、空洞的外國語說" a bad message" "I feel very sad" "I wish you may help his wife and his son"。如果，我們兩個民族之間要充分瞭解，勢將必須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況且，再也不可能透過崔誠烈居間為我們翻譯了。

我回到台灣之後沒多久，鄭銀容小姐就已經從中國回到韓國辦過崔誠烈的追悼會，並來到台灣處理崔誠烈的一些後事。我們到崔在研一舍的頂樓，燒掉他一套衣服、鞋子；我感到慚愧的是，我也住在這裡，卻是第一次到他的房間來。我們也在福華後面的草坪，用一個大鐵桶將他的衣物全部燒掉。面對熊熊的烈火，我心裡亂得什麼都沒有，鄭小姐說，他們到中國去的那一天，也在下雨！這時我相信綿綿細雨，正是崔誠烈在我們身旁。後來我們在313R為崔舉行的追悼會，我是當天的司儀，強忍著對崔的思念，而希望趕快結束，能大哭一場，又希望時間能凝結在眾人的思念之上。而那天崔在台灣的韓籍好友，念了崔誠烈最後留下的筆記「和朋友們分開，我覺得很難過」，像一句魔咒迴旋在我腦海，總覺得是我們把他拋在中國東北的。

一個人的死亡，就這樣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嗎？我想不是的，烈火的炙熱已經將他深深烙印在我們心坎了。大約幾周前，我收到漢城大學的研究生來信詢問關於崔的進一步消息，卻不知從何說起....而思念崔誠烈的情緒到最近才漸漸平復，或許記憶還會隨著時光的沖刷而日益模糊，希望這篇短文能記下我和崔誠烈最後一段日子，這個短暫而重要的好朋友。



回憶崔誠烈

王淑芬

我總覺得當一個人系統性地去整理關於某個人的回憶時，就是打算去忘掉些什麼東西的時候，關於崔誠烈，我很不願意這麼做。為了這篇短短文章，我決定只整理回憶中的一個小小部份，就算以後忘掉了也沒有關係的部份，不過，當我決定這篇短文是這個主題時，我覺得要忘掉大概也很難。

當我開始說要寫論文時，我常常只是說說不太當一回事，有一天卻忽然在研究室門口發現一包書和一張紙條，那些書都是關於「工業化」、「區域發展」、「彈性生產」這一類的主題，而紙條上寫著：「王淑芬：請參考，加油！崔誠烈」。那是一年多以前某次崔誠烈回韓國當天特地過來留給我的。

關於論文我常常感覺到崔誠烈的關心，也因此我早把他視為最佳的SECOND READER，八月底一直寫不下去時，我還想著等崔誠烈回來幫忙。

崔誠烈極有興趣於台灣經濟活動中廠商的各種合作網絡關係，因為這種關係是韓國以大財團為經濟活動中心所缺乏的，關於這個主題，崔誠烈的思考與學習一直呈現著一致性。

四年前作「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時，他就很專注地蒐集了相關資料，並且對於三重地區廠商技術研發的行為有很仔細的觀察；兩年前作「產業科技政策研究」時，他還把蒐集到的資料貢獻出來，並且在「高科技的政治經濟學」這門課中以這個主題寫了一篇學期報告「從產業輔導政策往生產者服務轉化——以工業局推動的中衛中心政策為例」；一年前瞿宛文老師「經濟發展」的課上他又寫了「彈性專業化與地域發展」這篇理論回顧性的報告。

這樣說來，他的行為好像都很「學術」，其實他真是個純真而興趣廣泛的人，他每次都興致勃勃的問我要不要跟機械系的去看工廠？要不要跟機械系的去看新竹科學園區？我每次都敷衍了事地沒說要不要去而沒有去。那時候我當然不知道現在會覺得後悔。

每次碰到面時他總要跟我談談我的論文，我有時候興致勃勃，有時候敷衍了事，而每次一段時間不見，他看到我就一定要談，現在，我的論文已經接近尾聲，我很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做，他隱形著逼著進度呢！這個韓國人一直都為別人著想。

這篇短文，對我的意義當然比對崔誠烈的意義大，因為他已經死去了，死去的人到底會不會知道活著的人對他的思念與感激呢？

也許，只是暑假的一趟旅行

陳嘉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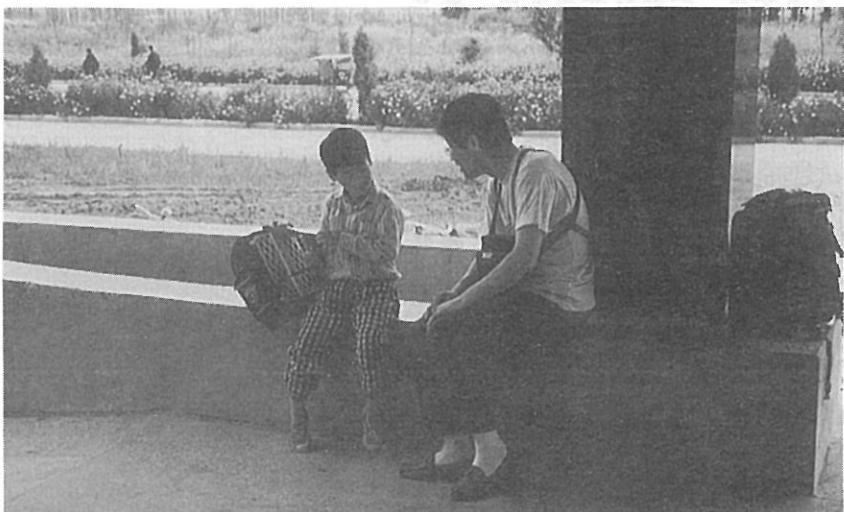
秋風初起之時，竟要開始為懷念某個仍存留鮮活印象的朋友，彷彿一切都在恍惚之間。追悼會佈置地素雅，鮮花、音樂，313教室舉辦過很多活動、演講，恐怕也未曾想到會有這般情景，整個會場，對我而言最觸目也最不堪的，便是那張在二重疏洪道拍攝的照片，他坐在長提上，天色漸暗、夜晚將降，正等待一場喧騰、歡愉的表演即將展開。

今年台北一群破人、爛人搞個「台北破裂節」，在被台北市徹底遺忘的淡水河邊，搭蓋了烏托邦的小眾公社，裡面隨人盡情地玩、彈、敲樂器，某個夜晚幾個人，阿貓開車帶著崔誠烈、孝萱和我，就這麼闖進一個奇異的地方，當有人先啟動音樂時，便再也無法忍受空靈無樂，竟夜笙歌不歇，能被發出聲音的鍋碗瓢盆，都加入合奏的行列，那晚，我看到崔玩耍地有如赤子，打鼓打的專注凝神，那麼有自己的拍子，如果再來一瓶啤酒或保利達B，我們都會毫不懷疑，他將更樂得酩酊大醉，直直睡去。

那天，他玩得很高興，嘴裡直喊「好玩！」。

也許，只有在工綜館研究室看到崔誠烈滿臉通紅的走出來，或者看到上課時用手寫的韓文大綱時，多半才意識到，原來這是個從北國來，帶著直爽性情的傢伙，和我們有些不同，也才開始揣想他在異鄉求學的辛苦。前幾天，在整理資料，恰好看到從前向他影印過的一份報告，討論有關彈性化生產的研究，那時的失落感更為加深，昔人已遠，卻忘記帶走他的掛念。

其實，關於死亡這件事，我們多多少少都有些經驗或體會，有時可以很輕，似乎只是出趟遠行，有時很重，重的讓生命都失去了意義，而崔誠烈的走，好像無端被抽走的一個棋子，毫不留情的玩笑。從許多人的惋惜和流露出的懷念中，相同之處，正因為他可貴的特質和性情。



別了，崔哥哥…

劉祐彰

崔哥哥：

幾次嘗試寫下這篇短文 然終是無法竟筆
我知道詞窮的自己
是無法以這短短數語道盡對您的思念和深深的哀傷
然伯芬學妹一再地催促 使得自己不得不一再再去憶起已遠颺的您

多麼希望這些歷歷在目的過往 就此塵封
多麼希望這些不忍回眸的身影 就此隨風而逝
而今我又得再度去面對您已永不復生的事實
唉 無奈呀

那是個九月初秋的子夜 我依是形隻單影地獨坐於家中
電話鈴聲劃破了靜寂 震醒了沈思中的自己
有一種不祥地感覺襲上心頭 教我駭於提起話筒
走了 您走了 菁章傷懷地聲音中告訴了我這令人痛心的消息
呆坐於沙發上的我 竟夜難以成眠

待在同一個研究室 有太多太多的晨昏都是與您共度
因所學上的差異 我們少有論述上的對話
取而代之的是 無所不談的男人話題

還記得嗎 我們一起逛公館 吃飯 喝酒 買衣服 買鞋子
一起看漂亮女孩 一起找女孩吃飯 踏青
您該更不會忘記 我們一起去挑潤浩的生日禮物啊
而我永遠也忘不了 當您望見我送給潤浩的耶誕禮物時
您點了點頭淺淺的一笑 我知道我們不只是同學

多少個深深的夜晚 您來電告訴了我您想家的心情
多少回與您討論如何將您家人接到台灣同住
我知道 我知道您是愛家的男人 戀家的男人
而當我望見大嫂拖著沈重的驚惶的步履走進了研究室
輕撫您留下的遺物 坐在您書桌前悲切地痛哭時 情何以堪呀
我真的想問問您 您怎如此忍心呀

陪著大嫂及所裡的好兄弟們 整理了您未能帶走的一切
望見您的包包 衣服 在熊熊烈火中化為灰燼
一直在問著自己 您真的走了嗎
隔天所裡為了您辦了個追悼會
我不願相信 不願面對 也不敢面對
我始終覺得或許自己可冷靜地接受這個事實
我始終覺得您的走對我而言很快就能淡忘
而當眼前被淚水所模糊時
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不捨得您走
而您真的走了 真的再也不回來了

或許吧 您也惦念著我這老友 或要與我道別吧
您幾次她與我夢裡的照面
讓我慢慢地接受您真的走了 也讓我知道您一切都好

但您可知 當我陪著大嫂辦手續時
幾個人在校門口餐廳用餐時
大嫂噙著淚水告訴了我 那餐廳有著您一家三口的足跡呀
而與大嫂揮別的午后 望著計程車裡痛哭的她
我多想告訴您 您在天之靈要好好護佑您狠心遺下的母子呀

佛家嘗說 偶而的一個照面 不知多少的香火因緣
今生有幸與您相逢 相惜 但盼來世還能與您再續前緣
安息吧 崔哥哥

而今而後 我們會讓潤浩知道 他無法挽回了父親
卻有著許許多多疼惜著他的叔叔姑姑
我知道再怎麼多的叔叔姑姑 也無法取代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但誰叫我們是您的好兄弟姊妹呀

別了 崔哥哥



後記

為了讓崔誠烈遺下的孤子在失去父親還有些照片，也讓大嫂知道還有些遠方的好友如此地惦記和掛念著他們，82級博士班同學發起成立「崔誠烈紀念基金」。我們將會在每年提醒所有崔誠烈生前的好友募款，該基金會將於農曆年前匯集後寄予大嫂，所有相關的帳目，我們都將表列寄予捐款者並公布之，以示徵信。我們不知能持續多少，來協助這位好友的下一代能平安順利地成長、茁壯。

『崔誠烈紀念基金』

劃撥帳號：18724578

戶名：劉祐彰



憶亡友

冠宇影印店 杜清發

記憶裡，誠懇、老實、親切的你，竟會在一場車禍中意外逝去，消息傳來，令我們久久無法釋懷，但是，你的求學精神以及處世的態度，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韓中行程記要

蔡福昌、潘翰聲整理



- 8/13 抵達韓國漢城：途經汝矣島廣場、登上63大樓
- 8/14 訪問漢城市杏堂洞上往十里貧民窟、拜訪漢城大學與空間環境研究學會並舉辦了一場意料之外看來有點正式的座談會、與漢大學生 one-shoot（“乾杯”的意思）去了
- 8/15 參加韓國獨立五十週年紀念活動、造訪延世大學建築系、梨花大學前女人街
- 8/16 遊大學街（原漢城帝大舊址）、拜訪檀國大學（檀大大學院院長召見）、到老崔家作客
- 8/17 造訪漢城市郊盆唐新鎮、參觀住宅博物館、拜訪婦女團體
- 8/18 閒逛（登南山塔、遊漢江、逛南大街、景福宮、總督府……）、老崔與太太鄭銀容小姐請客
- 8/19 拜訪慕思勉的家、從仁川港搭威東輪前往中國青島
- 8/20 中午抵達青島：下榻台北賓館、逛青島市區、吃海鮮喝二鍋頭和青島啤酒（僥倖買到往北京的火車票）
- 8/21 拜訪青島市城規局、遊覽德國租借區、日本租借區（熱河街）、青島高科技工業園、黃島開發區、到中山路抓龍（按摩）
- 8/22 搭乘硬座特快火車直奔北京、夜宿北京華僑飯店（孝萱回山東廣饒的老家）
- 8/23 拜訪北京大學城環系安排住宿、參觀天安門旁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出主題：反法西斯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展）、毛澤東紀念館、人民英雄紀念碑、遊王府井大街、琉璃廠、東郊民巷使館區、分頭夜宿北大研究生宿舍及北方交通大學宿舍
- 8/24 與北大城環系教授座談、訪問北京市郊浙江村（豐台區）及浙江小學、夜訪清大建築系陳志華教授
- 8/25 拜會北京市城規局、參觀中蘇友誼紀念館（今北京展覽館）、至北大校園旁的海淀書城 Shopping、與北大城環系師生座談並一同狂飲扎啤、

- 大唱卡拉OK
8/26 閒逛（遊故宮、吃麥當勞…）
- 8/27 深入內地：分頭前往哈爾濱（三人）、天津（三人）和東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四人：包括老崔）
東北延邊團：中午飛抵延吉市、下榻金城賓館、逛市區、遊人民公園、到解放街狂飲
- 8/28 拜訪延邊大學地理系、延大地理系全松林教授講述「圖們江開發計畫」
、與延大地理系師生座談（介紹漢城都市更新、台北城、台灣原住民）
四人再次豪飲解放街
- 8/29 抵達圖們市、拜訪池虎哲（今年五月，老崔在廣東所認識的朝鮮族中山大學的學生）、遊覽圖們江（透過望遠鏡，窺見對岸有幅金正日的巨大肖像）、夜宿圖們市的一家商業招待所（原預定當夜搭小巴前往琿春，但因安全問題而作罷）
- 8/30 圖們→琿春→圖們→延吉→長春
一大早趕往琿春、拜會琿春合作開發區、圖們江開發報社；隨後回圖們取行李並與小虎和拍了一張紀念照、趕往延吉換搭PM8:22的圖們江二號特快車前往長春，在延吉火車站我們（彭、潘、蔡）與老崔正式分手並相約九月五日中午在大連碼頭候船室相見（老崔住在延大地理系系主任林哲浩老師家）
- 8/31 抵長春：投宿天池飯店、遊偽滿州國皇宮、閒逛市區（哈爾濱、天津等兩團正踏上歸途回台去了）
- 9/01 參觀長春電影城（驚見一面作為場景用的國民黨黨旗）、拜訪東北師範大學地理系及東北亞研究所陳才教授、當晚與老崔電話聯絡：老崔高興地訴說他九月二日要親自拜訪白頭山和天池並幫他訂船票（此後再也沒有老崔的任何訊息）
- 9/02 搭火車抵哈爾濱：進住招待所（費用較一般飯店便宜）數度被拒，終以詐騙方式獲得招待所的住宿許可；遊斯大林公園、中央大街（鄰街交通警察正在拖吊違規停放的腳踏車）
- 9/03 考察哈爾濱市區、又到書城 Shopping 、參觀動物園（拜訪貓熊未果，原來入口招牌上的貓熊圖案只是虛晃一招）
- 9/04 遊松花江、徒步太陽島（兩個無聊男子花了近兩個多小時徒步環島一周，只看見幾個遊客正在遊樂園內操作一輛報廢後的展示用坦克車）
- 9/05 飛抵大連（等候許久遲遲不見老崔蹤影，同時電話又聯絡不上，於是我們三人決定搭乘PM9:00駛往威海的最後一艘船；在登船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將老崔的船票賣給了別人，我們就只能是焦急地假設老崔已由瀋陽搭機直飛漢城回家去了）
- 9/06 威海：老崔漢城家的電話仍無法接通，還因一張十元人民幣的假鈔而被看護公共電話的小姐從對街急奔前來追討；在港口附近發現署名中國國民黨的「收回威海紀念碑」、轉搭威東輪至仁川（在國際歌的告別聲中離開中國）
- 9/07 仁川→漢城→台北（潘續留漢城至9/13）
抵達仁川港後，我們馬上撥電話至老崔家找老崔，但是電話能一直無法接通，此時此刻徒增我們內心的惶恐與遲疑；回台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所抄的電話號碼是錯的，這要命的失誤真是個終身的遺憾…



韓中行程圖，一九九五年夏

記一段失去地圖的旅程

蔡福昌

發現東北——

印象中的東北充滿了故事性的朦朧想像，小學老師的東北「大」蘋果故事、地理課本中的東北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梅濟民的小說「北大荒」、「九一八」事變以及愛新覺羅溥儀的「（偽）滿州國」……，這些圍繞著失落的原鄉史詩般地吟詠喟歎，構築了長期來我對於東北的浪漫欲想。

延吉是我們進入東北的第一站，八月二十七日，老崔、我、翰聲和揚凱四人由北京飛抵吉林省延吉市。在飛往延吉的途中，好奇心驅使我不斷地向窗外窺探：綿延不斷的山巒與丘陵地，人類施為的痕跡歷歷在目，淤淺的河床與泛黃的濁水即可想像其開墾規模之大；其間，偶爾間雜著傳統的朝鮮族聚落，茅草頂、白灰牆與那不時裊裊炊煙的煙囪，就如同一座座博物館式的民俗村，清晰可辨。「關外」果然是個詫異地點！對我來說這無異又是一樁地理上的大發現。抵達機場後，首先迎接我們的是試圖以韓語向我們招攬生意的朝鮮族出租車司機以及機場出口對面碩大的韓資現代、大宇等集團歡迎各界嘉賓蒞臨的廣告招牌，這時我方才理解老崔一再的推薦東北其來有自，原來邊境一帶聚集著如此眾多的朝鮮人。進入市區，滿街林立的韓語招牌、朝鮮飯館與耳際不時傳來的韓語交談聲，這一切對老崔來說，也許是近鄉情怯；對我們這些來自台灣的「外國人」（機票價格是共和國人民的兩倍，與外國人一視同仁）而言，斯時斯地的詫異情境，逼得我不得不掏空原先對於東北的任何設想，重新面對一個早已是事實的全然陌生的新世界。

印象果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那張經由論述與影像再現拼湊完成的「歷史的」認知地圖終因時間在彼此社會的互為加工而暴露其再現的危機，同時也無法在新的地理時勢中對焦，這種失焦的茫然樣態宛若一個失去地圖的旅人焦慮地、挫折地不得不將自己置身於一切的不確定之中。看來按圖索驥馳騁東北顯然是個妄想！不過擺在眼前更令人無從逃避的事實是：身處朝鮮人的勢力範圍，你的五臟廟府必須得有「辣」到深處無怨尤的激情準備。

打造「東方的鹿特丹」——地方大翻身的「圖們江開發計畫」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搞好經濟」的發展邏輯支配著整個社會的運轉，對於那些不被「特區」特別關照的地方，地方各級政府無不卯足全力競相以“經濟合作開發區”名義，爭取外資企業加盟投資，以期帶動地方整體的發展。這種地方自發性的經濟開發熱顯示了地方對於中央“有必要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特區」漸進式、選擇性經改策略的抗議，“要富大家一起富”顯然較貼近地方民意的現實。只要攤開各城市的導覽地圖，不難發現這個地方要求發展的共同心願：××經濟開發區、××合作區等等字眼總是盤據著碩大的版面，縱然驚鴻一瞥也能夠輕易地看見。當然，邊境一帶的城市老早就趕上了這班經改

列車而做起跨國生意了！在延吉市區，處處可見大興土木中的現代化辦公高樓與住宅，開發商以韓資集團居多（韓信、現代集團等）；琿春市的合作開發區內，韓資集團更是囊括了大部分的地產投資，同時也參與開發區內多項基礎建設工程，韓資集團儼然是開發區的實質執行者與推動者。而這個合作開發區也就是為了迎接東北亞最引人矚目的『圖們江開發計畫』所做的先前準備。

『圖們江開發計畫』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所倡議的跨國性區域經濟合作計畫，該計畫擬定以十至二十年的時間，籌資 300 億美元開發中、俄、朝（北韓）邊境的圖們江三角洲地區，投資內容包括開發新市鎮、交通、電力及教育，並以建設東北亞成為「東方的鹿特丹」的響亮口號作號召，期望凝聚足以和歐體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抗衡的「東北亞經濟圈」，進而帶動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除了如聯合國在計畫中所揭示的要為東北亞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奪得一席之地外，豐富的農林礦資源與廉價的勞動力顯然才是世界各經濟強權覬覦東北亞這個新興亞洲市場的戰略考量，以此作為進軍遼闊的亞洲市場的經貿投資基地。

此外，東北亞長期來各國間意識型態的對立以及因歷史因素所造成的領土糾紛等等的政治現實，『圖們江開發計畫』除了肩負搞好經濟的區域共識外，它同時也是一種隱喻式的政治修辭，目的是緩和區域間潛在的衝突危機。

東北／東北亞—區域發展過程中的各國角力

隨著今年（1995）五月下旬中國、北韓、俄羅斯、南韓及外蒙古在北京簽署合作協議後，『圖們江開發計畫』正式宣告運轉。對於亟需外資參與經濟開發的中國，這一跨國性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受歡迎的程度自然不在話下；長期來中國一直試圖打通圖們江出海口，以便利東北各項物資經由日本海對外輸出，同時取代吞吐量早已負荷過重、運輸成本也較高的大連港南運路線，『圖們江開發計畫』的提出，總算能一償中國直搗日本海的百年宿願。然而橫阻眼前的資金短缺與政治協商困難的事實是計畫實踐首先必須克服的難題，長春東北師大東北亞研究所的陳才教授便不諱言的指出：「政策＝資金」（地方有政策，中央才考慮給錢），這是財政短暫的地方為因應仍將發展重點擺在沿海地區以及國務院批准的「特區」的中央的一種自立救濟方式，然而現實往往是地方當自強，資金的籌措還是要省和地方各級政府自己來，「特區」的開發模式則是地方競相援引的集資策略。此刻地方正傾力灌注大量資金積極建設邊境一帶的基礎設施，試圖要在這場區域經濟競足中拔得先機。例如此行中的邊境貿易重點城市—琿春市，更新後的市區顯得格外寬闊氣派，賓館、企業大樓的相繼林立，合作開發區已成立並開始運作，基礎建設雖有了譜，但一切就等著外資企業的 援。然而整個圖們江開發計畫對於中國而言仍缺那麼臨門一腳—圖們江下游航權的取得。

西鄰的外蒙古自從歐共集團解體後，頓時失去強而有力的政經依靠，重新擁抱亞洲尋求新的經貿支援則成為其國家發展的指導戰略；對於一個經濟籌碼相對弱勢的內陸國家，如此絕佳的合作機會又怎能錯過呢！

南韓顯然早已看準了這塊區域經濟大餅，漫步在東北各大城市，韓文招牌

、韓國貨品專賣、朝鮮族飯館充斥大街小巷，大興土木中的高樓多半是韓資集團所開發，韓國的經濟、文化勢力已成為邊境居民日常生活的部份（東北各大城市如哈爾濱、長春等，許多公共場所都設有中韓雙語的說明告示）；1992年韓中建交後，韓國各大企業集團前仆後繼地循山東、遼東半島一路拓殖整個東北，憑仗著東北為數不少的朝鮮族血緣上、地緣上及文化上的認同（由於這些朝鮮族住民幾乎多來自北朝鮮，政治認同上傾向北韓），韓資集團在當地最是如魚得水，觀諸韓資集團在中朝邊境的重資部署，不難看出下一個投資目標是瞄準了圖們江對岸的北韓，東北則是扮演著資本主義和平演變北韓的戰略跳板。

日本，這個環日本海的國家在地緣上算得上是東北亞的一份子，然而政治立場的對立和殖民戰爭造成的領土糾紛與民族仇恨的僵持態勢，日本與各鄰近國之間關係顯得較疏遠；而後冷戰時代的政治鬆弛，為區域間新的交換需求營造了極為有利的合作氣氛，加諸「裏日本」（環日本海地區）長期來與西岸發展的不均衡和今年初環太平洋岸神戶大地震的教訓，使得發展重心西移的論調在日本國內有了討論的空間。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促成了裏日本各城市（如新瀉等港口城市）尋求地方再發展的契機，裏日本的地方政府已先後數次率團訪問東北呼應圖們江開發計畫的區域合作戰略，這似乎正預告著「東北亞經濟圈」時代的到來。

北韓目前仍秉持政治上「不改變顏色」為終極任務，堅守社會主義路線以防堵南韓的「北進」和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然而由於掌控圖們江下游一半領域的絕對優勢，北韓顯然扮演著這場區域經濟爭逐戰的關鍵少數。據外電報載，北韓於1991年由政務院對外宣佈在羅津—先鋒（舊名雄基）地區建立豆滿江（韓語圖們江的中譯）自由經濟貿易區（面積 621km），同時宣佈清津為自由貿易港，這不啻是北朝鮮“漸進式”改革開放的開始。

俄羅斯，這位逝去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在蘇聯解體後經濟發展的停滯與嚴重的通貨膨脹迫使得莫斯科當局無暇東顧，對於遠東西伯利亞地區顯得愛莫能助、鞭長莫及，爭取外資參與建設是目前俄羅斯經濟休克期的療法，因此中央所能給與的就只是持續鼓吹外資參與開發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等等的精神聲援。而海參崴方面業已提出「大海參崴規劃」，計畫於九〇年代建立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實現海參崴作為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香港。其它台、港、新、美歐等地區也已前後相繼率團考察。

+ 東北，名之為東北亞也許更能貼近事實，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已是各國的一致共識，而南北韓問題、日俄北方四島的領土糾紛以及區域間發展的差距與民族主義的情緒等等複雜問題，在在暗示著多國合作聯合開發仍然是個詭異多變的未知數！

資本競逐的北大荒—東北亞區域的再結構

「中國」這個字眼，對我（們）來說，存在著許許多多認識論上的障礙！同樣地在台灣，我們正在為著「自我身份」的確認動員了不計其數的社會能量，耗費了龐大的媒體資源，連廣告都想壟斷。原本想來到中國耳根可稍稍圖個清靜，然而萬萬沒有料到這個擾攘不休、毫無交集的認同命題卻在踏入中國後仍一再地在各種場合中被積極地提醒，只是問題變得單純些，僅僅只是因

為「你」來自台灣的『The same—The other』化約論的二元命題，同時藉由物質消費區隔化的實踐，強化、鞏固了如此這般的刻板意象。然而這也並不表示彼此間沒有任何的連帶與交集，在延吉（近六成的朝鮮族住民）的市集中，不經意地聽見有人哼起葉啓田「愛拼才會贏」的台語歌曲（音像帶個體戶播放的、販賣的泰半是台灣的流行歌曲）；不僅僅是葉啓田，左擔奴、一步一脚印（Hang Tan）、賣當勞、×元吃到胃撐飽的新暴食主義（如同台灣一樣／台中的元太組蒙古烤肉在哈爾濱開了家頗具規模的分店）……，這些日常生活的共同消費經驗成功地接合了政治上斷裂的隙縫。商品經濟－以一種貌似溫和的文化形式出現－有時甚至比政治更煽情、更富於群眾性，然而消費可能是複製與延續既有的社會關係，相對地它也可以是創造性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在全球資本主義化浪潮的席捲過程中，認同不必再依附於地方，而更可能是在資本著床的節點上，交付各種場域中的消費實踐而再生產。此刻，東北亞已成為各國資本競足的北大荒，市場經濟物欲橫流無法抗拒的魅力迅速搓刺著生活的各個領域，解放著過往社會可欲不可求的消費壓抑，「一個沒有陌生人的地方」似乎是未來世界的隱喻。東北，處在這樣的歷史時勢中，新的社會生產機制正在形構著一個差異日漸模糊的新社會，藉由資本主義的動員找到了新的認同基礎－「區域」合作開發經濟。區域論述的正當性逐漸成形，而區域對於地方空間／社會的置換效果及其對於民族國家的實質挑戰值得觀察！

『愛拼－才會贏！』…回到台灣後，每每聽見這首歌，思緒便不自覺地回想起那位山東籍青年在渡輪甲板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先把經濟搞好再說吧！



兩個殖民總督府*

夏鑄九，崔誠烈

外電報導，南韓五萬群眾齊聚漢城市中心廣場，舉行終戰五十週年以及朝鮮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慶祝活動。當大型吊車將廣場後方象徵殖民統治的前日本朝鮮總督府的圓頂吊起時，整個紀念活動的氣氛沸騰至最高點。從韓國經驗看台灣，台灣總督府的命運又如何呢？我們可以先了解朝鮮總督府拆除行動及支持它的民族（國族）主義論述，然後再與台灣的情境比較。兩個殖民總督府保存與拆除政策的異同也許可以說明後殖民社會中認同政治的詭譎。這有助於我們認識國家的建構性質，全球經濟中社會變遷的趨勢，以及文化政治的不同策略。

一、南韓民族主義爭奪主導權的戰鬥

朝鮮總督府拆除行動可以視為不同的南韓民族主義爭奪主導權的戰鬥，我們必需將南韓民族主義的建構、社會動員與集體認同放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分析，才能理解九〇年代大韓沙文主義的形成，種族中心主義化的傾向，以及又如何耗盡其能量，最終被保守化的過程。

在九〇年前之前，南韓的民族主義有不同的起源。首先是在國際冷戰圍堵政治下，軍事獨裁集團的右翼政權所建構的反共的民族主義。於是，做為符號象徵的祖國或民族的神聖化，經由教育、公民儀式、物質化過程，表徵（再現）在銅像、貨幣、博物館、街道與廣場的絕對空間中。有意思的是這些塑造為民族的材料之選擇過程卻具有很高的排他性。軍事集團由貴族在有請願性質的抗日活動中尋求起源，對民族英雄加以過濾，而遺忘了農民與下層的武裝抗日民眾。於是國王與將軍成為國小校園裡的偉大符號。冷戰時期民族主義最大的錯亂在於把同一血源的北韓共產主義做為敵人，也造就了右翼民族主義對立面的韓國版本——南韓知識分子與學生運動的抗日反美民族主義。經由反殖民人民抗爭歷史的再現所重構的民族主義，一方面來自對南韓的統治集團親日性格的批判，另一方面則結合了農民、勞工、學生運動，以及地下武裝抗爭歷史之表現而形構，也因此，表現了與北韓民族主義的親近性。九〇年代前後，民族主義的影響不但取得了大眾的支持，也打擊了軍事集團的正當性。所以，也才有金泳三文人政府的登場。

九〇年代之後，金泳三文人政府執政後取得了來自人民自發性的支持，也使得過去反軍事獨裁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失去了訴求的焦點。金泳三提出回復民族正統之策略，透過媒體、莊嚴的儀式與關注海外韓裔僑民等措施，將經濟發展的祖國富裕對比過去的殖民苦難，導引出民族主義的興奮與激情。這一次的總督府拆除之景福宮復原計劃就正是

*本文曾以“殖民總督府的政治詭譎”為題摘要發表於中國時報，1995年，8月25日；全文則發表於台灣建築報導，第一期，1995，10月1日。

文人政府政治改革與回復民族正統性策略的重要部分。這計劃在1993年由金泳三拍板定案。

此外，北韓的核武器所引發的緊張局勢，造成了左右兩大陣營間對統一問題的論述戰鬥。金泳三以反共沙文主義推動了右派對北韓的侵略性敵意。而左翼陣營則以共存、承認對方的統一政策回應。而論述空間中民族主義主導權競爭，以及，左右兩派彼此提供了成立的條件然而觀點卻無交集的情境，使得「大韓沙文主義」崛起。弔詭的是，這時，北韓所鼓吹的種族化的“民族第一主義”所自然化的血緣、語言等召喚了南韓學運激進派的論點，而民族主義做為南韓社會集體認同的趨勢可以說是同時糾合了自卑與自尊情結的複合體。

所以，今年總督府的拆除儀式，就是在這種詭譎氛圍中的政府行動，被當做是復興韓國民族正氣的偉大神聖民族事業。

另一方面，8月15日當天，南韓的學生會聯盟則舉行南北統一儀式，在板門店與北韓合辦。結果，被鎮暴警察攔下，雖然有15,000多名學生參加，但卻不見於電子媒體。8月15日紀念活動的主導權很明顯地為國家所主導，過去學運的統一運動則被壓抑為聽不見的另類聲音。

二、朝鮮總督府拆除的論辯

就8月15日總督府拆除，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基本上有三類意見：

(一) 拆除論——

總督府象徵了殖民與民族恥辱，拆除了才可回復民族自尊與民族正氣。

(二) 保存論——

總督府是負面歷史之產物，但是，負面中可以尋求正面教訓。總督府是歷史記憶，不只是日本帝國主義支配的象徵，更是光復後韓國自己歷史的一部分。它是韓國近代史五十年的歷史見證，殖民象徵的年數不過三十多年，不如韓國近代史五十年。因為總督府除了做為總督府之外（1926年落成，1928年使用），1945年曾被當做美軍總部，稱為中央廳（Capital Hall），1948年則改為大韓民國政府行政院廳舍。到了1981年，政府廳舍遷移，做何新用途，爭論又起，1982年確定做為國立中央博物館，1986年開館。

(三) 折衷論——

搬到別處，而移轉保存。

在意見表達過程中，保存論者如風前燭火，十分細弱，雖有反對的聯合聲明聯署與集會，但都被民族沙文主義的聲勢壓倒，很難形成有影響力的輿論，有若民族情緒宣洩海浪上的一片小舟。

保存論批評拆除論，把總督府當作代罪羔羊，把石頭建材人格化而後殺死這石頭人。他們認為保存才可以使後代，以及使日本人反思，成為歷史教訓的象徵。他們建議可以改做福利機構，而不要做為政治性官舍。日治朝鮮總督府目前的用途是國立中央博物館，拆除行動簡直是自己破壞自己。這是拆除的現實矛盾與難題所在。因為新的國立中央博物館將建在漢城龍山區駐韓美八軍的某一基地，目前尚未收回，從收回至完工將花十年以上，這也就是說，目前並沒有新的博物館，拆了總督府，就有增加韓國歷史文物破壞的風險。另一方面，拆除論者稱這些保存論者為親日勢力復出，罵他們為出賣民族的賣國賊，展現出民族至上主義，無反思餘地的民族正氣論。

在強勢民族至上主義下，部分學界提出的折衷方案，一方面肯定拆除論所謂的總督府壓住了民族正氣的血脈與穴脈（風水論）的說法，另一方面，也肯定保存論的歷史教訓說，遷地保存。

假如進一步面對拆除決策政策形成的社會政治過程，其實，金泳三文人政權為取得政治正當性所主導的民族主義論述才是關鍵。拆除總督府是民族主義神聖儀式的極大化策略。因此，決策過程的國家封閉父權權威是值得爭議的。金泳三總統的指示是聖旨嗎？沒有經過民主開放的意見交換，未經輿論社會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爭論與過濾，沒有充分的討論是問題的癥結。目前所謂的公聽會根本是事先已決定好的一言堂。

結果，建築成為民族沙文主義的犧牲。殺死了殖民石頭人，也就殺死了反殖民的石頭人，拆除朝鮮總督府是社會集體的傲慢自大的滿足，也是自卑感的極致。對石頭，建築，過度賦予人為的意義，但是卻沒有試著去改變它的意義。把空間的意義固定化，封閉為總督府，卻排除了其他的意義，更排除了意義轉變的可能性。對石頭既有特定意義的過度偏愛，使得避免野蠻破壞的另外可能性也消失了。

三、台灣總督府？

相較於如惡霸權威高聳盤據在漢城低矮的景福宮中的朝鮮總督府的命運，台灣總督府的惡行也不遑多讓。在台灣，日治殖民城市是更徹底地“抹去重寫”，改變空間是為了抹除記憶。台北城由一個坐北朝南的古老封建帝國邊陲的行政中心被硬生生地扭轉為朝向日出之東。除了道路的取向切線被重新調整之外，媽祖廟被民政長官紀念館置換，巡府衙門則分解移他處…坐鎮在片瓦不存的城市中心是威嚴而肅殺的台灣總督府，它的周圍則佈滿了殖民者的軍事機構。朝鮮總督府的建築師為喬治·拉蘭地（Grorg de Lalande），他在1912年負責設計工作，1914年去逝，由曾參與台灣總督府設計的野村一郎後繼其志。然而，這兩個如此相似的殖民總督府在殖民時的表現形式還是有所差異，以及，在殖民之後也有著全然不同的命運。作為權力表現的台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的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朝鮮總督府垂直高大的西洋古典權威相對於景福宮的東方式水平伸展宮庭合院，朝鮮總督府直接的對比式鎮壓持續不斷地刺激韓國民族主義的身體感官，而在台灣，拆除固然也是鎮壓的痛苦寫照，但是，當新建的總督府最後竟然變成了

社會記憶的一部份時，歷史的扭曲就更令人棘手了。台灣總督府所透露的“抹去重寫”方式是用新的權力形式取代舊有。當刺目的鎮壓已經習慣為對權力的順從，成為被殖民者記憶一部分之時，“總督府”轉化為“總統府”也表徵了權力如何自然化為台灣社會的神話。它一直是真實權力發號施令的中心，也持續是權力的象徵，也因此，即使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它仍舊是諸政客們角逐政治舞台的最神聖光環。

光復後228事件的苦難經驗，使得台灣做為一個後殖民社會的認同經驗受到了重大的扭曲。國民政府同樣的民族（國族）建構強烈企圖也產生了對立面，這就是台灣版本的民族（國族）建構。對韓國言，民族（國族）主義已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發展過程的階級、性別、環境與城鄉矛盾都被弱化為看不見的次要課題。而台灣，由傳統的地方意識往民族（國族）意識轉變的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力量雖然仍有動員社會的力量，可是，毋寧是更破碎與扭曲的，然而，也因而使台灣有更多一點空間與時間來珍惜可能的差異，增加討論的空間，因此，多元的空間也才有浮現的機會。

去年，過去的台灣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對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過去的日治紅十字會）在責難與保存團體抗議聲中輕率而魯莽地拆除了。然而總統府（總督府）雖然還沒有完成古蹟指定的所有程序（正由台北市政府向內政部提報中），但是大概還不會立即遭到拆除。可是，光復雖然已經五十年了，總督府前的氣氛仍然缺少了平和與人氣。每年十月，慶典的牌樓燈火把殖民城市所造就的單調嚴肅換上一幅官家所期望“普天同慶”式光景，可是節慶的張燈結綵並無法取代一般人日常真實的壓力，一直到了日後經濟發展了，我們的城市才徹底改變了模樣。我們的城市變成一個混亂的非正式城市、投機城市與性別歧視城市，它承擔了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所伴隨的生活環境品質急遽惡化的代價，但是，卻又是充滿活力的，光怪陸離的消費地方。

今天台灣的民族主義壓力還不至於使萬民齊黯，有口難言，但是，認同政治的扭曲與錯亂仍然使得多元認同難產。我們的城市已經是分裂的城市了，然而，如何將新國際分工中的依賴城市與片斷而分裂的城市轉化為市民城市的多元豐盛可說是歷史的課題。當前台灣社會最大的潛力與魅力不正在於“無共識”嗎？權威都已經崩解，不同都市意義的角逐正是台灣城市活力之源，因此，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正亟待落實至地方政府與社區政治的層次。當然，西歐十七世紀以來的建構，而目前卻在後殖民論述的爭議中顯得過時的民族（國族）認同，仍然困惑著台灣的人心，使得國族沈迷的魅力還糾結著對領導者神聖性的期待。地方自主才初萌芽，尤其是弱勢團體的認同，如原住民、階級、性別、青少年、地域與地方社區等的連結仍然亟需重構，它們的副文化、特殊用語與審美經驗都是豐富生活的重要元素，或許，這才是台灣社會更多元化的趨吉避凶之道。

探討九十年代南韓民族主義的種族中心主義

崔誠烈

壹、緒論

民族主義是特定歷史脈絡下社會的具體建構。在含果這種民族主義被自然化、去歷史化，變為理所當然的集體自我意識。本論文探討1990年代之前與之後，圍繞民族主義的論述，以及集體認同空間的先佔，而右與左兩派、統治集體與反抗運動之間所展開的競賽。

本論文想突顯的議題有兩個：

第一，民族主義的不同起源與正統性競賽

說明右派與統治集團如何以上而下的方式，透過歷史事件與人物的排斥性分類，創造出民族主義之象徵的過程。相對的，左派與反抗運動以下而上的方式，再現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另外傳統的過程。後者是以前者的民族背叛性之暴露，以及強調人民抵抗的傳統重構民族主義的另外起源與其正統性（orthodox）。

第二，民族主義的韓人血族／種族主義演變

在此探索南北韓的民族主義，進入九十年代訴求於血族、種族因素優話的背景。顯示民族主義在過去所享有的進步性，被耗盡而枯萎的過程。以及民族主義的符號所負載的、負荷的進步性，在新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時勢下，被保守化的過程。

貳、九十年代之前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不同起源

一、冷戰、反共的民族主義－發展、社會動員與塑造集體的認同

（一）建構祖國／民族認同符號－符號資源的分類過程

祖國、民族是韓國社會最具神聖性的名詞。在公共空間與儀式中，他讓人門激情高揚，集體傳神的被感動。雖比過去更多元化的現代韓國，出現了民族主義監視（censorship）網絡的裂縫與空隙，如，對於所謂愛國者熱情的嘲笑或諷刺，但民族主義論述仍舊是社會政治的最高綱領。

在經濟開發的六七十年代軍事獨裁集團 junta 為了動員人民加入國家現代化建設行列，而塑造了召喚人民的偉大符號。所謂在「民族重心的歷史使命」（註一）之下，大部分的國民從沒有土地的農民轉變為城市的勞工。為了祖國的現代化，就正當化了政治迫害與殘暴鎮壓等獨裁統治。

當時的發展計劃促發了物質空間與認同空間的再結構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空間的大變動，以及人口的城鄉移民，改變了農村與城市的既有社會景觀，因此去地方性傳統農村為基礎的集體認同衰弱使得既有叫固定的地方認同空間流離失所與流動。軍事集團就以非地方的民族國家為基礎，形塑／強化了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也就說由中央軍事統治集團所形塑的去地方的祖國／民族認同，替代了空間認同的地方性。

作為符號象徵的祖國或民族，其神聖畫室透過教育、公共儀式、物質化的過程，表徵再銅像、貨幣、博物館、廣場，據Lefebvre，這是神聖／絕對的空間及其再現。有趣的是，那些被塑造為祖國／民族的資料，或被神聖化的原始材料，其被選擇的重是非常排他性的「分類」過程。軍事集團並沒有從貴族階級之外的民及其對外敵的抵抗中，過濾民族英雄，也沒有從殖民時期抗日anti-japan的人民抵抗傳統中（從下而上的武裝抗日）尋求其起源。他們分類而拼貼的祖國／民族的符號，排除了抗日的民眾參與經驗，以及非帝王將相的人物。舉例來說，十四世紀的國王與十六世紀的將軍，前者的肖像印在紙幣上，後者是十六世紀的將軍被拿來重新描述為民族英雄，作為民族／祖國重創的偉大符號，並把他的銅像建立在所有南韓的國小校園裡。

（二）錯亂的民族主義—冷戰的民族主義

同時冷戰與韓戰，更強會了民族認同範圍的收縮，以及減少了被拿來賦予神聖性的歷史資源數量，因此在祖國與民族英雄之萬聖殿裡社會主義的、左派的、民眾參與的歷史材料與人物，全被破壞、消失掉，就如民族主義的另外一教徒一樣。也就是說冷戰狀況，更加的把民族主義偏右化，更吊詭的是打同一血統的民族，當作敵人乙作為整合南韓社會一致反共anti-communist。這種「反共的民族主義」是冷戰的產物，也說明了以對抗假想敵為前提的民族主義，其敵人也可以視同一族群，這多麼的可笑。以同情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簡直可以說那部是民族主義，違反了民族主義的規則，那是一種假的民族主義，或包裝的民族主義，其內容是統治集團對民族國家全國整合與統治策略。所以韓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南北韓分裂的「半民族主義」假的民族主義。

但是民族主義就是這麼矛盾，天真而naive 的民族主義者，發覺南韓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是假的，或痛歎民族主義的被扭曲。因此南北韓交真情而忠實的民族主義者們不能忍受把同一民族視為敵人的錯亂，而為此糾正強烈要求民族統一、南北韓統一。其實這是韓國民族主義的另外起源的追溯，一直出限於南韓的知識分子、學生運動的論述中，以下看看他的另外起源。

二、抗日反美的民族主義

（一）人民抗日歷史的再現與對於統治集團的親日性之批評

韓國民族主義的另外一各起源是從下而來的、反日反美民族解放傳統與歷史經驗。這剛好是韓國統治集團從民族主義尋根過程中，想要排除與禁止談論的對象；但過來說，南韓的反對運動激進批判了，前者的民族主義之虛弱性、妥協性、不徹底性。非主流、官方的知識份子透過過去反殖民人民抗爭歷史的再現，也就是經過歷史研究、抗日個案的考古與挖掘，傳佈了民族主義的研究

成果與民族主義的研究結論。同時暴露出南韓統治集團成員的反民族性或民族背叛性，因為這些高級官僚、軍人、警察，大都當過殖民時期日本人的官員、軍官等（朴總統本身就是殖民日軍的軍官）。這些被指責為附日協助者的，在韓國稱他們為「親日派」，就像二次大戰期間西歐被占領國的那些納粹協助者一樣。

由於韓民族國家的建構，是由這些日本軍國主義協助者集團所主導，反對集團認為南韓的建國過程中，沒有把殖民地的支配性社會權利關係打翻，以及對那鞋殖民協助者徹底問罪與處罰，如，沒收財產與公權力的剝奪等。在冷戰架構下美軍的角色就是協助這些親日集團重新掌權，並鎮壓了人民對親日集團的清算鬥爭與人民民主建國運動，因此種下了反美得種子。

這種南韓反對運動所要件構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是透過農、勞、學生運動，以及地下武裝抗爭歷史之發掘與突顯，並以民族主義形式再現過去。另外一方面，是對於南韓統治集團之親日性的批判過程中建力的。

（二）與北韓民族主義的親近性

在此可順利取得下列的命題，「南韓反對派激進的民族主義與北韓的民族主義之間有親近性」，八十年代後期之前，在南韓的學生運動裡沒有大眾化的親北、親金日成熟潮，僅有過局部而小規模地下組織等非大眾親北傾向。不過浸入八十年代後期的激進民族運動，已經達成理論與邏輯上的飽和與接近極限（指南韓民族主義特有論述的極限。並非對於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的國際與國內性成熟），出現了大眾化的親北熱潮，以及所謂「主思派」出現（註二）。

九十年代前後的南韓社會，這種潛在的親北性傾向是透過學運而公開化、表面化，形成了南、北民族主義互相連接與合作的局勢。因此在社會運動上南北統一運動成為重要課題，出現了推動統一運動的民間政治團體，以及大眾化的統一運動。在此環境下，南韓的學生與反動運動成員非法訪問北韓，以及社會各界的南北統一運動浮出，這些非官方民間團體與反動運動，試圖連接北韓，排除官方而舉辦各項活動。如，大學生的南北國土縱貫運動、南北韓文學與音樂大會、宗教聯合大會等。這些非官方的所有南北交流最近都被嚴格禁止。

連宗教團體也被大眾化的吸入南北統一運動，可見九十年代前後南韓的民族主義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在過去「統一」一直視官方的口號，以及在學運中也缺乏大眾參與的統一運動。從激進民族主義到大眾性南北統一運動的發展，不但讓反對運動取得了社會大眾的支持，而且以此社會支持為後盾，打擊南韓軍事集團的正當性。在金泳三「文明政權」(civil government)登場之前，南韓保守集團面臨了空前的執政壓力，這同時也代表著右派集團在民族主義正統性競賽上的落後。

參、九十年代之後的民族主義

一、文民政權的政治改革與回復民族正統性的策略

(一) 政治改革與政治抗爭場域變化

金泳三文民政政府執政後，首先要做的是回復以往軍事集團缺乏的正統性與正當性，以提高在人民的自發性支持與同意 (consent)。事實甚那些軍事正的狹隘支持條件下，被排除在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教授、基督教會等中間派，在文民政政府某些政治改革的吸引力下被收編與吸納，而從反軍事重圍自願的支持者。其實這是被逼迫的改革，也就是說，反對陣營普遍獲得人民的支持，而形成「反軍事民主民族統一聯盟」的狀況下，文民政政府不得不改革也難的局勢下推動的措施（註三）。雖然這是被逼迫的改革，但由於此改革使得文民政政府的最初一年（1993.2.94初期），讓「反軍事民主民族統一」聯盟失去政治抗爭的議題(issues)，這時期是南韓政治史上，空前的抗議遊行真空期。更準確的說，反動運動無法以過去的方式發動政治活動，以及取大眾的支持。以 Bourdieu 的「場域」概念來說，由於政治改革的進行，使得政治抗爭的「場域」之遊戲規則改變，也讓過去以民族國家違和新的戰場上，打擊中秧國家機器的運動慣性 (habitus)，與改革後有點變化的政治場域，產生段列與不相搭配。因此習以為常的反軍事獨裁民主化口號與召喚，不得不在改革環境下失效。

(二) 回復民族正統性的策略

以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其改革策略包括著所謂「民族正統性」(orthodox)的回復與強化措施。這時被拿來的民族正統性之歷史符號資源是「臨時政」（註4）與「遙控民族主義」(remote nationalism)。

第一，首先宣布拆除象徵著民族苦難歷史的日據時期的總督府，並在此基地回復原來朝鮮王朝的皇宮。第二，從上海萬國公墓中尋找臨時政府閣員的，並把其遺骨移葬於漢城的國家公墓，然後隆重地舉行了公開的儀式。第三，從上海與重慶尋找連時政府的官舍建築，經過專家考證真偽後拆除，移件南韓境內。（後來傳聞，考證錯誤而埋錯了其他民宅，鬧出笑話與批判）。第四，在控制民族主一方面，對於那些三散居於海外的韓裔僑民，投入全民性的關注，尤其把那些拘留在蘇聯庫頁島 sahalin 的韓裔（被日本辦強制的抓去從事礦工等）重新安置於南韓。電視沒以密集而多次的設計，有關採訪這些全球韓裔的節目。在美國的加週發生地震時，對韓裔表達了高度的關切，以及透過募款援助受災僑民。

以上這些官方直接或間接介入的活動，大都以壯嚴的「儀式」形式舉行，並透過媒體直接傳入每個家庭。這些活動所發揮的效果是民族主義的傳佈，以及對於人民的召喚，宣誓著祖國的土地與祖國的懷抱，已可以照顧海外的韓人。並且把現代韓族的發展與祖國的富裕／賜恩，跟過去殖民經驗做二分鮮明對比，製造出某種大眾化的社會性心理滿足與驕傲，以及處動抗日情節引爆強烈的民族主義興奮與感動。這種集體的愛國與愛民族氣氛與政治反貪污event，互相助興的強化了文明政府的霸權位置。

二、北核問題—左右民族主義的對立語文民政權的向右轉 —左有派如何先站民族主義主導權

北韓的核子武器（？）所引發的緊張局勢，提供了強烈引爆南韓社會化潛在衝突的絕佳條件。在文民政權的改革下被封口的反對運動與極右派，開始對北核議題而形成的發言空間，投射了集體的慾望。因此北核的論述空間被兩大陣營快速占領，並引起了激烈的衝突火花。以下簡單介紹其狀況。

（一）右派的動向—反共沙文主義

1994.6.17. 反共有關八十多團體共同創立了「自有民主民族會議」（約有四百人參加），在起宣言文中說，「（我們）要站立於消除左翼勢力，以及宣揚我國建國理念與正統性的國民性專注之最先鋒」，期代表在大會致詞說，「我們具備著國家臨難時起義的聯合救國戰線之主人意識，以反共立國精神而指向自由民主統一國家」。該團體所使用了「消除左翼」的用語，赤裸裸的呈現了極右性，這種「對內」不承認異己與他者的極端排斥性，跟「對外」的攻擊性、挑戰性，同時形成南韓反共沙文主義的一體兩面。也就是說他們想像統一或北韓時，沒有共存與對他者的。承認。因此主張以反共、自由民主的立國精神與正統性的確保下統一北韓。

該團體受採訪時，對北核的處理方法回答說，「不顧一切手段，顧顧（發動）防禦戰而防止北韓的核開發。因此這是正當防衛」，所謂的防禦站其實就是攻擊北韓核設施得委婉表示。

另外南韓的代表性極右派報社，早已在九三年三月說「韓國是否有可能成為下決心要戰爭的國家」他們也像前者已委婉的方式表達了，對解決北核問題上的動武與發動侵略戰爭的意願。童年八一五解放慶典大會中，金泳三宣布說「體制競爭已經結束了」隱喻的表示了北寒舍會主義必亡的希望，故意的破壞了南北對話所必須的先前承認對方的外交禮節。

（二）左翼的動向

比前者快二週前，來自六十多學運、市民團體機構的五百多人組成「自由和平統一民族會議」，在宣言中表示「為了讓1995年成為迎接統一的元年，而主力於大眾統一運動的活躍化... 驅出所有反統一傾向」。在此要驅出的「反統一」對象就是右派與前者，他們批判右派還沒有脫離了冷戰的思考方式，只有口號的統一，而實際上沒有統一的情感。（以上參考 Sisa-journal，漢城；1994，pp. 14-21）

其實及右派也想統一北韓，但其方式是侵略性的、併吞北韓的，而不是長期共存與承認對方的統一。由於文民政權在處理北核問題上，打壓民間的統一運動，並縱容右派等的政策之向右轉情勢，引起了反對運動的不滿。事實上左與右派等互相提供了彼此的成立條件，缺乏良性的溝通，只有惡性的零合遊戲。

大韓沙文主義的形成如此為擾北合問題而所形成的論述空間之掌握，而展開的主導權競爭，可說是1945年來解放以來左右派對立與民族主義起源之

正統性尋求的重現與重演。在後冷戰年代，冷戰的habitus 仍舊是南韓左右派強烈的思考與行動指引。既然兩者之間毫無統一與利益共享之處，但此兩派競爭性追求的北核論述，對大眾造成的民族主義效果來看，很吊詭的、意外的發現，水火不相容的兩者卻誠載著「民族主義」的共同分母，極其對社會大眾的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影響。

在此左右派的沒有合作的共謀下，當今南韓社會蔓延著「大韓沙文主義」的氣流，它是以韓人族群中心主義為核心，多重拼貼了各元素與排外性主張，如，南北一致對抗日、美、中、俄，回復韓民族過去的光榮，收復失去的領土，同情北韓的自主與核主權，爭取核子主權，反日情節。此沙文主義並非已大眾民族主義政黨的成立極其政綱與策略之基礎上，被推廣或散步之。因此它的一種潮流與大眾集體認同的一股趨勢還不算是社會勢力之組織上的社會反動化的運動（如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不過有鑑於冷戰與後冷戰交替之際，那些社會大轉換的地區（如就蘇聯與東西德）所出現的沙文主義化難以保證南北韓滿免於沙文主義浪潮。事實上，南韓已開始著排外韓人中心主義的浮出。那些承襲著過去冷戰habitus 的左右派，不但無法緩和阻止沙文主義的蠕動反而也是此沙文主義的背後支持者。在此探討南北韓的韓人種足中心主義元素，呈現的狀況。

三、大韓沙文主義的形成

(一) 北韓—血族／種族化的民族第一主義

主要以北韓對民族的界定為中心，而探討民族概念退化為血族的經過。北韓對此界定，是從斯大林stalin式的定義開始，如民族式「具有語言、土地、經濟生活、文化、心理等共同性，以及歷史的形成的人類鞏固集團」（朝鮮與字典，平壤；勞動黨出版社，1963，p，336）。而在1968年出版的金日成著作中說「語言是界定民族的諸共同性中最重要的一個。雖血緣一樣，並居住於同一領土，但語言不同則不能說那是同一民族。朝鮮人民的血緣、語言是一樣的單一民族」（金日成著作選集四，平壤；勞動黨出版社，1968，p，1）。特別強調了與言語血緣的重要性。而主張「民族第一主義」的前者的兒子金日正說，「血緣、語言、地方的共同姓氏組成民族的元素，其中血緣與語言的共同性的界定民族特性的最重要表徵」。在此定義中省略了經濟生活的共同性，並可看到民族概念被自然化、血緣／血族化的收縮。1985年的北韓「哲學字典」中，可目睹這種界定已被正式使用的情境，「血緣與語言、領土與文化的共同性為基礎而歷史的形成的社會生活單位，以及人類鞏固集團，氏族共同體解體後，人類為了擁護自主性的長期歷史抗爭過程中，由於血族與語言、領土與文化的共同性為基礎的結合而開始形成。民族是以社會因素的作用而歷史的形成的鞏固共同體」。這完全脫離了早期以經濟生活的共同性為核心的界定，以及血緣把首要化的修正。

這種民族界定已經是被種族主義置換的民族概念，民族只是修辭與外觀，其內容是種族主義。可說民族概念被血族所占領而被架空。這種韓人的血族／種族主義，已被南韓學運激進派（主體思想派）推崇，更準確的說，北韓的血

族化的、種族主義化民族主義召喚了那些激進派，以及由主體思想派在南韓推廣此觀點。

(二) 南韓－大韓沙文主義「小說」的超級效應

今年夏天在北核問題的局勢下，一本沙文主義小說的異常狂熱閱讀，是否反應了這種趨勢（書名「無窮花開了」，此花為韓國國花）？在發行不到一年，就賣掉了250萬部（1994.7左右），超過南韓4,200萬多人口的1/16。齊聚情勢南北韓聯合開發核子彈，最後以此和武功及佔領南韓領土的日本，因此南韓獲得他們的降服而結局。此小說一直發言著核主權的爭取，利用抗日情節，以及對北韓的同情與血族同質感的強調與南北一致的排外。似乎這一本書巧妙利用抗日情節，快速與北核局勢鄉搭配，以核子武器的攻擊性，提供了痛快的滿足與韓人民族自尊的表彰，而使得這一小說成功的打動了讀者的某種意境。

以讀者的觀點來看，置身於後冷戰年代親歷著新舊價值觀的交替，以及九〇年代國內社會各種進步力量的大爆炸big bang，代間／性別／地域／階級之間的差距加大，而所形成的失序的國內外社會警龜脈絡下，身在其中的讀者之社會認知出現了惶張與錯亂，方向趕的迷失，對於全球化地方化的景觀，正可望著認知地圖的出現，以尋求突破的路途。此小說剛好對讀者提供了認知繪圖的服務，尤其在北核問題的局勢下的感動與現實的互動／困惑相互對換，以虛構的劇情感人與劇情認知圖，作為真實狀況之方向便是指南。

在社會認同空間被重構之際，此小說以韓人的原型prototype民族主義情緒，快速佔據了認同空間的缺角部份。此小說的流行，象徵著九十年代初期韓國集體社會認同一股趨勢，不過注意的是大韓沙文主義化的九十年代民族主義，已經是基於南韓所打成的現代經濟發展成果及其驕傲之上，不只依靠『創造的傳統』與過去歷史的發掘。

肆、結論－另類多元認同的難產與萌芽

後殖民、後冷戰的年代，南韓民族主義的進步性幾乎被消耗調，生於的殘渣只是血族／種族中心主義。在全球化的年代，雖民族主義備受質疑，但全球畫畫更加強化了民族主義的反作用。像韓國那樣人種族承擔一均質的地區，民族就是血族／種族，因此民族主義容易被自然化。由於民族＝血族，因此難於分辨民族主義與血族／種族中心主義之間的差異。這使得南韓的多元認同與非民族主義的認同難產，不過南韓社會的階級／城鄉／性別／代間inter-generation／地方與中央等等，社會矛盾與衝突的激化、多元化，使得民族主義的認同之監視censorship網絡，出現龜裂與漏洞，萌芽著多元認同與不同系列社會認同之間的衝突與抗爭，所謂『認同政治』浮出。在此簡單介紹此狀況。

一、內外開放的民族主義？多元認同的難產？

1993年南韓的外交研究所教授與研究生，以「Post-modern global politics,』之名共同出書，其中一位以『地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探討了民族主義的將來，他認為普遍共同體還沒有形成的狀況下連民族共同體也解體。則缺乏地球

化過程忠勇報備受害者的共同體（Kim,S.B,1993,p,393）。所以他覺得目前民族共同體有點需要，但他也覺得韓國民族主義要在後現代全球化年代，變成彈性的內外開放的民族主義，並超越現代性的、以領土排他性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同上）。

那麼這種民族主義已經不是民族主義了，只是一種人民大眾的原型民族主義。或者者跟強烈的那種原型民族主義的某種妥協。在此個案看出韓國社會之中兼固置根的民主主義狀況，對韓國人（？）來說民族主義似乎是難以放棄的信念！

二、居民自助地方邦聯的南北統一

南韓社會開始出現了難得的另類、非民族主義南北統一的發言。今年1994年南韓季刊雜誌『對話』，就以『文明轉化』、『國民國家之沒落？』與『後國家主義的實踐論』等主題下，企畫了這種另類的對話空間。作者們來使主張以居民自制團基礎的地方自治聯邦，想向南北統一的政治體制，並批判了以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提出統一方案的南北韓的統一方式。如，南韓的『民族共同幾』統一方案，以及北韓的『高麗聯邦制』（一民族一國家二體制二政府）。

其中經過過渡的交流、聯合階段，但其終極目標是中央集權民族國家，並且散發著大韓沙文主義、韓人種族衷心主義。後者類似於中國的一國兩制，但不同的是北韓承認兩個政府（一國兩府），與聯邦政體。雖比前者更具突破性，但缺乏民眾參與、居民自治為基礎的聯邦架構。因此作者們強調地方主義與聯邦主義為基礎的統一構想，而反對國家一元體系（unitary system）（Sung,1994,p126-135）。

其實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各種認同的其中之一，但在韓國被非歷史化、自然化，使得多元認同的可能性受限。在反帝反美反日的特殊歷史時段下，沒有必要民族主義扮演以往的角色，映把其過去的角色轉遞於其他的多元認同，其本身也要讓步其以往的特權地位。應從許多認同連鎖中，放棄唯我獨尊的霸氣，應與其他認同共存。從劃分我與非我、我們與他們的排斥性認同架構，應轉向圍不把『差異』化為『敵意』的多元認同情境。

註釋：

註1：在六十年代president park制訂『國民教育憲章』，以『我們秉持著民族重興的歷史使命，而誕生在此土地』開始，這是學生必須要背的，以及教育儀式必讀的憲章。

註2：在學運裡追求金日成主義裡亂，即，以主體思想作為思考與抗爭的指導原則的派系，取得了對於大眾與組織上的優勢。學運之外的反對運動相對不是公開而直接的表明親『主體思想』，不過在韓國學運代表抗爭運動的前鋒與先導，其影響力遠超出學運領域。

註3：這包括※反腐敗的一連串措施，如新制訂高級官僚的『財產公開法』，並調查過去在軍事政府下的不法蓄才，讓那些親軍事集團的從黨政官僚辭職。※並宣佈不接受大企業集團、財閥的政治現金，以及不打高爾夫球的承諾。※金融改革與新制訂選擇法嚴格限制買票行為。雖這些措施讓文民政府的

支持率上生，但缺乏更艱難而重要的社會經濟改革，如，財閥的拆散、、地方差距與衝突前任軍事統治者與光州事件的處理問題等。

註4：殖民時期流亡上海的中間右派所組成的臨時政府，其成員中有主張武裝terrior的一派與外交妥協派，他們之間的共同姓氏不已民眾參與為基礎而抗日，差異是外交妥協派以請願方式，向歐美訴求臨時政府之承認與自治，不像terrior派一樣發動對日直接的武力的攻擊。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 1992 "The new world disorder", New left review, no 193, may/june, 1992.
- Hay Young-sun, ed, 1993, Post-modern global politics, Soul : Nanam publisher.
- Kim chun-sik, 1988, 南北韓的民族概念分析, Souel University, MasterDissertation, publish administration.
- Kim song-bae, Hay-sun ed, 1993, 地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 Ha young-sun ed, 後現代地球政治學, NANAM pulisher.
- Sung K.L, 1994, 為分裂的克服與地方的復興：國民國家改革論—聯邦主義與地方主義邏輯, The dialoge quarterly, Souel : 對話出版社, no.1, summer, pp126-135.
- 金辰民, 無窮花開了, Souel : Haenaem publisher.
- 金在日, 保守與進步的對決, Sisa-journal, 1994, 7月

漢城的韓屋保存與環境運動

慕思勉

這一次韓國行主要是訪問與本所研究方向相關的學術單位、團體，進行經驗交流，其中八月十五日我們訪問了延世大學建築研究所金聖雨教授研究室，「韓屋地區的保存與開發」是延大欲討論的第三議題，主要發表者是研二的學生潤東根（音譯），但因時間因素而未能發表，會後與其交談，發現很多“有趣”的地方，值得進一步交流。因這篇大部分的台灣同學也沒聽到，特翻譯出來供大家參考。

訪問檀國大學區域發展研究所時，博士班研究生崔承哲（音譯）發表一篇關於南韓環境運動在今年六月地方自治選舉中的策略與展望，崔先生古道熱腸，是八零年代末韓國民主化運動出身的戰鬥學生，他還特地將他的文章盡量用漢文表達。另外，我們訪問韓國空間環境研究學會時，漢城大學環境研究所的博士班學生李商勳（音譯）發表關於南韓環境運動的簡要介紹，是一篇較理論性的文章，我將此兩篇文章串接起來，大致可看出南韓環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其積極介入政治中進行變革運動的發展，供台灣關心環境、社區運動人作參考。

另外，我們與「另類文化團體」的趙惠淨教授談及總督府拆除事件時，她認為韓國的民族主義大概已達到了頂峰，尤其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下，靠民族主義的動員大概玩不下去了。吊詭的是全球化是金泳山在參與APEC及韓美高峰會談後，體認為了提昇競爭力而大力提倡的概念，除了空間結構上的政策外，並透過廣告等各種媒體大力宣導，是繼反共、現代化之後國家的主要論述。學界亦湧現一股研究風潮，將全球化接合於地方化、資本與空間結構、環境政策、經濟調節、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等各個論述，並批判金泳山的全球化內涵只不過是獨佔資本支配階級的利益代理，在「強化國家競爭力」的民族主義號召下，犧牲勞工利益，這方面的觀察則有待更多的交流。

韓屋保存¹

一、韓屋保存的時勢與論述

八〇年代後，南韓在全力謀求經濟成長後，積累了某種程度的財富，同時

¹本文部分摘譯自潤東根，“韓屋地區的保存與開發”，此文並非論文，而是為了配合幻燈片發表而寫，作者再參考韓文“空間”雜誌、“漢城都市設計”重新改寫。

出現批判南韓社會精神文化貧瘠的聲音，認為應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因而形成了保存傳統性文化環境的運動。保存論述的發展也由單棟建築的收集古董式的保存方式，轉換到強調整體性的面的保存。

二、嘉會洞韓屋保存的指定與解除過程

嘉會洞位於慶福宮與昌德宮之間，在朝鮮時代是兩班階級的住宅區，俗稱北村，包含嘉會洞在內約十個洞，建築個體的保存狀況尚稱良好，人性尺度的巷道空間是其最大特色，在整體性的保存理念下，於1983年被指定為「韓屋保存區域」。

但是在指定的過程中，居民並沒有獲得充分的參與，而是由市政府片面的決定，而且並沒有具體的保存及基礎設施改善的計畫，只是一些限制性規範，要求居民遵守，如依據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限制建築的開發、規範建築高度等，造成房屋年久失修、地價凍結，基本的生活設施，如交通、消防設施的不足等等的問題，並且是以行政單位作為範圍指定的基準，使得一些已呈貧民區域的環境漸形惡化。

民怨日深的結果，居民於1990年3月組織了「嘉會洞韓屋保存區指定解除促進委員會」，開始了集體的抗爭示威。問題漸趨嚴重的狀況下，1990年12月市政府承認了保存政策的不當，並縮小範圍，只保存保留完好的建築群，指定「傳統建築物保存區域」，但居民的反對運動依然沒有停止，經歷了數次的強烈反彈與抗爭後，市政府終於於1991年3月完全解除了保存的指定。因此，這個由行政權力主導的官方保存政策可說是完全失敗，但整個過程中所浮顯的保存制度的問題、公私的關係、居民權利等問題，不只是歷史地區保存的問題，其實是整個漢城都市計畫制度實施的根本問題。

解除保存指定至今已四年，但在沒有任何替代性保存對策下，嘉會洞一帶已因急速的開發，漸喪失其風貌，韓屋群之間不斷有突兀的新建建築出現，在韓屋群周邊更有大面積的開發案在進行。

三、保存與開發

韓國韓屋保存的失敗，一是因為行政部門完全不顧居民生活的權利，只看到房子，而看不到人的結果，另一主要失敗根源還是在於漢城急速發展後的房地產開發利益，保存與開發成為兩者擇一的問題，在不尊重歷史及開發進步的意識對立下，界定什麼地方是保存區，什麼地方是開發區的這種分類觀念就是一個錯誤，後續的執行亟需「再發展」的觀念與技術。

韓國的環境運動、地方自治

一、南韓的環境運動²

(一) 環境運動作為意識型態抗爭

1.1 環境意識型態

四個環境意識型態：深度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馬克斯主義，作者的立場較傾向於社會生態的位置，認為其兼具了理論與實踐，社會生態學以Murray Bookchin為代表，認為生態危機起源於男人意識對女人及自然的支配，堅持應推翻一切的階級統治形式，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強調平等與共同體（community）的重要。

1.2 環境運動的界定

作者強調生態的或環境的問題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有密切的關係，並以葛藍西關於霸權與有機知識份子的說法，認為個體奉獻的重要角色與環境意識型態對運動的巨大影響，意即，本質上，環境運動就是反抗經濟成長意識型態的運動，環境運動的目的是非物質性的而是理想的，因此，改變對自然與社會的態度是社會運動的關鍵。依據社會生態論的觀點，不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皆在特定的生產過程中，浪費資源，造成生態危機。

(二) 南韓的環境運動

2.1 南韓發展的路徑

過去的威權政權的壓制力量是由軍事政變所獲得，他們所做的任何事皆是有助於權力的維持，他們沒有市民政治的合法性，因此以經濟成長為國家目標的首務，致富是國家精神的表徵，任何有違反此原則者皆摒除在外，所以任何勞工運動、社會運動、統一運動被嚴格禁止，在這段獨裁政權發展階段，獲得了高度的經濟發展，同時失去了自由、平等與民權，環境品質持續的惡化。

2.2 南韓環境運動的處境與特質

70年代後期出現的環境運動試圖解決環境危機，但運動沒有獲得迴響，並被勞工運動者視為是布爾喬亞階級的玩意，當權者也不屑一顧，但隨著環境品質的惡化及人們要求潔淨環境的需求日升，環境運動獲得迅速的發展與多樣，他們可分為兩種意識型態，一是深度生態的取向，另一則是基於大眾主義取向，後者是因都市環境運動沒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唯有當環境議題產生時，才

²本文摘譯自李商勳，“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 Movement of South Korea”

有動員的可能，因此，他們努力動員的是人們的利益。

九〇年代中半後，情況已改變，公司資本已無任何限制，可到達任何地方，資本所到之處伴隨空間發展的意識型態，所以地方的權力菁英試圖提供最佳的環境供資本投資，因此，對抗於經濟發展的生態意識倡導非常困難，尤其是在低發展區域。

南韓今年實施地方自治的第一次選舉，每一區域必須對自己區域的成長負責，今日，環境運動的首要任務便是在區域經濟成長與區域環境保護間的意識型態抗爭。

(三) 對南韓環境運動的建議

3.1 環境運動作為區域性環境運動

地方自治漸形重要之際，環境問題卻有被忽略的趨勢，環境運動必須發展區域性特定策略，並成功的動員人們的共識保護區域環境。

3.2 第三世界的團結

每個區域都必須面對全球性資本投資，多國資本擁有權利，卻不必對其進入的環境負責，相反的，區域沒有權利，但必須對環境負責，所以每個區域必須找到自己的武器保護自己，而唯有區域間的多國結盟才是最好的武器，南韓必須第三世界與亞洲國家的環境運動聯繫，或可克服運動的某些限制。

二、草根環境運動與地方自治選舉

(一) 變革運動的危機與新社會運動的抬頭

87年全國性狂熱的民主化運動，使進步陣營產生新的轉機，一方面，產生了就韓國社會性格的理論性熱烈爭論，以及作為古典變革運動主體的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而另一方面，以學生及新中間層為主的新型態的進步社會運動開始抬頭。

但是過去主導變革運動的是毫無階級身份的青年學生，過去的變革運動較偏向理論性及觀念性的，將焦點置於透過尖銳的政治鬥爭來獲得權力，而輕忽日常生活的問題，但面對漸趨開放的政治空間，進步陣營因在88年的大選受挫及運動路線過於僵化的結果，而加速分裂，出現多樣化的運動形式。這些所謂的新社會運動雖然以日常生活的問題作為問題意識並進行批判，但卻迴避了體制的結構性問題，而被認為無法擺脫資本主義框框的限制，對此，進步陣營分

為兩種對應的看法，一是認為目前的韓國社會性格，沒有成立市民社會的條件，在此前前提下，面對新形式的新殖民法西斯，認為應採取全面而直接的民眾戰線才是首要課題，相對的，另一種看法認為市民社會運動是在韓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具正面意義的替代性方案。

（二）6,27選舉與市民運動在地方自治扮演的角色

在前述的脈絡下，形成市民社會運動主要範疇的環境運動，在這一次的地方自制選舉中便明顯的揭示了他們作為一種替代性市民社會運動的位置，而積極的參與選舉。在由中央集權轉化為分權的社會體制過程中，這些環境運動團體不只是提出了藉由居民參與的生活政治實現的市民運動的基本理論位置，更是企圖藉由 80 年代後期前後所興起的環境意識，搶佔市民運動中的主要位置。

而他們在中央集權以及菁英政治的構圖中，採用了積極性與消極性策略，積極性策略是推出進步陣營的候選人，進入權力核心，另外，提出進步性政策替代方案及嚴格監督選舉等消極性策略來擴大大眾的支持基礎。

（三）地方自治選舉的意義與市民運動的力量

選戰結果，並未能克服中央政治對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及政黨組織戰，進步陣營意欲實現生活政治的地方自治基本目標，可說是徹底的失敗。

但是由投票率來看，進步陣營所推選出的勞動、農民、市民、女性、環境、青年等候選人的得票率相對前次選舉有明顯的成長，算是這次選舉的主要成果，而過去市民運動無黨、無派的進步陣營，經由這次選舉，則有進一步組織政黨的可能。

後記

雖然我是一個曾經在韓國居住約二十年的人，但民族意識、習性差異、法令規章限制等諸般條件糾葛下，一直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會及偏見中，造成我對韓國社會的陌生，感謝崔誠烈，使我能夠有一次較深入理解韓國人的機會。

民族主義現形記

潘翰聲

我們離開台灣的時候，恰巧是中國在東海舉行飛彈演習，透過人民日報大舉批李的敏感時刻。而參加韓國政府在815光復50年的紀念活動，正是此行一項主要行程；因而，民族主義的思考與反省，便在旅途中如影隨形。

初遇韓國民族主義

初抵韓國，就到漢城的「曼哈頓」—汝矣島，這裡有國會大廈、主要的電視台、和許多大企業的企業總部。聳立在漢江畔的「63大廈」，就像許多的開發中國家一樣，急著證明「韓國人也做得到」。這天恰巧是週日，教會在漢江河濱公園舉辦著紀念晚會，是終戰五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一，活動還沒開始，沿著河走的馬路就塞得很厲害，擴音器唱著為統一祈福的歌，柔和且浩大的樂聲，是我們與韓國民族主義的第一次接觸。

晚上住在江南區。寬敞的馬路爬在略微起伏的地形上，路旁溫帶的杏樹和不知名的樹種種得十分濃密；大一點的商店都提供停車位，路邊一律禁止停車，單車專用道上更掛著牌子特別強調；許多商店也在路邊擺上幾張桌椅，方便路人停下來小酌一番，幾乎完全符合規劃師的理想。然而，即使是在這個為了漢城奧運建起來的「另一個漢城」，入夜之後，大樓裡頭髒亂程度也不會輸給台灣。

第二天，經由漢城一個另類學術團體「空間與環境協會」的安排，我們前往即將被更新的貧民舊區，訪問一個市民組織。司機覺得帶外國人來看這樣的貧民區「是一件丟臉的事」，而對崔兄大發脾氣；這使我們見識到，韓國人之重面子，與他我之辨。

慶典、雜音、悲與喜

我們在韓國的這段期間內，全國上下都在歡慶「光復五十年」。慶祝活動的布條在漢城街頭隨處飄揚，上頭印著太極、天池、大海三個韓民族的象徵符號，電視時時都在播放描述抗日歷史的影片，各項紀念活動會場上更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韓民族慶祝他們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極致，則是在8月15日「獨立紀念日」，將過去日本蓋在朝鮮皇宮上的總督府拆掉。會場上方飄著由兩顆大氣球掛起的太極國旗，前後兩片大型LED看板也同步轉播光化門前的紀念典禮，讓所有參加的民眾都能有置身整個盛會的參與感。典禮台上大統領金泳三、民間推動統一的團體、藝術家輪番致詞、表演，和一般紀念活動大同小

異，特別的是有許多年紀較大的韓國人都穿著傳統服飾參加這個活動；此外，也有五十顆中型氣球，綁著五十張布條，條條寫著當年韓國的重要史事，記住五十年的悲與喜。

8月16日所有報紙的頭版，都刊登了總督府圓頂被拆除那一剎那的相片。九月初我再次回到漢城，現正作為歷史博物館的總督府，持續展出韓國歷史考掘的成果，大廳則準備博物館最後一次的回顧特展；未來將整個被拆掉的總督府，依然被一張朝鮮王朝皇宮的「想像復原圖」所包裹，使我無法仔細端看這個台灣總督府的兄弟究竟長什麼樣子。被鋸下來的圓頂與其說是供人憑弔，不如說是韓國政府故意要他難堪地，將總督府斬首示眾，讓他孤獨、羞赧的坐在總督府的右前方，讓國民都能帶著小孩子們對他指指點點，而不僅僅是對日本近年來刻意淡化、扭曲殖民歷史的示威。

8月15日當天下午，我們和延世大學建築系的交流活動中，談到古蹟保存的議題，我們報告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拆除事件；對總督府正在拆除這件事，韓國教授卻無奈的說「我知道保存這棟建築物的價值，但是最多只能期望拆除之後再找地方重建....」。

他到底是面對怎樣的社會壓力呢？總督府是在怎樣的社會氣氛中被拆除的呢？另一位韓國人給了我一個解答：「把原來的皇宮拆掉，在上面蓋統治者的政府，在世界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事！」他還憤恨不平的說，有許多日本人來看這棟總督府，拍照留念，是為了炫耀說「日本人曾經統治過韓國」。因此在韓國人心裡，將建築物保存下來並不能作為歷史的教訓，反而變成民族的恥辱。如果再看看漢城市中心幾座皇宮，幾乎都曾在戰亂中焚燬而一再重建，就不難理解韓國人對於「復原」的堅持。

二次大戰結束50週年對韓國人來講是值得慶賀的，因為韓民族終於脫離日本殖民地的苦難；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分裂的現狀，卻是令人感傷的。「光復50年」的韓國社會，就交織著這般矛盾詭譎的氣氛。連報紙上的漫畫，也將拆除總督府的歡騰與面對國家分裂局面的無力與悲戚，加以對照諷刺。

就韓國學生運動的歷史觀點來看，1945年終戰結束帶來韓民族長夜後的黎明，然而旋即因為美國帝國主義的介入，及其對軍政府的支持，而使韓民族限於長期分裂的悲劇。因此，談民族的獨立，就不能不談民族國家的統一，以及政府的正當性問題。

在官方喜氣洋洋地舉辦活動的同時，漢城街頭卻瀰漫催淚瓦斯；幾次我們在市中心的地鐵站轉乘時，都看到準備集結，或是抗議活動轉進中的學生隊伍，學生手握布條坐在地上，脖子上掛著毛巾，手腕上纏著手帕，身上發出猶未散去的刺鼻瓦斯味。而我們在8月14日到國立漢城大學參加研討會，就受到警察的嚴密盤查，直到確定我們不是參加隔天抗議活動來集結的學生，才予以放行。許多大學校門口也張貼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活動海報，布條上一顆水藍的地

球浮現出統一後的朝鮮全圖；一些大學的水泥地面上，則以韓國傳統元素為材料塗抹期待統一的心情。學生們認為新成立的「文明政府」和過去的軍政府並無差別，仍在民族國家分裂的現狀下牟取利益，無心改變此一現狀；金泳三以肅貪之名運用司法打擊政敵，卻不願追究「518光州事件」的負責歸屬，而扶植金泳三上台的盧泰愚、全斗煥等前軍政府首領又被宣判無罪，於是頻頻發動激烈抗爭。地鐵的車廂裡便常常可以看到學生散發的傳單，乘客則被斗大的「5.18」所吸引。

我和一位博士班學生路過明洞大教堂，路旁也掛著「5.18」的布條，他說十年前這裡是學運街頭抗爭最激烈的地方；在那個年代，他班上四五十個同學畢業時不到六七個，一些同學被退學後隱瞞學歷到工廠組織工運、一些被軍政府羅織罪名入獄、夜裡失蹤不再回來的同學更多。

在這個熱熱鬧鬧的節日裡，雖然有許多雜音，地鐵站依然悄悄展覽著「大朝鮮帝國史」，一陣回溯朝鮮族歷史的風潮方興未艾，拆除總督府彰顯了民族正氣，韓國民族主義是如此熾熱、活躍；一位另類文化團體的大學女教授卻說是：「民族主義的黃昏」，頗令我們感到驚訝。而當我走在明洞鬧區，耳邊韓僑歌手充滿洋味的流行歌曲此起彼落(我曾誤以為是外文歌)，她的MTV擺動著民族主義者所不能忍受的誘惑，卻大受歡迎。再回想起紀念會上年輕人對哀悼民族烈士的儀式感到厭煩，而被稱為「橘子族」的海外出生的韓僑，回國發展後紛紛進佔菁英層的位置。在全球資本的浸蝕、穿透下，看似如日中天的民族主義，竟然不過是迴光反照的黃昏？！

從漢城看台灣

關於民族主義，我們常常聽到這樣教科書式的說法：「民族主義是在外國勢力的壓迫下形成的」，另一種像「民族主義是歷史的建構」則漸漸流行。在國外這一個月裡，經常要去回答「我是誰」這樣的問題，或是關於故鄉的事；許久未曾去認真思考的統獨問題，時時刻刻干擾著我的心情，逗發那潛藏的燥鬱症。

與韓國人聊天，總會聊到中國在東海試射飛彈的事，他們很驚訝我們居然都說不怕，我也問我自己「真的不怕？」。隨著被問的次數增加，以及報紙、電視愈來愈多的報導，從中國、台灣幾個可辨識的漢字裡，我居然也有一絲的擔憂；然而，不論是否能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搞得清，中國的舉動，似乎都已經帶給這些鄰邦相當的不安。

形形色色的問題中，最令我不知如何解釋的，是在同一個延世大學學生談論韓國「8.15獨立紀念日」時，談及台灣在當天並無任何紀念活動，而官方的活動主要是在10月25日的「光復節」，但光復節並不是「獨立紀念日」。他便疑惑的問道「那台灣的獨立紀念日是哪一天？」，經過費力的解釋，他終於瞭

解這其中的複雜關係；我們卻都無法理解，為什麼當亞洲甚至世界各國都在8月15日慶祝(紀念)二次大戰結束五十週年之時，台灣卻遺忘了脫離日本殖民歷史的這一天，反而選擇了另一個政權在台灣的「始政日」作為「光復節」。

先前在野黨到日本「慶祝」馬關條約簽訂暨台灣脫離中國一百年的活動，某「民主電台」甚至搭便車的舉辦旅遊團，我感到身為台灣人的可恥。此刻，在野黨執政的首都市政府宣佈，將設立七七抗戰勝利紀念碑，並在10月25日「光復節」於總統府前舉辦以「終戰」為名的 舞；對照於韓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我對台灣政客的作為感到 心、反胃。民族主義在台灣從來沒有深刻的反省，而只是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以及為資本主義邏輯掃除障礙的工具(看多少「日據」時期的建築因此死於非命)。

僑胞變台胞、國人變外賓

漢城的外港仁川有許多中國山東來的移民，他們不被認為是韓國人，也沒有韓國國籍，只有居留權。在海關外面我們就看到許多跑單幫的山東移民提著塞滿衣服的包包，待個一兩天，他們便又帶著中國的農產品回到仁川。跑單幫的中國人在韓國是個被歧視的行業，他們對職業的認同也很低；知道我們是台灣來的，其中有些人便自稱是「做生意的」，到過美國的便自稱住在美國，也攀親帶故地說曾住在台北的中永和如何如何。而中國海關為了這批人，則特別簽發一種「一次往返」的「台胞證」(這張台胞證拿到山東以外的地方，他們都覺得很怪)，除了少數持紅皮的「人民共和國」護照，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擠在這個窗口排隊。

一位自稱一天看好幾份中文報紙的「僑胞」，刻意在我們面前批評李登輝搞台獨（後來我們發現他的說法跟「人民日報」一模一樣），其他的人對政治的興趣卻沒那麼高，只想快快辦好趕緊通關。當我們說「那麼多批評就不要投給李登輝嘛」，才發現他們根本不知道台灣在爭論「海外僑民」是否可以投票，其中有些人還不知道有總統選舉這回事。後來看到他們也拿深綠色的「中華民國護照」，辦理「台灣地區居民往來大陸旅行證」，才猛然意識到，一群未曾踏上台灣這塊土地的人，由於特殊的歷史情境，而有著和我們一樣的身份；我不知道台灣有多少人能接受這個事實，這裡有許多未曾謀面的遠親跟我們是「同一國」的。

出發前我們就自嘲是「中國苦行團」，並試著隱藏自己的身份，不只是避免被當「呆胞」痛宰，也希望能夠體會一般中國人民的生活。但我們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的時候更多，至少都會被認出是外地人；那麼似乎可以粗略地指出，辨認他/我的機制，主要並不是血緣、膚色、人種，反而是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在辨識的過程中更為凸顯、重要。

初抵青島那天下午，到火車站預訂車票，由於一再有人插隊，雖然我們排在第四五個，經過三四十分鐘還買不到票，連前面年輕的澳門導遊也向我們抱怨「他們這些人」，從外面世界帶來的規則在這裡完全失效，要麼入境隨俗，要麼什麼都沒有。

就因為這樣，旅途中天天都有新鮮事，時時刻刻都要有受驚嚇的準備；「大陸尋奇」之類的節目天天跑進生活裡來，自己又好像那種綜藝節目裡被作弄的路人。有人說要瞭解一個社會，就把標語、口號倒著唸，但標語的倒置尚不足以說明現實狀況的複雜。火車車廂內貼有「禁止吐痰」「請勿將垃圾外拋」的標語，或許就能想像車廂內是如何髒亂（以「先進」的標準來看），鐵路沿線深綠的草地上也佈滿垃圾，猶如積雪未化；但是卻想不到列車服務員拒收有湯汁的垃圾，要我們直接往外拋。從各百貨公司所張貼的「X大禁語」，或可窺見一般服務品質的惡劣，以及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路上的陣痛與不順；但是地鐵末班車的情景卻令你難以置信，前一刻還陶醉於為您播報站名的甜美錄音，下一刻卻傳來司機兇惡的喊叫聲趕你下車，只因為他要提早收班回家，才不管你到了終點沒有；更令你驚訝的是，乘客們都乖乖下車沒有一句怨言，出了地鐵站也別擔心沒車回家，面的、小巴都在外頭等著。

或許你聽過「天高皇帝遠」，知道出了京城一切都不一樣，而進京的班車更是沒五分鐘服務員就來拖一次地板；但今日的中國已是「天下莫非王土」，連遠在天邊的哈爾濱都在推行「七不准」，顯露公部門干涉生活世界的強烈企圖。然而當公權力無所不在的時候，公共的內涵就因此而空虛了，日常生活的脫序與放肆，就是平民百姓對社會控制的抵抗，也難怪中國的知識份子會欣羨新加坡經驗。

於是處在公權力所不及的末梢，或者本身就是末梢的時候，就是「天高皇帝遠」的天堂了。在圖們站前廣場，幾位拉不到客的小巴司機對我們放狠話說「今天別想有人敢載你們幾個離開圖們」，逼得我們改變行程，這使我相信「千島湖事件」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特殊個案。

佔用公有資源、生產工具以牟私利的現象更是常見，運用行政裁量交換利益也是微薄薪資之外的小甜頭。路邊的小公廁，可能就有一對老夫婦收費，卻不提供任何額外的服務；在車廂臥鋪不該吸煙的地方，服務員可能會向你推銷冰棒，暗示代替罰款；渡輪上較舒適一點的位置，可能以提供涼水的方式，收取高於船票數倍的費用；某個不對外開放的觀光點，只要亮出當地官員的關係就可破例參觀，當他知道你是外賓，或許會委婉地要求買你手中的外幣。至於平民百姓，只有靠著擠、爭、搶、鑽以在夾縫中生活了，或者掙錢作大爺；一次我們在長春車站前與人搶搭一班小巴，坐定之後，來了個導遊，與車掌談妥就把車子包了，車上的人全乖乖下來等下班車，沒有一句怨言。這看在我們眼裡，簡直不可思議，不僅沒有消費者權益，連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也蕩然無存，我們就經常諷刺又無奈的唱著「社會主義好」。

面對這些奇景，我的發言位置令我十分焦慮，我經常不自覺的以「次帝國之眼」來看，時而讚嘆東西好吃又便宜，時而認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在所難免，雖然幾十年前台灣的物質條件也不過如此。我是將中國視作他者，當作一面鏡子來觀看自己的高級觀光客嗎？是人道主義的站在他們的某個位子，提出善意的批評嗎？還是庸俗的學術研究者，只是為了自己知識上的興趣？

儘管我們再怎麼偽裝是中國大陸人，甚至穿著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衣服，到了需要證明身份的時候，「內賓還是外賓？」就有決定性的區別了。再怎麼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在此時此刻都不如視同外國人的「外賓」這個詞來的真實；而如何堅持台獨基本教義的人、捍衛中華民國的人，還是得乖乖拿出「台胞證」，承認你在共和國法律中的位置；但是話說回來，核發台胞證所依據的「中華民國護照」，兌換人民幣的銀行員、查票的火車服務員、機場安檢也要求查對護照確認身份，何嘗不是承認了台灣政府對這兩千萬人的有效統治。

中國的旅程中，曖昧的身份變動不羈，一再挑戰「我是誰」的認同問題，一日數變的身份，更使得精神狀態異常疲憊而陷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我們遊走於身份認同的灰色地帶，直到離開威海的甲板上才安定下來，於是我們選擇國際歌為這段中國行送別。

民族的苦難與歷史

中國大多數城市沒有什麼夜生活，晚上我們窩在旅社寫日記、看看書，一旁就開著電視。中央電視台每天晚上都有一系列特別節目，介紹中國各個小地方人民抗日的故事，訪問許多當年參與戰事的老人、受迫害的平民、甚至穿插幾個回到中國戰場懺悔的日本人，其中「南京大屠殺」是花了最多篇幅、最被詳盡報導的；東北地區的地方電視台，則密集報導「九一八事變」的點點滴滴。北京天安門廣場側邊的歷史博物館，也盛大舉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紀念」的展覽，並將巡迴全國展出；我們所到的每個城鎮，不論大小，至少都有一面牆，展覽關於抗日的歷史圖片。更不用說，所有的報紙都闡有抗日歷史故事的專欄。有趣的是，對我而言這些歷史恐怕陌生的比較多，國民黨的抗日歷史，則只有戰死沙場的軍官上得了中共史觀下的歷史。

北京的大學生說，政府發放許多票券給青年學生，要大家去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興趣。此時人民日報刊載一系列批李的文章，更引起一般人廣泛的興趣。如果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這段歷史是怎麼連結的呢？我從頗受歡迎的「北京青年報」所做的一項民調理出一點頭緒：記住歷史是重要的，而這段歷史的教訓是，中國人要強大、要團結，才能不受欺侮；李登輝訪美，就是引進外國勢力，分裂中國作民族的罪人。九月初，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的官方說法，也是順著這個脈絡；強調中國

人團結的重要性，及外國勢力介入、分裂中國的野心。在無人能夠挑戰的民族主義大旗之下，六四民運被打成外國勢力的煽動，便被「恢復秩序的北京」所遮掩。世婦會，

中國、韓國總是強調日本侵略、佔領時期慘無人道的舉措，日本則強調他們是唯一受到核子彈攻擊的國家，台灣則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四百年殖民歷史；每個民族都只看到自己的悲苦，都認為自己是受難最多的民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許多抗日戰爭的宣傳總是以此做結；但是，對自己民族所受的苦難總是記的特別深，戰爭的殘酷、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卻很少被提起，反而是更多對內部反對力量及左右鄰邦的武力威嚇。

順著這個脈絡，再看看我們國家所論述的歷史，很容易就到體會到“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意思。更進一步說，是誰在搶著書寫這些歷史，如何書寫這些歷史？如果城市是石頭寫成的歷史，那又是“誰”“如何”“在那裡”塗抹這些石頭的顏色？

殖民城市的建築就正記錄著，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相互的抗衡的歷史，而有著特殊的色調，而面對殖民城市的不同態度，就給這些石頭塗抹不同的彩妝。漢城、長春、哈爾濱、大連、青島，這幾個我們所拜訪的殖民城市，以及我們每天所生活的台北，對待歷史建築的態度都非常不同。漢城的人民在民族國家的動員下，拆掉總督府向有著帝國主義心態的觀光客示威；長春的“偽滿”建築，一面告訴共和國的子民，國家積弱的痛苦，一面大賺日本觀光客的錢（一張長春舊地圖的影本要價兩百人民幣以上）；青島的政府機關在殖民者走了之後隨即補位，居住在擁擠天井裡的平民百姓依然如故。過去的殖民者，隨著“改革開放”重新搭著德國製汽車回來的同時，我們還看到一個巨大的逆轉：殖民者想遷回原來雄偉的老建築，居民卻要拆掉老建築，換裝成象徵發展的玻璃帷幕大樓。

唉，我寫的未免太多了，就停在這裡吧，雖然有點突兀.....

我看歷史保存 ——一個另類觀點

彭揚凱

終戰後五十年的八月十三日，韓國將它在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戰後做為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建築物拆掉了。而這整個過程是相當戲劇性的，原先韓國官方並無此種打算，這由將此棟建築做為國家級博物館的作法也可看出，可惜事與願違，民間對它倒是頗有意見，是要除之後快的，同時夾雜著政治上反對勢力的對抗，整個事情就像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最後終將拆除行動付諸實現，喪鐘遂被敲起。至於要如何表達展示這樣的拆除行動，也是頗費周章的，好不容易才敲定用切除中央高塔穹窿頂的辦法，在對應於光復節當日所訴求的民族獨立茁壯，的確，沒有比得上將日本殖民建築（軍國主義）斷頭、閹割更好的詮釋了。猶記拆除當日，在國家精心設計架構的空間場景裡，現場一片肅穆，數以萬計的韓國群眾，或著傳統服裝，或執太極旗，將整個會場塞的滿滿的。除了大批全副武裝的鎮暴部隊外，對我這外來人而言，最為感觸的便是那溢漫於身邊的民族情緒，與透過儀式不斷傳達出的悲痛殖民記憶，就這樣，這棟著實算的上是精美宏觀的建築墓誌業已豎立。

隔日，當再次來到現地時，那在儀典中被摘除的殖民桂冠被置在原建物的小廣場前，周圍淨是站滿好奇的人們，試著要一睹那藉由摧毀而標誌著大韓國族榮興起的證據。同時在一旁也正搭設起小鷹架，將它整個框住，很顯然的，光是昨日的斷頭去根仍舊是痛快不足，人們正計畫進一步的要修理它。在跟現場韓國民眾接觸的機會裡，我也試著問問他們的想法。答案是，他們很確信的告訴你，『它』是個恥辱，是代表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暴行，是罪惡的表徵（這和搶著跟李登輝選總統的國民黨林洋港所言類似，他還真能掌握民意依歸，只不過空間場景放錯了）。巧的很，就在那眾人皆曰殺的現場，我們也看到一位身披白布的老兄，忙著發散反對此次拆除行動傳單，孤伶伶的，就在那人來人往中.....。

接著在與漢城延世大學建築所師生的討論中，關於這件事也引發了大夥討論的興致。在彼此往來的對話裡，我好似覺得彼此總少了點共同的基礎，因為由他們的言談話語中所透露的，讓人隱約覺得在韓國的現實土壤上，關於歷史建築的保存是有更加複雜的面向，它不僅關乎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兩難，或是歷史凍結術的這類的價值觀辯難，它更要面對國族歷史情感這類根本不可侵犯的圖騰，那是一頂大帽子，大的叫人們無法逃脫，在其間除了贊同之外，就只好噤若無聲，

專業者的社會性桂冠，因而被歷史性的摘除了。可是在其它一些案例中，我卻又發現，其實韓國在歷史保存的成績仍有可觀，至少跟台灣比起來是好的多，這又跟我原先以為的截然不同，可真是件奇怪的事。

至此，將時空拉回到 94 年四月的台灣台北的博愛特區上，當時上演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拆除，和所引發的一連串抗爭與討論，這著實跟韓國的情境有很大的不同，那麼是什麼致使台灣出現了這樣不同的表徵呢？就我自己言之，當時自覺的義正辭嚴，除了國民黨很顯明的『黨庫通國庫』的壞勾當叫人難容外，出於專業上的認識及價值判斷更是不免的。尤其在老 K 的『不是古蹟說』、『恥辱論』等怪招出籠之際，與之對抗的論述性辭語更是顯的必要，就這麼，歷史建築、人民記憶、市民社會的正相關邏輯建構是再正當不過的，得確，我也深信不已。可是再回到問題上來，如果這樣的詮釋是『真的』，那麼是否意味著韓國走的是條相反的道路，因而它的成熟度不夠，它的市民力量尚未覺醒，它在這件事上的情緒化與批判性的缺乏。是嗎？如果真是這樣，那又如何解釋台灣在歷史保存方面相較下的普遍落後。

在中國的一些行程，又有給了我些另類的見聞。先談談長春，它同是日本殖民重要的代表性城市，相較於台北或是漢城，在規模上則更是完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算是分佈在 的滿州國皇宮及八大部區，還記的當日跟瀚聲急忙要再有限時間裡，試著要將所有殖民建築一覽而盡，走的筋疲力盡卻覺得十分痛快的情形，而最讓我映象深刻的，首推總理院。它算是這裡面最具規模的建築物，現作為白求恩醫科大學之用，原先我倆因囿於學校之故，只想悄悄的跑進去逛逛，那知一進去，便有接待人員迎面而來，殷情的領著我們參觀，原來，醫學院也做起生意來了。這種狀況，其實在中國四處可見，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可是問題是它所賣的是歷史建築，是向來由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所包攬的獨門生意，曾幾何時，這也讓權便利了；更較我感觸深刻的是，相較起其它去過的北京故宮、天安門國家歷史博物館、瀋陽故宮等重點文物單位，這兒的服務顯然親切多了，再也不用看為人民服務大爺們的臉色，難道是因為開放改革之故嗎？

此外，在北京時同正修一道去拜訪了清華建築系陳志華教授，又給了我不同的想法。老先生年近七十，精神仍舊健旺，且不久前才剛由外地田野考察回來，在閒談間，陳教授大嘆現今大陸歷史保存的難處，在發展經濟的大旗下，只見人們迫不及待的要拆掉它，唯恐其礙了資本積累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專業界裡，歷史保存也是難以為繼，因為越來越少有人肯投身其間，原因無它，沒前（錢）途是也，其實還不光是在歷史保存上，老先生甚至覺得整個建築專業教育都是如此。縱使這樣，可是當話題一轉到歷史保存相關對象與方法時，在他的言詞話語中，我仍感受到那不懈的毅力跟堅持，著實讓人覺得是有股魔力的，雖然現實上他的身影是如此的孤獨。也許是這樣的談話，引發了老先生的興致，他問了我一

句：看你如此有興趣，應當將來是走這方面的吧？正當我仍在猶豫不知該說什麼之際，正修機警的幫我引話搪塞了過去。直到在回去的路上，我反反覆覆的想著該怎麼講才是，這不光是為了要回應陳教授，同時還有我自己。

回來後，我不斷在想著這些問題，而且試著要寫出來，然在幾經思慮後，總覺得依舊是片片段段的，理不出個清楚的脈絡。我曾經試著用殖民歷史經驗、國家機器特質、發展過程取向與社會關係組織這樣的視點來切入問題，也得出了一個看似有趣的比較關係。剛開始，是覺得這的確有助於理解，是能夠就問題提出一個較為『合理』的回答。但再仔細想想，其實問題更大了，因為，如以歷史社會條件為基底來作為討論思考是有效的，那麼會逼的我們要回答一個更嚴峻的議題，那就是—僅就歷史建築而言，『好』的方案是什麼？因為我們既然認定特殊的社會歷史情境是不可輕忽的要素，那為何總是答案只有一個，一個不容再解釋，不能再細分的『肯定』，要歷史保存。漸漸的，我發覺越來越抽象的語言和一般人聽不懂的知識突然越來越重要了，透過它，我們找尋、灌注意義給了歷史保存，我們給歷史保存指引方向，正如彼岸誇讚老毛的術語，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是嗎？

人們不禁要問，我上面這些喃喃自語，到底是想講些什麼？不可否認的，它的確是這樣夾雜不清，也許是我的思路混亂、腦子不清楚所致；但在跟一些人談及此時，結果告訴我其實我們是一樣的；好，就算恰好還是一群腦子不清楚的傢伙的討論，因為是近親繁衍，致使水平每況愈下。可是我們還是得做個判斷，其一，是壓根沒有這種錯亂關係，純粹是問了個虛構的問題。其二，的確是有這些層次的複雜關連，但在理論陳訴上是有其脈絡可循，而非有如同我得錯亂觀感產生，所以，是個人問題。這樣好了，我試著用下面這段話來表達所要說的、問的，接著來做個判斷。簡單的講：

就再這當頭，我只覺歷史保存一詞變得日益模糊，它好似緊要的很，可是什麼呢？該怎麼辦呢？直覺的，我們應當驅步向前，它便能越放越大，越看越清楚，到了最後，對，就是那幾個字。可是也許不是這樣，也許我們根本沒有貼近它，我們只是順手拿起副望遠鏡，就將其一覽而盡，就以為是伸手可及，其實還差的老遠啊！更也許每個人的望遠鏡都不同，有美國製的、歐洲製的、日本製的、還有 made in Taiwan，彼此間倍數不同、解析度不同、甚至是每個人站的位置不同。然後，大夥齊呼看到了看到了，你看，就在那！

好，不管怎樣，人們的確看到了。接著，意見出來了，大夥開始對它這樣的寫法有意見，它可以更『好』的，可是好的標準在哪呢？要回答最有效的方法事先找出那裡有問題，那裡一看就有缺陷，來針對其做討論。於是，人們接著拿出放大鏡進一步的探個究竟，原來的圖像，再這樣的光學再作用下，給了人不一樣

的結果。漸漸的，人們看的越來越細緻了，可是相對的，能看到的由全體而部份，是越來越少了，到了最後，得到的是一團黑，一個根本讓你想不出跟你所要觀察有何關連的一團黑。

藉由這樣有點牽強的比喻，我所想要問的正如此一小段文字所點出的，人們是怎樣『知道』有歷史建築？人們是怎樣『看到』歷史建築？人們是怎樣『評斷』歷史建築？最後是，人們到底『知道』、『看到』、『評斷』到了什麼？要回應這樣的問題，至少我發覺過去所知所見並無法提供一個適當的條件，因為其所關注的並不在此，它們想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真實的世界脈絡裡完成對其論述實踐的可能，縱使在理論、模式、方法上有所爭論，但基本上這樣的取向是貫穿這其間的。也因此，它們分享了一些共通的信念，在此我稱之為規範，基於這樣的規範認定，人們開展了接續而來的行動方針。可是為何這樣的規範是成立的，是人們所受的，也必須接受的，這就值得討論了。真是奇妙。

照我看來，對於歷史保存的規範性認識主要在兩個面向上，且相互串連。首先，是歷史建築的存在與意義的確認，也就是說，我們確信有歷史建築而且真的看到了；其次，是對歷史建築的存在與意義的再次生產必要的確認，因而我們要去評斷它，要歷史保存。關於第一個部份，我們先問，真的有歷史建築這樣一種客體嗎？江士林給了我們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保存剛開始在美國或歐洲市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小規模對抗，卻很快地扣連上國家和國族的打造過程。國族的過去神奇的具體展現其中的神聖空間，和古代的權威一起作用，自然化了國家。

在這段陳述裡，它給了歷史保存的緣起一個時間的向度，是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出現的。也就是說，在那之前，事實上並無所謂歷史建築這類的東西。但為何在所謂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它們會歷史性的浮現，為什麼直到了那時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另一方面，人們又怎樣看到它呢？先由建築史的討論來找些線索，我們可以看到如新古典主義對歷史美學追尋，巴黎美術學院的競圖源由，直到與普魯士民族的軍功武威結合這一過程，是由對自然距離所生的懷古意念到最極端的法西斯威權形式作手；又如威廉莫里斯因對機械文明的嫌惡而滑入烏托邦式的田園幻想，或是麥金托以手工藝對抗工業生產所產生的神秘主義氣息，我們的確察覺到了對工業資本主義小規模的對抗這樣的端倪，但這並不是所謂的歷史建築（或是說保存），雖然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它們都是了。在技術層次上來說，我們看到的是由創造過去的技術變成保留過去，這有個較為簡單的表徵，那就是歷史建築及對應它的歷史保存。在隱喻上，好似人們試圖創造些許事物，可資於現實亦化的對抗，可是到了後來，他只能以藉著留下些什麼來回應了。

那是如何由意向上的領略與形式上的追尋轉折到所謂的保存凝視呢？為何

會有這樣的轉變？原因必然是相當複雜的，可是由時代性的集體癥狀來看，至少可以立即的指出兩點，即民族國家興起與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在國族歷史研究者眼中，這兩者其實是有一定的關連性，不可諱言，此種看法對我們而言別具啟發性。當資本主義發展衝擊舊有封建接制度，基於在生產之必要內發性的要輔以新的社會契約關係時，國族此種制度性的歷史神話便在此時人為的被創造出來，而它的基礎是，人們部份權力自由的讓渡，以形成資產階級的國家社會。正因此，我的看法是，歷史書寫創造特定的形象的能力也被讓渡掉了，在空間形式上，創造被保留取代，歷史建築登場。

於是人們知道，喔！原來有一種東西叫歷史建築。且在國族形象形塑的特殊要求裡，知道是要透過一種被設計過的看來達成的，因為它是被建構的，唯有在國族情境中方能有真實的存在，如果不是這樣，人們看到的便不是歷史建築了。那麼這樣的看又代表些什麼？最簡單的，人們會以為所看到的就等同於那被看之物，也因此，物的存在與意義是被再次生產的。接著是，人們以為他看到了是什麼？而這又跟這被設計過的看有何關連？看並非一無意義的舉動，他表徵了對訊息的接收與解讀，就國族統攝的範疇裡，他試圖要人們以其所設計的方式來看到某物，為的是要讓人們得知的所見之物是以它設定的狀態被理解的。因為透過這樣的操弄，一種虛幻但真實的共同意義得以產生，使的人們得以自認他是以國族的狀態存在的，他只有一個位置。再想想前面那一小段寓言，可以這樣說，其實那是個創造出來的圖像——『歷史建築』，是經由被認知而存在的，同時人們被提供了看的工具與位置，然後他認為他看到了，而且他亦認為唯有在這裡才看的到（事實上也是如此），到了最後，關鍵並不在於真的有被看之物，而是看的本身——要在這個位置上才得以看到東西，但那是個什麼位置呢？

緊接著如果人們也認為他所看到的看到的是好的物，那又是個怎樣的情形？常理來說，會更多人搶著擠上那個位置，因為那有好東西看啊！聰明狡詐的國族，正是在這樣的供需機制裡完成它的自我實踐，它說道：加入我吧，因為有好看的喔！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它唯一要克服的，是要怎樣讓你看到這個由他所呈現的圖像並覺得很好，顯然這是個技術問題。正因此，對歷史建築言亦是如此，唯有讓它是好的才能發揮看這樣的意義實現，那技術上要如何時現呢？不待言喻，歷史保存技術與專業是也。

有人會質問，照這樣的邏輯來看，透露出的好似這整個宛如一場騙局，人們在其間只得任由操弄，隨著國族的旋律起舞，而這其實是不自覺的陷入的僵化的結構主義教條中，根本未能視見人的主體能動性。事實上，在歷史保存的論述中，關於這類的警覺亦並非沒有，像是對國家角色涉入的分析，經理文化的警覺，歷史意義的解讀重構，記憶動員與創造，還有就是專業涉入的自覺等，出現了許多相當具有反省力的論述，絕非僅是簡單的現實與技術取向。同時，事實也顯示出，

社會實體並非無人之境，而能任意的教化塑造，許多的事例告訴我們，人們是有抵抗的意願，有再現的能力，只要透過動員與適當技術介入，就有了扭轉並進而創造了新的可能，像是台灣在歷史保存論述及運動的歷史性轉進，便是很好的說明。

沒錯，真實的世界的確沒有如此簡化，不會也不應用單一的模型來套用，它關乎的是特定歷史社會的具體條件，所以就歷史保存來說，我們看見了在不同國家、地區，有其不同進展條件，至於在類型取向與成敗與否的取則上，也被賦予了特定的意義。因此，積累龐大的資料、讀本、講座、案例，告訴我們歷史建築的困局，要對抗的條件，要實踐的方案，要使用的工具，要配合的技術。在歷史建築系譜學上，我們也領會由技術性的修護到總體性保存的躍進；在他山之石的教戰守則裡，波隆那和妻籠宿的榮光猶未退卻；而於現實的台灣上，一波波的歷史建築戰鼓正在響起。一切看來，縱使不是形式大好，也應是猶有可為。就這樣啊，趕緊加把勁面對現實才是重要，沒什麼好遲疑的。

但我倒不這樣認為，尤其在台灣、在韓國、在中國的種種見聞，讓我有了不同的異端想法。他告訴我，人們是有不同的看與看的位置的可能，甚至是發明新的，它或是國族主義下的血脈躍動，或是資本欲求的宏圖霸業，是發展困局的鄉愁自證，那不是一成不變的，也許還有許多許多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察覺，原來看與看的位置這樣的關係才是關鍵，可以這樣說，歷史保存是看之下的認識，但並不是唯一的認識；位置的選取也許已難為國家所壟斷，但縱究還是有人創造了它。因此若我們深信歷史保存是義無反顧的、是不證自明的，那麼我們應當要想想，要如何創造歷史保存的看與看的位置？同時在現實世界各種可能人們被看到之物裡，歷史保存要如何能脫穎而出？而又是怎麼樣的人與怎麼樣的能力跟誰能夠作為創造且提供出那看的位置之基礎？如果在面對對歷史保存有不同的看與看的位置狀況時，那又會是如何，該怎樣面對？

歷史保存你真的看到了嗎？熱情且聰明的人們，你說呢？

漢城的都市發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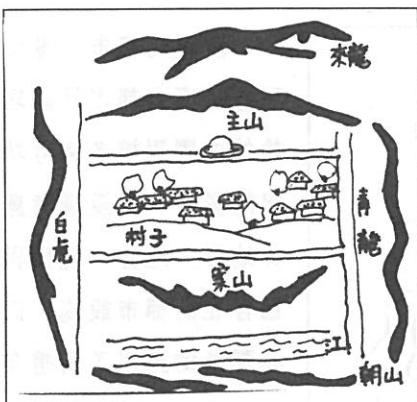
朴未定

一、 漢城的地位（人口：一千萬、面積：**708.39k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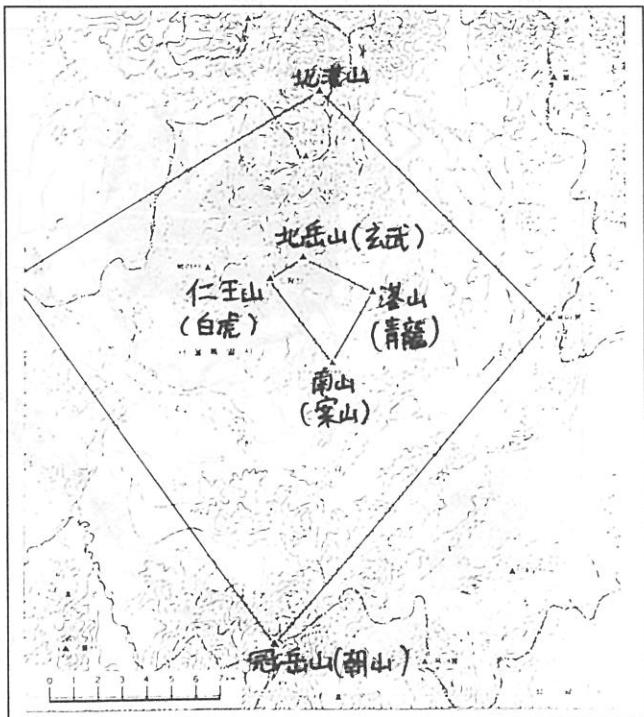
1994年，漢城作為韓國的首都已六百周年了。在1392年朝鮮王朝建立，構想建立一個新的首都，兩年之後1394年10月遷都到漢城。在五百多年朝鮮王朝中漢城叫做漢陽(太祖三年，一三九四年時改稱漢城)，在日帝時代則叫做京城，漢城則稱“Seoul”具首都的意涵。漢城至今仍然是韓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中心，而且又是精神上的中心都市。漢城不論是自然環境、歷史、政治情況以及現在面臨的社會變動狀況比其它的世界任何都市皆足引起興趣。

- 漢城的自然環境：漢城由高山環繞，寬闊的漢江則流過漢城正中央。
- 漢城的歷史：在六百多年的常久歲月中，始終是一個可容納二十萬人口的城廓都市。受到許多戰亂與殖民地的難過之後，前三十年間人口增加到五倍，浮上為國際級都市。
- 漢城的政治：在半島的地理情況之下，東西意識形態明顯地表現在南北韓分裂狀況。在1990年德國統一之後，漢城是個最後因意識形態所分斷的國家首都。
- 漢城現面臨的狀況：現在，漢城正處於由開發中國家的首都邁入加國際經濟的世界性都市，必須進行功能的轉化。因此，漢城正在落實地方自治制。如上所述，雖然在他的背景、歷史、社會上的狀況都很有趣，但漢城是否個為人生上有趣的都市，卻值得懷疑。這點就是漢城的困境。漢城具有六百年的悠久歷史，為了了解漢城的都市架構，透過六百年漢城的歷史探險，我們才能掌握漢城真正的樣子。

二、原形生成期：李朝五百多年



[圖一] 風水說的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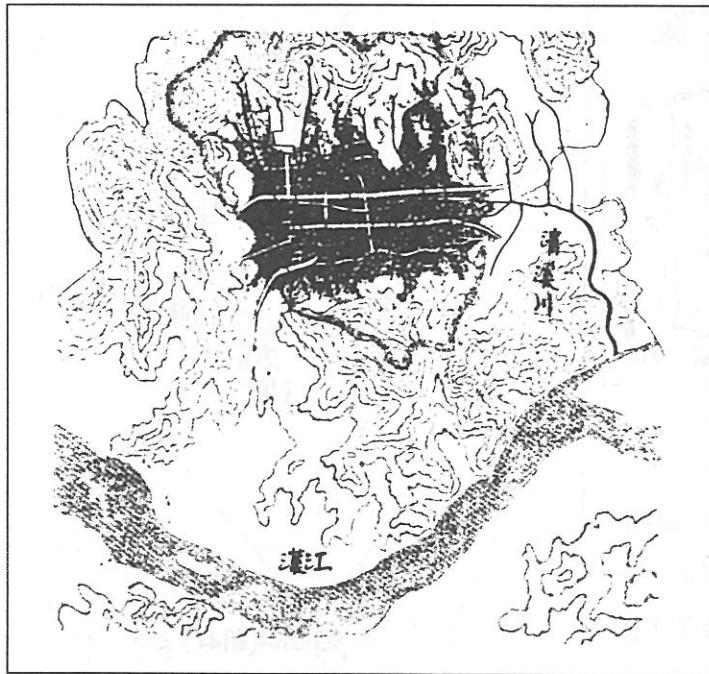
[圖二] 漢陽附近的地形圖

朝鮮王朝從李成桂在1392年替代高麗，登上王位而開創，一直到1910年純宗時被日帝侵奪國權，經歷了27代519年間。太祖將首都由高麗時的開城遷移到漢陽，並應用風水說作為環境配置的根據。風水說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原則（參考圖一）。首先玄武主山是風水說的中心，從這裡才為明堂的開始，所以玄武一定要一座山。前面則應置案山與朝山。如此典型的形勢在漢城可以看得到（參考圖二）。北岳山當主山（玄武），青龍落山與白虎仁王山各左右守護著明堂位置的漢陽城內，而南山則是案山，冠岳山為朝山。

這意味著主山國王領導左右的青龍、白虎這兩臣民，在中間放叫案山的桌子，與朝山重臣坐在一起。對漢陽的水流而言，首先，在明堂水方面，從四神山到明堂所流入的水就是現在清溪川，而客水是漢江（參考圖三）。

漢陽作為天惠的場所，具有基本的金海平原，以肥沃的經濟基礎，利用漢江的漕運，而內山與外山重疊地圍繞則是防禦要塞，還具有右青龍，左白虎，北玄武，南朱雀等山的風水象徵系統以及內水和外水，所以可以說他具有完美的局勢。不過，主山面對朝山是國王與臣民關係的象徵，但作為主山的北岳山比臣民的朝

山冠岳山低，因此市井傳言，朝鮮受到不少外勢的牽涉、臣民的造反與下剋上(the lower dominating the upper)等皆與此有關。



[圖三] 漢陽的水

漢陽的都市計畫受到當時東方都市計劃理論的中國周禮冬宮考功記的影響，但漢陽考慮其地形、地勢、規模與已存在的都市設施，而具彈性的應用了周禮冬宮考功記。

一、中央的主宮景福宮：李朝時代在漢陽營造了不少宮殿，但現在只剩下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德壽宮等四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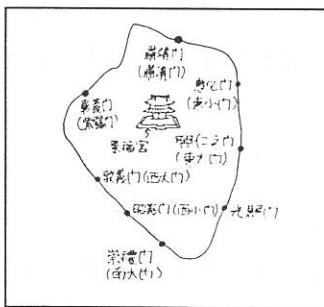
二、左廟右：左邊是宗廟，右邊是社稷壇。

三、前朝後市：宮前面是六曹，宮後面是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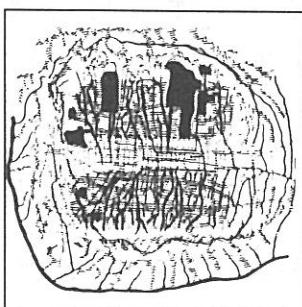
四、隨著山脊築成的城郭(一共四十多里)與八個城門。

五、南北幹線道路與東西間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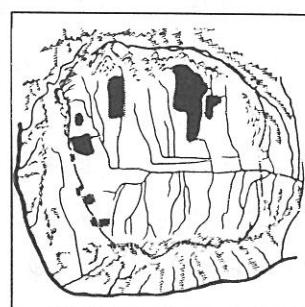
六、漢陽是依當時社會統治理念的儒教(confucianism)來運作，所以隨身分等級可分出居住區來。漢城組成權力者居住在北村，相對的地位較低的住在南村，商人階級住在鐘路，城廓外則是農民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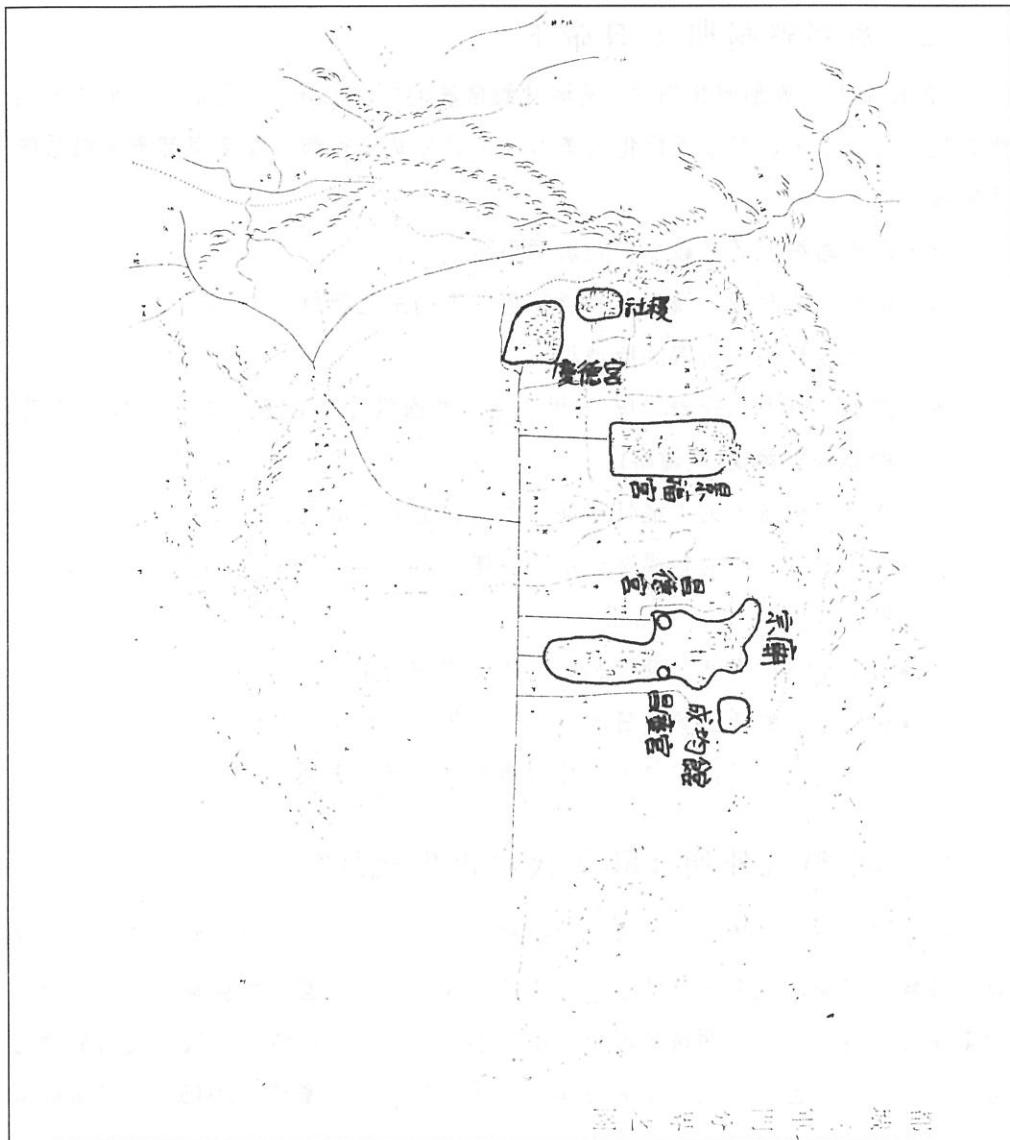
[圖四] 漢陽城郭圖



[圖五] 北村與南村



[圖六] 明堂地



[圖七] 漢陽的都市配置

漢陽都市原形的要素

- 四方向的山(左青龍、右白虎、北玄武，南朱雀)
- 內外的明堂水
- 都市的城郭
- 明堂地(宮殿、左廟右廟、前朝後市)

- 主要街路系統
- 北村與南村

三、原形毀損期：日帝下

在日帝下的原形毀損期間，漢城受到徹底的經濟剝奪，以及都市原形的破壞所支配。表面上，以都市近代化的美名，但其實是進行都市改造與都市象徵系統的破壞。

- 一、以道路擴長的名義，拆毀城廓與城門。
- 二、由於道路改設，橫切入昌德宮與宗廟的中心部位。
- 三、宮地被殖民政府機關所使用。
- 四、南村成為殖民經濟的中心(現明洞，韓國銀行中心)蠶食掉原有經濟基礎的北部雲鐘街(現鐘路)。
- 五、作為殖民統治的中樞性建築，強迫營造於象徵的位置上。
 - 拆毀象徵主權的景福宮光化門，建立朝鮮總督府(以後的國立中央博物館)，切斷從主山北岳山流下的正氣。
 - 為了制壓德壽宮，營造京城部建築(現市廳)。
 - 在朱雀山的南山營造日本神社，並強迫崇拜。
 - 在漢陽的北漢山中打入鐵柱而抑制韓民族的正氣。

四、原形疏外期：60年代以後現代期

到了現代期，韓國回復主權，正是韓國人可用自己的能力發展經濟與都市建設的時候，但是並沒有充分的活用這個追求漢城獨特的歷史性與都市觀的機會。如果說日帝時期具有了明確的歷史認識與都市觀，但這個時期韓國人反而故意疏忽了自己的歷史性，而且把全努力集中於功能性成長。遭遇了1945年從日帝的解放與1950年同族相殘之悲劇和分斷之後，經濟成長的熱潮佔領了朝鮮半島全社會。這種現象不只是單純的戰後復舊或再建，而是韓國人為了克服近代疼痛的經驗，為了不讓歷史重演，厚植自己實力成為挑戰性的課題。在此狀況之下，漢城以驚人的速度變化。在50年代人口約20萬的漢城，在30年之間成長為千萬人口的都市，立下了世界史無前例的膨脹記錄。在此如此激烈的變化中，極卻擺脫過去歷史記憶的無意識社會心理造成對都市歷史性的疏忽，似乎是當然的事情。

四大門內中心區是第一個為了因應新都市發展的對象地，將清溪川覆蓋後，蓋高架橋。在日帝期使用的南北道路上建立世運商家，則是表現70年代的土木技術與建設勢潮的計劃。伴隨著東西間道路的開發，由於南北間再開發，都市發展的需求增大。四大門內已呈飽和的狀況，這促使了往江南的發展，江南連接另一70年代象徵的高速道路創造開發機會。據此，連傳統上認為禁忌的鑿山的工作，為了便捷到達江南的理由下，進行南山隧道工程。因為可如此輕易的獲得成長機會，對漢城的既存地區置之不理，而往南方廣闊的機會發展。在此過程中，產生了江北地區稱為“月村”的地方 - 這是解放後的歸國橋胞，6.25後越南難民與避難民，60年代後則是大量農村移住民所建立的生活場所 - 在發展過程中被忽略了的問題。江南代表了現代化、豐饒的經濟、新機會的場所，克服了過去江北地區的限制，創造了新天地。但是如此的新天地不能發揮漢城的歷史性，而且一連接生活與環境、建築與都市合諧的都市觀並未形成。

(一)1960年代：從市中心到外圍的分散政策

韓國在1956年以後為了克服韓戰的破壞，回復社會的安定，60年代實施以開發與成長為主的上位政策，推動以輕工業輸出導向的產業化政策，造成大幅度地改變了韓國的產業結構（參表一）。

[表一] 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韓國的產業構造

	1 級 產 業		2 級 產 業	
	比 重	雇 用	比 重	雇 用
62年	37 %	63.1 %	16.4 %	8.7 %
72年	26.8 %	50.6 %	23.5 %	14.2 %

同時，如此的工業化同時伴隨了都市化的發展，根據60年的人口調查，都市化率不過37%，但70年的都市化率則達到了51%，都市化主要在漢城、釜山、大邱、仁川等大都市，特別是漢城以每年平均10% 的人口膨脹率引起了住宅不足、交通混雜、上水道不足、空氣污染、居住密集等多樣的社會問題，面對持續的人口成長與產業集中，漢城市採取了繼續擴張行政區域的政策，試圖調整漢城市中心集中的人口密度。

為了能夠容納二十年後五百萬的計畫人口，漢城市在1966年研擬了seoul cityplan，該計畫中為了減少市中心的人口，提出了都心再開發（the re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areas）的對策，而且為了有效分散都市功能，計畫範圍包括了漢城市外圍的次中心建設，這些外圍的新近鄰住宅區是以區劃整理方式（the land adjustment method）來實施，規劃漢城東北部的江北能夠容納一千兩百萬人口，漢城南部的江南則為一千零七十萬人口，漢城西部為八百九十萬人口，不過此計畫造成地價的急遽上升及不動產投機，69年時的地價上升率達到了全國平均的80.8%，尤其是在70年1月發表江南開發計畫後，土地投機達到頂點。另外，為了解決交通混亂的問題，該計畫認為未來必須引入地鐵作為大眾交通工具，並計畫地鐵網路連接主要地點的公路與循環道路。

整體而言，seoul cityplan計畫具有基本的限制性，因為其不是在國家整體層次上考量人口與產業政策，而只是從漢城的角度將人口與產業由市中心分散到外圍的政策，總之，人口與產業的集中並沒有緩和的趨勢。

另一方面，60年代快速都市化造成居住環境的惡化，產生大量的違建住宅，漢城市開始研究漢城整備與無許可建築的清除方案，訂定違建戶撤去計畫，並於1968年初開始開發城南住居團地，不過這些新都市並沒有完善的公共設施，帶給這些新移住者許多生活上的不便，再加上並沒有提供充分的雇用機會，因此，發生了移住者再往漢城遷移的現象。

（二）1970年代：從江北到江南的分散政策

1970年漢城市變更了1966年的general plan所提議的分散都心人口密度計畫，因為此計畫並沒有使漢城達到平衡發展的目標，加深了都市蔓延、人口與產業繼續集中的問題。另外，由於經濟發展提升了居民生活水平，更促使了必須變更seoul city general plan，更改的內容如下：

1. 為了阻止都市蔓延，在漢城都市外廓設置開發限制地區（Development restricted area）
2. 為了阻止遷居於中心部，設置特別設施限制地區（special facilities restricted area）
3. 在既存開發地區內，計畫重新配置人口與產業設施。

該修正的計畫，以市中心人口的減少觀點來看，與1966年的general plan並無不同，但在人口分配的作法上卻有所差異，意即，如果說1966年的計畫是為了分散中心部的人口到外圍，那麼1970年的計畫可具體的說是從江北到江南的人口

配置計畫，其因第一是為了配合江南的快速發展，需要將人口的集中導引至江南，第二則是以國防上的理由，必須限制江北的開發。

這個計畫的概念受到了Burgess的同心圓理論（concentric circle theory）的影響：

- 5km以內：辦公與商業區
- 5到10km zone：容納241人/ha的最高密度居住區（意即，提高原154人/ha的既有住宅區密度，而未開發的江南地區，則以重劃的方式計畫為高密度住宅區）
- 10到15km zone：透過近鄰住宅區概念的中密度居住區
- 15km左右zone：低密度高級住宅區
- 15km以外zone：為了阻止都市蔓延的開發限制地區

不過從六零年代末至七零年代初，韓國經濟遭遇了很大的危機，首先，從1962年始以低薪勞力密集的輕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由於國際市場的變動，這種資本積累方式遇到了瓶頸，朴正熙軍事政權乃於1972年實施獨裁體制的維新，以及在1973年轉換以重化學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來化解危機，並據此研擬了國家綜合開發計畫，一方面支援重化學工業的養成以持續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積極介入管理因大規模土地開發所發生的土地問題與環境問題。該計畫為了提供這些重化學工業區及化解都市住宅缺乏的現象，強調必須開發與供給大單位產業基地，大規模居住團地的開發是由「大韓住宅公社」來執行永洞（74）、蠶室（74）、登村的建設，以及在1979年開發的果川新都市便是在此脈絡下興起的大規模公寓團地。

隨著越來越嚴重的人口集中現象，所造成的住宅嚴重不足現象，其對策固然是住宅的大量供給，但諷刺的是都市計畫區內可開發的土地價格卻也急速上升，成為阻礙住宅供給的原因。

在上述的產業與土地政策下，韓國經濟克服了73年的石油困境（oil shock），繼續推動了經濟成長，在此過程中，更加速了都市化發展，1975年的人口調查顯示都市化率超過了59%，產生新的都市問題。首先，漢城已經變貌為人口七百萬的巨大城市，其最嚴重的都市問題是市中心的老化與外圍地區違建的大量增加，居住環境明顯惡化，另外，產業化與都市化雖創造了都市地區的不動產需求，但卻造成土地與公寓的投機行為。最後，環境的污染浮顯為另一都市問題。

(三)1980年代：多核心都市結構的構想

70年代初的江北到江南的人口配置、人口與產業集中的控制、開發限制地區的設定等行政政策，成功的減少了江北的密度、快速的人口增加以及都市蔓延的緩和等都市問題，不過急速的都市化進展與持續的人口集中，依然顯現在新開發區域的都市設施與基礎設施之不足，成為嚴重的都市不均衡現象。另外，70年代中期鐵道網路的形成，促進漢城往大都會（metropolitan）區域的人口分散。

為了解決這些都市問題，漢城再於1984年提出了新的seoul city general plan，其主旨為市中心再發展與多核心都市化的概念，該計畫強調以漢江為中心創造一個具傳統性的理想都市，其重點包括驛勢圈開發、生活圈規劃、都市內既有資源的均衡分配與有效再利用等都市環境改善方案，計畫的另一特色是為了解決都市問題，將規劃範圍擴張到漢城首都圈。

為了解決傳統單核心都市結構所造成的問題，提出了如下的對策：

- 1.採取分散的開發策略，形成多核心都市結構
- 2.日常生活設施的標準化
- 3.由中心單核的循環放射式交通系統轉換為格子式系統的交通網絡
- 4.大眾交通設施的集中投資
- 5.都市地景與開放空間的再組織

這個成立於1984年的計畫，為了有效控制未來漢城人口的過度集中，計畫內容包括了1988年漢城奧運的主要計畫，並且依據中央政府設定2001年為目標年度，計畫將權力由中央移轉到地方政府，以有效管制誘發人口集中設施的建設與擴張。

該計畫為了落實市中心再開發與不良居住環境改善，其具體內容包括蠶室、新村、Teheram路的都市設計方案、奧運設施計畫、漢江綜合開發計畫、Mog dong(334ha)、Go Deog(334ha)、Ge Po(935.7ha)、shang Gae(330ha)等大規模團地計畫，並且提出漢城發展為三個次核心（永登浦、永洞、蠶室）與13次中心的多核都市概念。三個次核心位於離市中心約三十分鐘車程的位置，並且也是連接全國主要都市的有利位置，次核心計畫可容納1-2百萬人口，包括主要政府設施、中小企業本部、大公司的支社等機構。為了社區感的形成，導入大中小分區的概念，小分區計畫容納30-40萬人口。另外，此計畫的特色是驛勢圈開發，以驛站為中心半徑500米以內為500人/ha的高密度開發區，半徑1000米以內為300人/ha的

中密度開發區，這是以驛站開發分散人口的基本概念。如上所述，這個計畫的目標在於藉由人口與都市功能的再分配，重新組織土地利用，並且也是藉由都市設施與功能的恰當分配結合交通系統，共同構成多核心的都市結構。

上述政策的結果，造成漢城西部的佳樂洞、東部的新亭洞、漢城北部的Dong San ri、北東部的Shang Gye Dong成為分配中心，為了配置無污染的產業與遷移不適於市中心的工廠，興建了包括Nan Ji Do 與Ga Yang Dong等工業園區。

最後，為了面對將來經濟與社會變化可能引起的交通課題，提出以下四個基本政策：

- 1.建設地鐵系統
- 2.建設都市高速公路
- 3.主要交通網路的格子型開發
- 4.suburb terminal與cargo terminal的計畫性規劃與開發

1987年不動產價格的急速上升，到1989年初江南的中大型公寓成為投機操作對象，爆發成社會整體的問題¹，政府為了抑制房價，認為應擴大住宅的充分供給，在1989年發表了盆堂、一山等五個新都市建設計畫，致力於化解首都圈住宅缺乏的困境，不過既有的新都市已顯現出諸多問題，因其只具有居住功能，必須依賴漢城的都市功能，尤其是工作場所，所以造成長距離通行與嚴重的塞車現象。

(四)1990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的因應

89年末東歐的沒落，象徵了世界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改變，所謂的全球化意味了資本的世界化趨勢，資本的世界化對都市造成的影響，與過去70年代初的輕工業體系與70年代中的重化學工業體系有所不同，為了適應這一新的空間機能變化，國家的政策勢必要改變。首先，為了吸引海外資本投資於韓國製造業部門，開始講求營造具有各種基礎設施及可免除關稅的經濟特區，另外，為了強化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一些緩和限制的措施反應於土地利用與空間相關法令上，依此成立的首都圈整備計畫體系，開發限制地區與保留地區之比，由原來各為37%與35%，減少到各為17%與33%，相對的，開發可能地區從原37%擴大到50%。

¹1970年代大規模團地計畫是依據「住宅建設促進法（1977）」來開發，不過1980年代則是依崔誠烈紀念專輯一九九五年秋季「宅地開發促進法（1980）」，這個法令可事先指定地價較低的自然綠地區域為開發區域，然後在開發時再變更用途為住宅用地，因而造成大規模土地以便宜的價格獲得。

另一方面，漢城為了迎接1994年的漢城600週年，以及預備國際化時代的來臨，提出了BESETO計畫，這計畫的本質是關係到北京、漢城、東京之間的合作，從北京經由漢城到東京的這條都市走廊，約有1500公里，依據該計畫的構想，如果這條都市走廊的經濟與社會環境能成為一體，那麼這個地區將是未來世界經濟的重要活動區，這個計畫希望能夠建立資訊高速公路來連接這些城市的資訊網絡，同時也希望在各都市設立BESETO的永久機構。

都市管理策略對創造全球化的漢城具有催化的作用，除了考慮全球化的都市發展需求以外，也必須考慮地方性的需求，也就是都市管理策略必須將全球化及地方性結合在一起，在這樣的前提下，新的都市發展策略包括四個主要部分：

1. 充實通訊的基盤設施，如飛機場、資訊港等

韓國正計畫在永宗島建立一個國際規模的機場，同時，也進行建造高速鐵路將漢城與其他地方連接在一起，在通訊及通訊網路的建立方面，普遍設立的資訊港結合與1995年發射的韓國首座通訊衛星，構成完善的資訊高速公路。

2. 發展為全球經濟網絡的中心

- 為了要建構一個全球的經濟網絡，除了產業內容與層次的提昇外，新的企業必須支援及協助，儘量在海外建立據點及工廠。
- 在高科技產業方面所強調的項目有半導體的生產、電腦軟體、資訊及資訊系統的開發設計、航太及生化科技的服務發展。
- 建立科學園區以容納及激發科技研究。

3. 成為世界性文化重鎮，推動如全球性節目、全球性會議及促成多樣與多元的藝術交流。

4. 建立及參與國際的社會及教育事業機構，如國際貿易中心、城市代表處等等。

朴末定的話：

大家好！我真心的感謝各位對韓國的關心。今年八月，各位的漢城訪問讓我思考到我雖然是一土生土長的漢城人，卻對漢城是這麼的無關心與無知。藉這次機會再一次謝謝各位給我一個反省的機會，並且真心希望未來台灣跟韓國的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可以作為善意的競爭者，成為永遠的好朋友。